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八十七本，第二分

出版日期：民國一〇五年六月

Philology 與史語所：陳寅恪、傅斯年 與中國的「東方學」

張谷銘*

一九二八年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創立歷史語言研究所，並將該所的英文名稱定為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高呼要將中國建設成「東方學」的正統。將研究所取名為 philology，又將「東方學」視為該所工作的目標，可見兩者在他心目中的意義。

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初 philology 在歐洲蓬勃發展。一九二〇年代，中國文史學者傅斯年、陳寅恪等人留學柏林，受到 philology 的薰陶，回國後又將習得的 philology，應用在中國文史的教學及研究上。Philology 雖然對陳寅恪、傅斯年等中國文史學者意義重大，但歷來學者對他們學習的 philology 及所謂的「東方學」，只是點到為止。本文目的在補充歷來研究的空白，探討十九世紀以至於二十世紀初歐洲 philology 的發展、敦煌研究與「東方學」的面目及傳播途徑，以及 philology 對中國學者如陳寅恪、傅斯年的意義。傅斯年的目標是將史語所建立為研究歷史與 philology 的機構，但為何歐洲的 philology 研究無法在中國生根？為何後來史語所卻演變成歷史學與語言學 (linguistics) 的研究所，而且一般人也如此解讀？其中的緣由，本文最後也加以說明。

關鍵詞：Philology 「東方學」 歷史語言研究所 陳寅恪 傅斯年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本文的研究，由中央研究院前瞻計畫及科技部計畫 103-2420-H-001-007-MY3 補助。

傅斯年 (1896-1950) 於一九二八年在中央研究院創立歷史語言研究所，並將該所的英文名稱定為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傅剛從德國賦歸不久，帶回他對人文學術的理想，正想藉新成立的研究所付諸實現。他為該所《集刊》第一分所寫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正寫下他心目中的理想。該文的最後，他高呼要將中國建設成「東方學」的正統。¹ 將研究所取名為 *philology*，又將「東方學」視為該所工作的目標，可見兩者在他心目中的意義。

Philology 沒有適當的中文翻譯。傅斯年可說是民國初年推動 *philology* 最力的人，將之翻譯成「語言學」、「言語學」或「語學」，陳寅恪 (1890-1969) 則曾翻譯為「歷史語言學」，但都未成為通用的翻譯。*Philology* 在文藝復興時期、甚或之前已有濫觴。最早 *philology* 的功夫，運用在聖經的詮釋、西方古典語言的學習、文句解讀以及文獻辨偽之上，以「文字學」、「語文學」、「文獻學」翻譯，都有不足之處，所以本文直接使用 *philology* 一字。十八、十九世紀交接之際德國學者 Friedrich August Wolf (1759-1824) 以其對荷馬 (Homer) 的研究，及其成功的教學，帶動了十九世紀對 *philology* 的熱潮。² 歷經一個世紀的蓬勃發展，*philology* 由古典學擴及歷史、文學、語言及非西方文明研究，成為這些學問的重要基礎。同時以德國為中心，歐洲各大學紛紛成立相關的 *philology* 講座。³ *Philology* 成為留學德國的傅斯年眼中西方最光榮的學問。

史語所的創立，是西方 *philology* 在中國留下最明顯的印記，也是傅斯年企圖與法國學者爭奪東方學正統的基地。可惜的是，史語所創立之初，雖然歷史與 *philology* 並重，但一般人已經忘掉 *philology* 與史語所的關係。歷史語言研究所，通常被視為研究歷史與現代語言學 (linguistics) 的研究所，而非 history 與 *philology* 的研究所。*Philology* 與史語所的關係，學界也未多有著墨。研究傅斯年

¹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頁 258。此後引為〈旨趣〉。

² 論古典 *philology* 的歷史，以及 Wolf 之前的先驅，可見 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London: Duckworth, 1982); Anthony Grafton, "Prolegomena to Friedrich August Wolf,"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44 (1981): 101-129.

³ Walter Rüegg, "Theology and the Arts," in *Universities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1800-1945)*, ed. Walter Rüeg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393-458.

最有成績的王汎森教授，詳細分析了歐洲史學對傅斯年可能的影響。⁴ 另一傅斯年（和陳寅恪）的重要研究者 Axel Schneider，著重分析中國傳統與新學術在傅學術中的地位。⁵ 歐陽哲生則在意傅斯年與中國整理國故的傳統之關係。⁶ 李泉提到傅斯年柏林求學時學習「比較語言學」，以及用「語言學」解決哲學史的問題，主要將「語言學」解讀為 linguistics。⁷ 另一方面，杜正勝談傅斯年的志業，正確指出 philology 在傅思想中的重要性。⁸ 沈衛榮討論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也點出其所指的「語言學」，乃是指 philology。⁹ 平心而論，傑出學者研究西方學術對傅斯年的影響時，都未忽略傅在德國修習「語文學」、「語言學」、「歷史語言學」或 philology 一事，但多半點到為止。相對之下，學界喜歡深究傅斯年在德國學到的歷史學風，特別是此學風與史家 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中文常譯作蘭克）史學的關係。有趣的是，傅在德國並未正式修習歷史的課程，反倒修習梵文、藏文 philology 的課程，並且在教學與著作屢屢提及 philology。但 philology 在傅斯年思想中的地位，還未受到學界應有的重視。¹⁰

近年對陳寅恪的研究可說汗牛充棟。對陳所受西學作深入探討的著作中，季

⁴ Fan-sen Wang (王汎森),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64, 66.

⁵ Axel Schneider, *Wahrheit und Geschichte: zwei chinesische Historiker auf der Suche nach einer modernen Identität für China*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97), pp. 40-41, 160; "Between Dao and History: Two Chinese Historians in Search of a Modern Identity for China," *History and Theory* 35.4 (1996): 54-73.

⁶ 歐陽哲生，〈序言〉，歐陽哲生編，《傅斯年全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第1卷，頁23-36。

⁷ 李泉，《傅斯年學術思想評傳》（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頁30-33, 158-161。

⁸ 杜正勝，〈無中生有的志業——傅斯年與史語所的創立〉，杜正勝、王汎森編，《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上冊，頁8。

⁹ 沈衛榮，〈我們能從語文學學些什麼？〉，氏著，《尋找香格里拉》（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頁16-20。

¹⁰ 筆者在一篇近作中，曾經討論傅斯年心目中的語言研究，與在德國所受 philology 的訓練之關係。Ku-ming (Kevin) Chang, "Philology or Linguistics: Transcontinental Responses," in *World Philology*, ed. Sheldon Pollock, Benjamin A. Elman, and Ku-ming (Kevin) Cha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311-331. 該文尚未直接論說 philology 對傅斯年學術研究及創設史語所的影響。

羨林指出陳所學的是「德國的考據學」。¹¹ 汪榮祖、陳弱水與周樑楷，均注意到以「歷史語言學」或「語言學」為主的歷史學，對陳的重要。¹² 黃清連提到陳「掌握語文工具」所做的考證。¹³ 余英時指出劍橋世界史和歐洲的「東方學」對陳寅恪成學的意義。¹⁴ 桑兵探討陳寅恪作為中國「東方學」首席的地位。¹⁵ 陳寅恪所學中比較文學和比較歷史的面向，袁荻湧、劉健明等均有討論。¹⁶ 陳在哈佛與柏林求學的背景，有張國剛、林偉、陳懷宇等研究。¹⁷ 陳懷宇也提及陳寅恪的佛教研究與「文獻主義」。¹⁸ 錢文忠、王海燕則設想陳寅恪為何放棄已有成就的 Buddhist philology。¹⁹ 因為陳寅恪為清華大學所出的國文試題曾引起風波，答辯時數次提及「比較歷史語言學」（即 comparative philology），因此桑兵和王震邦等研究者對此主題有不少的討論。²⁰ 但可說已有的研究對歐洲的 philology 發展的

¹¹ 季羨林，〈序〉，王永興編，《紀念陳寅恪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論文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頁 7-10。

¹² 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頁 53-57；陳弱水，〈一九四九年前的陳寅恪：學術淵源與治學大要〉，杜正勝、王汎森，《新學術之路》上冊，頁 105-106；〈現代中國史學史上的陳寅恪——歷史解釋及相關問題〉，《學術史與方法學的省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0），頁 53-64；周樑楷，〈傅斯年和陳寅恪的歷史觀點——從西方學術背景所作的討論（1880-1930）〉，《臺大歷史學報》20（1996）：101-127。周樑楷也分析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德國史學潮流的變化，對傅斯年、陳寅恪等人可能的影響。

¹³ 黃清連，〈不古不今之學與陳寅恪的中古史研究〉，黃清連編，《結網三編：紀念遼耀東先生七五冥誕論文集》（臺北：稻香出版社，2007），頁 151-221。

¹⁴ 余英時，〈試述陳寅恪的史學三變〉，氏著，《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二版）》（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11），頁 315-338。

¹⁵ 桑兵，〈陳寅恪的西學〉，《文史哲》2011.6：52-67。

¹⁶ 袁荻湧，〈陳寅恪與比較文學〉，《文史雜誌》1990.1：14-16；劉健明，〈論陳寅恪先生的比較方法〉，《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9），特別是頁 232-239。

¹⁷ 張國剛，〈陳寅恪留德時期柏林的漢學與印度學——關於陳寅恪先生治學道路的若干背景知識〉，《國際漢學》23（2012）：86-94；陳懷宇，〈陳寅恪留學哈佛史事鉤沉及其相關問題〉，《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5：42-57，159；《在西方發現陳寅恪：中國近代人文學的東方學與西學背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林偉，〈陳寅恪的哈佛經歷與研習印度語文學的緣起〉，《世界哲學》2012.1：137-152。

¹⁸ 陳懷宇，〈在西方發現陳寅恪〉，頁 294-306。

¹⁹ 錢文忠、王海燕，〈陳寅恪與季羨林——一項學術史的比較研究〉，《文史哲》2002.1：34-36。

²⁰ 桑兵，〈近代中外比較研究史管窺——陳寅恪〈與劉淑雅論國文試題書〉解析〉，《中國社會科學》2003.1：190-203；王震邦，〈獨立與自由：陳寅恪論學〉（臺北：聯經出版公

歷史、philology 和中國敦煌學或所謂「東方學」的關係，以及 philology 對陳寅恪影響的深度與廣度，還沒有深入的討論或理解。

實則了解 philology 的內容與方法，對於了解陳寅恪與傅斯年等人的學術關懷，有很大的助益。本篇論文的主旨就在探討十九世紀以至於二十世紀初歐洲 philology 的發展、「東方學」的面目及傳播途徑，以及 philology 對中國學者如陳寅恪、傅斯年的意義。歐洲將近東（含古埃及、亞述、巴比倫、回教文明）、南亞與中亞，以至於遠東與非洲等地區的研究，統稱為東方研究（英文 *Oriental Studies* 或德文 *Orientalistik*）。本文指出，並非歐洲所有的東方研究，都是中國學者所謂的「東方學」。中國所謂的「東方學」，只是歐洲東方研究牽涉到中國和古西域的部分（包括漢、滿、藏及古西域的語文），中東、南亞、甚至非洲，都不在中國所謂的「東方學」範圍之內。本文也指出，中國對西方「東方學」的知識，有直接由西方學習而來，也有轉道日本的部分。但值得強調的是，philology 在西方的「東方研究」扮演最主要的角色。

公開討論或提倡 philology 的中國學者不多，主要由留德的學者提及，最重要的是陳寅恪及傅斯年。由於兩人對現代中國的中古與上古史的貢獻，其史學史意義最高，和史語所的關係也最親近，所以本文的分析著重在陳、傅兩人。第一節分析 philology 在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初的發展。第二節考察歐洲東方研究的發展和英俄等國的中亞戰略爭奪的關係，以及德、法、日本等國學者扮演的角色，檢視日人與羅振玉（1866-1940）、王國維（1877-1921）在中國「東方學」建立時扮演的角色。本節指出，中文學界所談的「東方學」，其意義只在中國成立。

第三節先簡單檢視中國留德學生姚從吾（1894-1970）、羅家倫（1897-1969）、毛子水（1893-1988）在一九二〇年代的柏林接受到的 philology，但主要討論 philology 在陳寅恪學術中的重要性。傅斯年對 philology 的討論最多，故第四節專門分析傅斯年在教學、研究與成立史語所時所理解、運用的 philology。最後總結 philology 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在中國文史研究的位置及限制，並討論史語所後來的演變，以及世界學術發展的大趨勢，解釋為何傅斯年將 philology 放在史語所與中國文史研究的核心，後來學界卻逐漸淡忘 philology 的重要角色。

司，2011）。桑兵對民國時期的中西學術交匯研究卓有成就。其他如羅志田對陳寅恪也有重要的研究，見其〈陳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學」〉，《近代史研究》2008.6：24-44。羅的研究和西方的 philology 沒有直接相關，因文長限制，本文暫不討論。

一・歐洲的 philology

Philology 的起源在於研究歐洲古典語文（希臘、拉丁）的文字、文法及文獻。十九世紀初，neo-humanism 成為日爾曼思想界主流，強調古典文化（特別是希臘文化）對個人教養（德文稱 Bildung）的重要，掌握古典語文、古典文獻，被視為是菁英文化的根本，高等教育改革將古典語文視為大學取材的考核要項，philology 教學與研究則是大學教育的重點。Wolf 是這個運動最重要的理論家，德國的人文學者 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是 Wolf 的摯友、高等教育改革運動最重要的擘畫者、也是 neo-humanism 最有力的護法。²¹ Wolf 之後，十九世紀許多德國學者投入心力，研習古典語言的文字（如字詞與字源）、文法與文學，又蒐羅希臘、羅馬著作的抄本與碑刻，比對自文藝復興以來的刊印本，剔除偽作、補正缺漏的章節或文句，古典時期作者的精校全集 (critical editions) 紛紛在十九世紀完成。從古典的文字與文獻研究開始，philology 在十九世紀經過幾個重要的發展，才形成二十世紀初中國學者接觸到的面貌。

第一，philology 發展出 *Altertumswissenschaft*（研究古代的科學，或古代研究）。對 Wolf 而言，philology 不只研究語文或文獻，而是研究所有古代人類的活動。他主張 *Altertumswissenschaft* 有三個根本：文法或語文研究、詮釋學 (hermeneutics) 及文字考證 (*Wortkritik*)。這三個根本，其實都在 philology 的研究範圍之內。Wolf 更進一步將古代地理、政治史、神話學、文學、科學及藝術納入古代研究。古蹟 (monuments)、考古發現、錢幣、房舍和工藝品等，都是 Wolf 從事古代研究的材料。可說古代研究是以 philology 為中心而研究古代生活各面向的學問。

一八二〇、三〇年代，德國學界曾有過 *Wortphilologie* 和 *Sachphilologie* 的辯論。Wort 在德文中意謂「字」，*Wortphilologie* 的提倡者主張 philology 應該專注在文字上的知識。Sach 在德文中意謂「物」，*Sachphilologie* 認為古代的研究應該包括所有文字和非文字的物事。²² *Sachphilologie* 的主要提倡者是 Philipp August

²¹ R. Steven Turner, "The Growth of Professorial Research in Prussia, 1818 to 1848: Causes and Context,"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Sciences* 3 (1971): 142-143.

²² 有關 *Wortphilologie* 與 *Sachphilologie* 的辯論，可見 Constanze Günthenke, "Enthusiasm Dwells Only in Specialization": Classical Philology and Disciplinar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 in *World Philology*, p. 281.

Boeckh (1785-1867)，繼承其師 Wolf，在柏林大學教授 classical philology。Boeckh 在柏林大學最有名的課程 Enzyklopädie und Methodologie der philologischen Wissenschaften (Encyclopedia and Methodology of the Philological Sciences)，因為討論 philology 相關學科所有文字和非文字的面向，所以課名為 Enzyklopädie (百科全書)。Boeckh 最重要的作品 *Die Staatshaushaltung der Athener* (雅典的財政，1817)，雖然主題是希臘城邦雅典的財政，但同時關照經濟生活，及經濟所支撐的國防、公共服務、警力、司法、宗教、建築、祭典、奴隸及窮人等，視野擴及古代生活的全部。關懷超出文字之外，Sachphilologie 說穿了 Altertumswissenschaft 的要義。Boeckh 在柏林大學任教超過半個世紀，訓練出許多頂尖的 philology 學者，傳播他對該學科的理念。

考古學出土的地下文物，充實了 Altertumswissenschaft 的內容。德國從一八七〇年代開始，發掘古希臘的 Olympia 及 Pergamum，所發現的大量建築、雕塑、陶器，豐富世人對古希臘的生活、藝術、宗教的理解；古 Troy (今譯特洛伊城) 的考古，以出土的文物證實了荷馬史詩中的古文明。英國、法國、以及德國自一八九〇年代起在埃及、巴比倫、亞述的考古，則重建令人驚嘆的非歐古文明。²³ 雖然隨著考古學的興起，學界對 philology 與考古學對古代研究的重要性有孰輕孰重的辯論，但是無法偏廢其中一者，卻是學界共識。²⁴ 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 (1848-1931) 在他的名著 *Geschichte der Philologie* (Philology 的歷史) 中就強調考古的重要性。²⁵ 德國當時的發展，讓傅斯年在柏林求學時清楚認知，歷史、philology 和考古學是古代研究不可分割的成分。傅斯年在他創立的史語所更正式將歷史、philology 和考古整合為該所的核心任務。

德國的 Altertumswissenschaft 和傳統中國對上古的想像不同。中國傳統將上古三代視為一統、連貫、單語及單民族的世界，雖然外有蠻夷戎狄，但九州之內的堯舜禪讓、商湯伐桀與周武伐紂等只是炎黃胄裔的統治者更換；殷周所屬各國，基本也是同語、同種的封臣而已。相對的，古希臘與羅馬是多部族、多語言、多宗教的世界，彼此互相貿易、結盟、征戰，乃是 Altertumswissenschaft 的基本常識，不待多言。

²³ Suzanne L. Marchand, *Down from Olympus: Archaeology and Philhellenism in Germany, 1750-197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63, 75-84, 93-96, 118-124, 198-218.

²⁴ 論德國考古學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發展，以及 philology 和考古學的張力，可見 Marchand, *Down from Olympus*, pp. 49, 116-151, 302-376.

²⁵ Wilamowitz-Moellendorff,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pp. 159-165.

多民族的視野之外，德國的 *Altertumswissenschaft* 更進一步分析古代社會中政治集團及政治階級的權力競逐。譬如古羅馬研究的大家 Theodor Mommsen (1817-1903) 的羅馬史，深入分析羅馬貴族父老階級 (*patres*) 的組成與競爭，以及移民與被征服者帶來的變化。²⁶

第二，由 *Altertumswissenschaft* 的成型可以看到 *philology* 與歷史學的緊密結合。²⁷ 這個結合是雙向的。*Philology* 的研究者如 Wolf 及 Boeckh 從事追求全面的古代史，同時歷史學家有深厚的 *philology* 訓練：歷史學家 Ranke 在 Leipzig 大學求學時，受過古典 *philology* 的訓練，注重歷史研究裡的文獻辨偽與解讀 (*historical criticism*) 的功夫；他在柏林教學時利用 *seminar* 的方法訓練學生歷史檔案研究與學術寫作，就是借鏡 *philology* 的 *seminar*。²⁸ 羅馬史家 Mommsen 更是研究羅馬法典最權威的 *philologist*。

十九世紀時，*philology* 和歷史學共享許多特點。*Philology* 的基本功夫是 *textual criticism* (或可譯為文獻考證)，歷史的基本功夫是 *historical criticism*，兩者都在解讀一手文獻或典故，分析其真偽，從而建立正確的文本或歷史事實。兩者共通的是 *Quellenforschung* (*source studies*) 或 *Quellenkritik* (*source criticism*)，即考證材料的學問。*Quellenforschung* 既是 *philology* 的核心功夫，²⁹ 也是蘭克歷史研究裏的重要方法。蘭克的文章 “Zur Kritik neuerer Geschichtsschreiber” (*Critique of Modern Historians*) 批評義大利史家 Francesco Guicciardini (1483-1540) 使用史料的方式，建立了現代歷史研究的史料批判方法。³⁰ 這就是傅斯年創建史語所時，*history* 和 *philology* 並列的背景。

歐洲 *philology* 和歷史結合的取向和中國考證學有相近的地方，但也有很大的

²⁶ Mommsen, *Romanische Forschungen* (1887-88), vol. 3, 見 C. J. Smith, *The Roman Clan: The Gens from Ancient Ideology to Modern Anthrop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85-87.

²⁷ *Philology* 與歷史學的結合是周樑楷注意的重點，見周樑楷，〈傅斯年和陳寅恪的歷史觀點〉，頁 105-106。

²⁸ Edward Gaylord Bourne, “Ranke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Seminary Method in Teaching History,” in *Essays in Historical Criticism* (New York: C. Scribner’s Sons, 1901), pp. 266-267.

²⁹ 參考 Glenn W. Most, “Quellenforschung,” in *The Making of the Humanities*, vol. 3, *The Modern Humanities*, ed. Rens Bod, Jaap Maat, and Thijs Weststeijn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207-217.

³⁰ 此文為蘭克第一本書 *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 von 1494 bis 1535* (1824) 之附錄。

不同。不同處在於，philology 雖未免處理個別、零碎的考證，但是重要的 philologists 都強調，其研究的目標，不是零散的知識，而是宏觀的視野及整合的歷史圖像。Wolf、Boeckh、Mommsen 都是明顯的例子。

第三，除了 philology 和歷史緊密結合之外，philology 也是文學研究的基礎。文學研究的主題，重點常是文法的演變及文學考證。可以說，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上半，文學研究，就是 philology。³¹ 陳寅恪在柏林時研讀 Max Kaluza (1856-1921) 的古英文法。Kaluza 除了英文文法外，還研究古英文韻文，分析 Geoffroy Chaucer (c. 1343-1400) 的詩作及其詩作與法語韻文作品 *Rosenroman* (英譯 *The Romance of the Rose*) 的關係。³² 詩的格律 (metrics)、文學作品中的人名、地名、地理、典故的考證、修辭的分析與文體 (genre) 的演變，也都是文學 philology 研究的範圍。這些元素經常在陳寅恪的文學研究裡出現。

除了書寫 (written) 的文獻外，十九世紀的 philology 還重視口傳文學。Wolf 指出，所謂希臘詩人荷馬所作的史詩，根本不是荷馬本人書寫，因為荷馬的時代還沒有書寫的文字。該史詩其實經過長久的口頭傳誦，並經不同時期傳寫，經集合過才成為現今流傳的版本。³³ Jacob Grimm (1785-1863) 及 Wilhelm Grimm (1786-1859) 兩兄弟蒐集的德文童話以及中古的史詩，也都經過長久口頭傳誦。Grimm 兄弟更認為，民間文學表現出人類永恆的歡樂與哀愁、希望與恐懼，才是最真實的文學。³⁴ 陳寅恪和傅斯年重視口傳詩歌及文學，其來有自。

德國的 philology 學界常強調語言在思想（與文學）裡的重要性。語言並不單純只是思想（或文學）的載具或工具，而是賦予思想、文學內容所不可或缺的實

³¹ 這在 philology 最發達的國家德國如此。即使在英國，受德國影響，philology 也是文學研究的主題。一直到一次大戰，兩國交戰，以德國為代表的 philology，才失去地位。Mommsen, *From Philology to English Studies*, p. 185.

³² 陳寅恪研讀的，當是 Max Kaluza, *Historische Grammatik der englischen Sprache*, 2 vols. (Berlin: E. Felber, 1900). Kaluza 其他作品包括 *A Short History of English Versification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A Handbook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London: G. Allen, 1911); *Der altenglische Vers. Eine metrische Untersuchung* (Berlin: E. Felber, 1894); *Chaucer und der Rosenroman eine litterargeschichtliche Studie* (Berlin: E. Felber, 1893); *Über das Verhältnis des mittellenglischen alliterierenden Gedichtes "William of Palerne" zu seiner französischen Vorlage* (Heilbronn: Henninger, 1881). Kaluza 是德國人。

³³ G. P.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2), pp. 26-27.

³⁴ Ruth Michaelis-Jena, "Oral Tradition and the Brothers Grimm," *Folklore* 82 (1971): 268, 274.

體，學者無法棄語言而單研究思想（或文學），以傅斯年的話講，就是「思想受語言支配」。³⁵ 這個想法，從十九世紀以前就已存在。上述的 Humboldt，既支持古典 philology，本身也研究語文，就主張語言反映了每個民族的心理與思想。³⁶ 十九世紀下半葉的 philologist，同時也是史詩與神話學者 F. Max Müller (1823-1900) 更進一步提倡這個想法。傅斯年深受這個想法的影響。

第四個發展是歐洲各個國家成立 national philology，研究民族文學與文獻。National philology 可說是古典 philology 的知識與技巧應用到各國的語言與文學。德文 philology 可以 Grimm 兄弟的奠基性工作為代表。他們的工作包括：（一）採集日爾曼民間歌謠、童話及傳說，結集出版。除了書寫的文獻外，還在民間蒐集口傳的故事。書寫與口傳文獻編輯建立德意志文學的基礎，追溯其歷史，並擴大其範圍。（二）以 comparative philology 的方法（下詳），追溯德語與其他印歐語言的歷史與親族關係。記錄德語自中古以來的演變，建立德語的歷史，並參考古典語文的文法學，建立德文的文法體系；訪採各種德語方言，建立德語方言與現代德國通行語 Neuhochdeutsch 的關係。（三）編訂德文大字典，以 Neuhochdeutsch 為基礎，建立現代德文字彙的拼寫、發音與字源。³⁷ 同樣地，Karl Lachmann (1793-1851) 利用其古典 philology 的訓練，應用在日爾曼中古史詩 *The Nibelungen*。³⁸ 同時代及後來的學者繼續類似的工作，同時編纂、分析日爾曼文學家以及思想家的作品。另外德國學界還大規模蒐集民間的歷史文獻，編輯出版成 *Monumenta Germanica Historica*。德文 philology 因而將民間傳說、語言

³⁵ 傅斯年，〈戰國子家敘論〉，《傅斯年全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第2冊，頁86。

³⁶ James Turner, *Philology: The Forgotten Origins of the Modern Humani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35.

³⁷ Grimm 兄弟的重要著作包括 Jacob Grimm and Wilhelm Grimm, *Kinder- und Haus-Märchen* (Berlin: Realschulbuchhandlung, 1812); *Deutsche Sagen*, 2 vols. (Berlin: In der Nicolaischen Buchhandlung, 1816); Jacob Grimm, *Deutsche Mythologie*, 4 vols. (Göttingen: Dieterich, 1835); Jacob Grimm, *Deutsche Grammatik* (Göttingen: Dieterichsche Buchhandlung, 1840); Jacob Grimm,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 2 vols. (Leipzig: Weidemann, 1848); Jacob Grimm and Wilhelm Grimm, *Deutsches Wörterbuch* (Leipzig: Hirzel, 1854). 德文字典 Grimm 兄弟生前並未完成。論 Grimm 兄弟，可見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p. 49-57.

³⁸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p. 57-59.

史、方言採集、字典編纂、文獻蒐集、文學創作整合成整體的民族語言及文學。³⁹

十九世紀是民族主義的世紀。德國樹立 national philology 的典範後，其他歐洲國家也一一建立本國語言文學的 philology。譬如英國學者成立了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1842)，決定編定代表英國國家語文的字典。該字典即是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第一冊於一八八四年出版，最後一冊則在一九二八年完成。⁴⁰ 法國的 Arsène Darmesteter (1846-1888) 和 Adolphe Hatzfeld (1824-1900) 編定了 *Dictionnaire general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1895-1900)。⁴¹ 俄國的 Alexander Nikolayevich Afanasyev (1826-1871) 和 Fedor Ivanovich Buslaev (1818-1898) 受德國 Grimm 兄弟的影響，蒐集大量的俄國民間故事。⁴² 傅斯年建立歷史語言研究所時所設下的目標，可說就是在建立中國的 national philology。

第三和第四個發展反映了 philology 從古典語文到現代歐洲語文的延伸。研究現代語文也叫做 modern philology。德國因為 philology 的人才眾多，除了投入古典及德文 philology 最多之外，也有不少學者開始研究 Romance languages（含法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等）、英文、斯拉夫語文。由於人數眾多，其成績往往不下於其母國學者，甚至引起本國學者的羨慕或氣憤。⁴³

第五個發展是 comparative philology 的出現，而其關鍵，是梵文的發現。歐洲學者在十八世紀末赫然發現梵文比歐洲的古典語言更為古老，而且保留下來的文法比其他已知的語言更為嚴謹而有規律。⁴⁴ 研究梵文的學者先是應用古典 philology 的方法研究梵文文獻。但 Franz Bopp (1791-1867) 一八一六年的經典著

³⁹ National philology 的歷史，可參考 Frank Furbeth, Pierre Krügel, Ernst Erich Metzner, and Olaf Müller, eds., *Zur Geschichte und Problematik der Nationalphilologien in Europa: 150 Jahre Erste Germanistenversammlung in Frankfurt am Main (1846-1996)* (Tübingen: Max Niemeyer, 1999).

⁴⁰ Haruko Momma, *From Philology to English Studies: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06-126.

⁴¹ Alain Rey, "Lexicographie française depuis Littré," in *Wörterbücher. Internationales Handbuch zur Lexikographie*, ed. Franz Josef Hausman, Oscar Reichmann, Herbert Ernst Wiegand, and Ladislav Zgusta (Berlin: de Gruyter, 1990), vol. 2, pp. 1822-1823.

⁴² James Riordan, "Russian Fairy Tales and Their Collectors," in *A Companion to the Fairy Tale*, ed. Hilda Ellis Davidson and Anna Chaudhri (Cambridge: D. S. Brewer, 2003), pp. 217-225.

⁴³ 如英國頂尖的 philology 學者 Henry Sweet，就是如此。Henry Sweet, ed., *The Oldest English Texts, Edited with Introductions and a Glossary by Henry Sweet* (London: Trübner, 1885), p. v.

⁴⁴ Pascale Rabault-F Feuerhahn, *Archives of Origins: Sanskrit, Philology, Anthropology in 19th Century Germany*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13), pp. 30-51.

作，比較梵文、希臘、拉丁、波斯與日爾曼語言的動詞變化的規律，證明這些語言同屬一語系（即 Indo-European languages，印歐語系），建立了 comparative philology。⁴⁵ 在他之後，August Friedrich Pott (1802-1887)、August Schleicher (1821-1868)、Karl Brugmann (1849-1919) 和 Berthold Delbrück (1842-1922) 等人都投入印歐語文比較字源學、文法與聲韻轉變的研究，完成 comparative philology 一系列的經典。⁴⁶ 印歐語言的特色，是動詞視時態及人稱而有變化 (conjugation)，名詞則視性別、位格、單複數也有變化 (declension)。Bopp 比較梵文、希臘、拉丁、波斯（或稱伊朗文）、德語等印歐語言動詞的 conjugation 的變化形態。譬如英文 be 這個動詞的第一人稱單數現在式的假設語氣，在梵文中是 syâm，拉丁文是 siem（sim 的古型態），而在古德語 (Gothic) 中則為 siyau。⁴⁷ 互相比較，證明這些語文中對應的字有共同的字根，而差異表現在字型與字音的轉變上。系統地比較這些字型和字音的轉變，可以排比出這些同系語言之間的先後演變關係，並確定各語文間遠近親疏的相對位置，甚至建立親族樹 (genealogical tree)，向上追溯遠祖的語言，向旁則劃定語言間親屬的關係。

雖然在 comparative philology 出現之前，歐洲已有希臘、拉丁等個別語言的文法研究，但在歐洲發現梵文後，文法及音韻的研究有了完全不同的面貌。對 comparative philology 而言，唯有比較同語系中多個語言，才能了解每個語言自己的特性，並同時了解同語系內其他語言的共同規律或性質。陳寅恪就深受此觀念的影響。

研究語言轉變時，comparative philology 發現了語音和字型變化的規律。如

⁴⁵ Franz Bopp, *Über das Conjugationssystem der Sanskritsprache in Vergleichung mit Jenem der griechischen, lateinischen, persischen und germanischen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In der andreaischen Buchhandlung, 1816); *Vergleichende Grammatik des Sanskrit, Zend, Griechischen, Lateinischen, Litthauischen, Gothischen und Deutschen* (Berlin: F. Dümmeler, 1833).

⁴⁶ August Friedrich Pott, *Etymologische Forschungen auf dem Gebiete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 mit besonderem Bezug auf die Lautumwandlung im Sanskrit, Griechischen, Lateinischen, Littauischen und Gothischen* (Lemgo: Meyersche Hof-buchhandlung, 1833); August Schleicher, *Compendium der vergleichenden Grammatik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 (Weimar: Böhlau, 1861); Karl Brugmann and Berthold Delbrück, *Grundriss der vergleichenden Grammatik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 (Strassburg: Trübner, 1886).

⁴⁷ Franz Bopp, *Analytical Comparison of the Sanskrit, Greek, Latin and Teutonic Languages, Shewing the Original Identity of Their Grammatical Structur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74), pp. 27-28.

Jacob Grimm 發現德語中子音轉變的規則，在許多印歐語言都適用，被稱為 Grimm's law。⁴⁸ 這些發現使不少研究者相信語言的演變就像自然科學的法則一樣，而 comparative philology 也就是一門科學。譬如 Schleicher 認為語言就像生物，進而援引達爾文的生物演化理論來解釋語言演化的法則。⁴⁹

Comparative philology 的主題在比較語言的文法。雖然仍然叫做 philology，但這個領域的對象已經不再是個別的文字或文獻，而將語言（特別是文法）當作研究的對象。傳統上，philology 的首要任務，是編輯、勘正、詮釋或註解文獻。但從 Bopp 開始，comparative philology 研究的對象不再是個別的文獻，而在整個語言，甚至是多個語言；在比較語言、並追尋語言歷史演變的法則的過程中，「語言研究」的意識逐漸浮現，德國學者也從而創造了 Sprachwissenschaft (science of language) 的觀念。不過對德國主流的 philology 學者而言，comparative philology 衍生出來的語言研究，是附屬在 philology 下的次領域，不必也不能與 philology 分離。傅斯年所接受的語言研究與 philology 之關係，正是德國學界主流的看法。

從印歐語言開始，comparative philology 也把研究對象擴展到印歐語言之外。歐洲在很短的時間內，找出屬於印歐語言的上百種語文。因為舊約聖經本以希伯來文傳世，歐洲原本就有研究希伯來文的傳統，學者以此為基礎出發，並運用印歐語言 comparative philology 已有的觀念與方法，比較 Semitic 語系（含希伯來文、阿拉伯文等），了解語系內語言的文法、字彙、字源與聲韻的通則與特性。隨後更比較 Finno-Hungarian languages（芬蘭、匈牙利語等）等其他非印歐語系的語言，甚至開始研究遠東的藏文、泰語、漢文、蒙古文語系等。因為在非洲建立殖民地的緣故，十九世紀末開始，甚至開啟非洲語言研究。

Philology 最後一個發展是非歐文字和文明的研究。從十八世紀開始歐洲殖民的力量大幅擴張。英國正式殖民印度致使英人 William Jones (1746-1794) 在十八世紀末開啟梵文的研究。十九世紀初拿破崙征服埃及，開啟了法國古埃及文研究與埃及考古發掘。十九世紀奧圖曼帝國與波斯帝國式微，西方的力量逐漸進入中

⁴⁸ Rabault-Feuerhahn, *Archives of Origins*, p. 103.

⁴⁹ August Schleicher, *Darwinism Tested by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London: J.C. Hotten, 1869); Robert J. Richards, "The Linguistic Creation of Man: Charles Darwin, August Schleicher, Ernst Haeckel, and the Missing Link in Nineteenth-Century Evolutionary Theory," in *Experimenting in Tongues: Studies in Science and Language*, ed. Matthias Doerr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1-48.

東後，一方面開啟阿拉伯、土耳其、波斯文的研究，另一方面開啟古希臘、亞述 (Assur) 與巴比倫 (Babylon) 的考古發掘及古文明研究。⁵⁰ Marc Aurel Stein (斯坦因, 1862-1943) 和 Paul Pelliot (伯希和, 1878-1945) 在二十世紀初探勘敦煌，就是十九世紀西方國家在中東考古探勘的延續。

十九世紀歐洲學者研究歐洲以外的文明，主要借助 philology。即使是考古發現，其宗教、經濟、政治生活的內容，也須解讀出土的石碑、泥版、莎草、布帛等文獻來說明，此時就需 philology 的知識。考古發現不少已經亡佚的古代文字，如亞述和巴比倫文等（兩者都屬 Akkadian 語言，屬 Semitic 語系）。解讀這些語文，正好受益於 comparative philology，學者從已知的同語系的相近語文出發，推測古語文的字彙及文法。

當 philologists 已經掌握所有現存的印歐語言時，發現並解讀未知語文成為他們另一個努力的方向。德國在一九〇〇年代派出吐魯番探勘隊，發現許多亡佚的語言文獻，多賴於德國傑出的 philologists，很快解讀粟特文 (Sogdian) 和吐火羅文 (Tocharian，含焉耆文和龜茲文) 等原已失傳的語言，成為德國 philology 學界傲人的成績。

古代文明的年代學 (chronology)，也多賴 philology 的成果。希臘、羅馬與基督教的紀年學，一邊因為文獻研究的進展，一邊因為新方法的出現（如利用古文獻中記載的日、月蝕，配合現代的天文知識解讀），大為精進。⁵¹ 非歐文明如埃及、亞述與巴比倫文明的重要年代，也因 philology 解讀古文字的發展迅速建立。⁵² 陳寅恪到清華國學研究院任教，第一年就開授「年曆學——包括中國古代閏朔、日月食等」，急切地要將他在德國所學應用到中國歷史，並傳授給學生。傅斯年則提到希臘及古印度 chronology 的進步。⁵³

比較神話學也是 philology 進展的重要方向。這個領域的奠基者是上述的梵文 philology 學者 F. Max Müller。Müller 是德國人，在德國完成博士學位，後來的學術生涯卻在英國牛津大學發展。他從印度的吠陀 (Veda) 經典研究出發，研究其中的神話，進而比較希臘、拉丁與印度的神話，重建原始印歐民族 (Müller 稱為

⁵⁰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p. 417-440.

⁵¹ Turner, *Philology*, pp. 301, 345, 384.

⁵² Carl Niebuhr 將東方的古文明紀年學成果整合，出版了 *Die Chronologie der Geschichte Israels, Aegyptens, Babyloniens und Assyriens von 2000-700 v. Chr.* (Leipzig: Eduard Pfeiffer, 1896).

⁵³ 傅斯年，〈論太史公書之卓越〉，《傅斯年全集》第2冊，頁79。

Aryan 人) 的原始神話，及神話傳播的途徑。⁵⁴ 陳寅恪對佛教神話傳播到中國的研究，以及傅斯年對古代民族傳說的設想，可說是比較神話學的延續。

梵文在 comparative philology 及非歐洲文獻學中，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如上所述，梵文對印歐語文 comparative philology 的建立，有莫大的重要性。導致以後所有學習印歐語文 comparative philology 的學生，都必須由梵文的學習開始。甚至學者研究非印歐語的 comparative philology，也必須先修習梵文，以奠定文法學及比較語言的基礎。

佛教研究自梵文 philology 發展出來。歐洲的梵文研究，一開始只專注在最古老的吠陀文獻，以及以梵文做出發點的比較文法研究。佛教的研究到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才有大規模的開展。⁵⁵ 陳寅恪和傅斯年的梵文教授 Heinrich Lüders (1869-1943) 既研究吠陀，也研究佛經。西藏文 philology 通常和佛教研究連結。柏林大學第一個開授西藏文的教師是 Georg Huth (1867-1906)，最先開始研究藏譯的梵文經典。⁵⁶

所謂的 oriental philology，就是非歐文字和文明的研究。十九世紀前，歐洲的 oriental philology，只包括基督教起源的近東，最多只加入一點點伊斯蘭教與阿拉伯的研究。⁵⁷ 十九世紀的 oriental philology 先加入梵文研究，後來加入埃及、伊斯蘭、亞述與巴比倫等北非、西亞、南亞和中亞的語文及文明。英、法兩國是最主要的殖民國家，對這些區域的研究也最早，但是在一八三〇年代以後，德國在 oriental philology 研究上領先英、法。⁵⁸ 隨著研究區域的擴大，oriental philology 只是集合的名稱，因為其牽涉到的語文和文化太多、時代也太長，並非個別學者可以完全掌握。但共通的是，這些地區的研究，綜合了文字、文法、文獻研究（含碑誌研究）、考古、宗教（含神話）、繪畫、建築、甚至古天文、醫學、及民

⁵⁴ F. Max Müller, "Comparative Mythology," in *Oxford Essays* (London: John W. Parker and Son, 1856), vol. 22, pp. 1-87; *Contributions to the Science of Mythology*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97).

⁵⁵ 論歐洲佛教研究的起源與開展，見 J. W. de Jong, *A Brief History of Buddhist Stud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Varanasi: Bharat-Bharati, 1976), pp. 5-53. 另見 Rabault-Feuerhahn, *Archives of Origins*, pp. 219, 225.

⁵⁶ Toni Huber and Tina Niermann, "Tibetan Studies at the Berlin University: An Institutional History," in *Tibetanstudien: Festschrift für Dieter Schuh zum 65. Geburtstag*, ed. Petra Maurer and Peter Schwieger (Bonn: Bier'sche Verlaganstalt, 2007), pp. 102-103.

⁵⁷ Rabault-Feuerhahn, *Archives of Origins*, pp. 68-69.

⁵⁸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1979), pp. 18-20.

族學等。特別是德國訓練的學者，不管研究的區域為何，都能同時掌握多種同語系、甚或不同語系但地理位置相近的語文，梵文更是入門的語文。除了重點語文不同外，oriental philology 可說就是西方古典 Altertumswissenschaft 在非歐文明的應用。⁵⁹

到了二十世紀初，人文學研究裡，philology 的勢力幾乎已經無所不在。Philology 開枝散葉，不僅只是一個學科。歐洲的大學裡，其實並沒有單獨的講座叫做 philology，⁶⁰ 反倒是有 classical philology（或是分成 Greek philology 和 Latin philology）、German philology、English philology、French philology、Italian philology、Spanish philology（或三者合起來叫 Romance philology），Slavic 或 Russian philology、以及 oriental philology 等等。今天我們認為的古典研究或各國語言的文學研究，都在 philology 的勢力範圍。另外我們今天所視為區域研究 (area studies) 或文明研究 (studies of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的學術探討，直到二十世紀上半葉，最重要的根本都是 philology（雖然也依賴考古、歷史、地理、藝術、古錢幣研究等）。到了二十世紀上半葉，oriental philology 研究的範圍，已經包括了亞洲及非洲的全部，只有歐洲和美洲不在其內。德國的東方研究學會 (Deutsche Morgenländische Gesellschaft) 所涵括的範圍就代表了這個趨勢。⁶¹

二・Oriental Philology、敦煌研究與「東方學」

中國學界意識到歐洲的 oriental philology 的重要，主要是從西域文物的發現開始。一九二八年傅斯年寫給陳垣的信中說：「斯年留旅歐洲之時，睹異國之典型，慚中土之遙落，並漢地之歷史語言材料亦為西方旅行者竊之奪之，而漢學正統有在巴黎之勢，是若可忍，孰不可忍？」⁶² 陳寅恪則在一九三〇年的〈燉煌劫餘錄序〉說：

⁵⁹ Ursula Wokoeck, *German Orientalism: The Stud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Islam from 1800 to 1945* (London: Routledge, 2009); Suzanne L. Marchand, *German Orientalism in the Age of Empire: Religion, Race, and Scholarshi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⁶⁰ 歐洲的大學是講座制，二十世紀下半葉美國大學興起，才另有學系制。

⁶¹ 有關德國東方學會的研究範圍，可見陳懷宇，〈在西方發現陳寅恪〉，頁 62。德文的 Morgenland（形容詞 morgenländisch）中的 Morgen，原意指的是早晨，意味太陽升起的方向，Land 則指國家或地方。Morgenland 引申的就是東方國家或地區。

⁶² 引自杜正勝，〈無中生有的志業〉，頁 34-35。

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去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之新潮流。治學之視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則不入流。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⁶³

傅、陳兩人都意識到西人用西域發現的新材料研究中國史的成就，並感嘆中國學界的不入流。清末以來，主張改革的人士，先從引進科學技術開始，再到梁啟超等人要求引進西方的憲政制度與政治、社會思想，一九一〇、二〇年代甚至邀請杜威、羅素等哲學大家訪問中國，展現對西方哲學的興趣。但西方的中國文史研究，真正讓中國學界人物傅斯年及陳寅恪等感到佩服者，可說是從敦煌學及相關的研究開始。由於西方在敦煌研究上的成就超過中國，更讓中國學界感嘆。

西域文物的發現及相關的研究，是歐洲十九世紀一連串政治與學術發展的延續。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歐洲的地理與文獻探勘向東先推進土耳其、再到美索不達米亞（即後來的波斯，現在的伊拉克、伊朗等地）。十九世紀下半葉，俄國從歐洲的國土向東擴張勢力，英國則在鞏固印度的殖民地後，向北擴張，兩者的勢力先在所謂西土耳其斯坦（今天的烏茲別克、塔吉克、土庫曼、阿富汗）交鋒，形成所謂的 *The Great Game*。⁶⁴ 後來競逐的方向再向東擴及所謂的「東土耳其斯坦」或「中屬土耳其斯坦」，亦即中國的古西域。大規模的地理與文物探勘，是英俄彼此競逐的一部分。一八七九年俄國人探勘吐魯番盆地的植物，並報導當地發現的古文化。一八九〇及一九〇〇年代，俄人又數次探勘該地區，發現當地的考古遺址與古文獻。⁶⁵ 一八九〇年英國軍官 Hamilton Bower (1858-1940) 在庫車發現古梵文的佛經手稿。⁶⁶ 這些文獻的發現引發更多探險家的興趣。

探勘東土耳其斯坦的探險家，並不只有俄、英籍人。一八九三至一八九七年間，瑞典人 Sven Hedin (1865-1952) 接受俄人資助，穿越峻冷的帕米爾高原（蔥嶺）探勘炎熱乾旱的塔克拉瑪干沙漠，出版內容豐富的照片與遊記。⁶⁷ Hedin 從凶險的該地區探險生還，激起原籍匈牙利的斯坦因探勘該地區的興趣。因為英國

⁶³ 陳寅恪，〈敦煌劫餘錄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2 (1930)：231。

⁶⁴ Peter Hopkirk, *The Great Game: The Struggl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New York: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92).

⁶⁵ Peter Hopkirk, *Foreign Devils on the Silk Road: The Search for the Lost Treasures of Central Asia* (Amherst, M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0), pp. 198-202.

⁶⁶ Jack Autrey Dabbs, *History of the Discovery and Exploration of Chinese Turkestan* (The Hague: Mouton, 1963), p. 105; Hopkirk, *Foreign Devils on the Silk Road*, pp. 43-48.

⁶⁷ Hopkirk, *Foreign Devils on the Silk Road*, pp. 54-67.

勢力對中亞競逐早有所圖，斯坦因得到英國的印度殖民政府資助，在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一年重踏玄奘從唐朝赴天竺的路線，發現了大量的佛教繪畫與雕塑及梵文文書。⁶⁸

俄國和英國的發現引起德國學界的重視。德國是後起的殖民國家，在中東雖無控制的地區，但由於中東奧圖曼與波斯等國對最有力的殖民國家英、法兩國的疑懼，反而接納德國的學者進行上節提到的考古探勘與發掘。Hedin、斯坦因之後，德國在 Albert Grünwedel (1856-1935) 及 Albert von le Coq (1860-1930) 帶領下，於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七年發起四次的西域探勘，因為在吐魯番獲得最多的佛教繪畫與多種中亞與東亞語文的文獻，德人稱為吐魯番探勘 (Turfan Expeditions)。⁶⁹ 日本也在一九〇二至一九〇四年派人探勘吐魯番。⁷⁰

斯坦因於一九〇七年進行第二次探勘發現敦煌千佛洞。⁷¹ 伯希和的吐魯番探勘於一九〇六年出發，在斯坦因發現千佛洞後三個月抵達該地，挑選斯坦因留下的珍品。英、法發現敦煌後，德國、日本和俄國又紛派探勘隊到敦煌，斯坦因和伯希和也曾各自再回到敦煌探勘。⁷² 兩人的發現，可說震驚學界。

敦煌之外，俄國人也於一九〇八年在內蒙古發現西夏的黑水 (Khara Khoto) 古城，並蒐得大量的西夏文書。斯坦因也在一九一七年探訪黑水城。⁷³

探險所發現的古文字、文獻必須依賴 philology 學者解讀。俄裔德籍的 Wilhelm Grube (1855-1908) 依賴一份偶然發現的明朝《漢夷譯語》中漢文和女真對譯的字表，於一八八五年成功解讀女真文，與西域的探勘無直接相關。⁷⁴ 上述 Bower 在西域發現的佛經，由人在印度的印歐語文學者 Rudolf Hoernlé (1841-1918) 判定是由梵文書寫而成，並由他勘訂、翻譯出版。⁷⁵ 德國吐魯番探勘發現的文書，不少以西域的失傳語文書寫。其中粟特文最早由 Friedrich Carl Andreas

⁶⁸ Hopkirk, *Foreign Devils on the Silk Road*, pp. 66-110.

⁶⁹ Hopkirk, *Foreign Devils on the Silk Road*, pp. 110-147.

⁷⁰ Hopkirk, *Foreign Devils on the Silk Road*, pp. 190-191.

⁷¹ Hopkirk, *Foreign Devils on the Silk Road*, pp. 156-176.

⁷² Hopkirk, *Foreign Devils on the Silk Road*, pp. 158-169, 182-185, 204-205.

⁷³ Kira Fyodorovna Samosyuk, "The Discovery of Khara-Khoto," in *Lost Empire of the Silk Road: Buddhist Art from Khara Khoto*, ed. Mikhail B. Piotrovskii (Milano: Electa, 1993); 向達, 〈斯坦因黑水獲古紀略〉,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4.3 (1930): 7-71。

⁷⁴ Édouard Chavannes, "Nécrologie: Le Professeur Wilhelm Grube," *T'oung Pao* 9.4 (1890): 593-595.

⁷⁵ Hopkirk, *Foreign Devils on the Silk Road*, pp. 45-48.

(1846-1930) 及上述的 Friedrich W. K. Müller 成功解讀。而吐火羅文則由德國的 Emil Sieg (1866-1951) 和 Wilhelm Siegling (1880-1946) 破解。⁷⁶ 他們找到同書異文的翻譯，而能解讀失傳的語文，並依循 comparative philology 的方法，將所解讀的語文和已知的印歐語言比較後分類，重建其文法。他們也利用新建立的語言知識，編校並分析這些語言中的摩尼教經典的殘本。Müller 同時也研究西域出土、古土耳其文所書寫的佛經及摩尼教文書。Sieg 編校西域所出土文獻中的梵文文法。⁷⁷ 這些德國學者及其研究同伴如上述的 Huth、Le Coq 在一九一〇年代前就完成這些語言的文法重建。其根本都是他們對印歐語言、特別是伊朗語族的知識，經過比較，連接語言之間的繼承關係，而重建其文法。⁷⁸ 從此可見 oriental philology 及 comparative philology 在西域語言上的應用，及德國在這些領域的領先地位。

應用歐洲的 philology 知識到西域語文研究，俄羅斯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相對於英、德、法，俄國固然文化和知識上的地位相對邊陲，philology 研究的起步較晚，但俄國是 The Great Game 的主角之一，對其鄰近少數民族的語文，有戰略上的興趣，故其研究早於德、法兩國。十九世紀在德國受過 philology 訓練的 Franz Anton Schiefner (1817-1879)，研究俄羅斯境內高加索地區的語言及芬蘭 (Finnic) 系語文，並於一八五二年接受俄國政府指定研究藏文；此外他也有蒙古文的知識。⁷⁹ 他的學生 Grube (上述) 跟隨他學習藏、蒙等語文後，在聖彼得堡的科學院解讀鴨綠江及黑龍江流域的文書。Grube 後來赴德進修，成功解讀女真文字。⁸⁰ Aleksei Ivanovich Ivanov (1878-1957) 則是第一位成功解讀黑水城西夏文字的學者。⁸¹

⁷⁶ Valentine Stache-Rosen, *German Indologists: Biographies of Scholars in Indian Studies Writing in German*, 2nd ed. (New Delhi: Max Mueller Bhavan, 1990), pp. 169-171.

⁷⁷ Stache-Rosen, *German Indologists*; Franziska Torma, *Turkestan-Expeditionen: Zur Kulturgeschichte deutscher Forschungsreisen nach Mittelasien (1890-1930)*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2014), pp. 82-83.

⁷⁸ Stache-Rosen, *German Indologists*, pp. 169-171; Berlin-Brandenburg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ed., *Turfan Studies* (Berlin: Drukerei zu Altenburg, 2007), pp. 11-24.

⁷⁹ Hartmut Walravens, "Franz Anton Schiefner," in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vol. 22, ed. Otto Stolberg-Wernigerode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2005), pp. 736-738.

⁸⁰ Chavannes, "Wilhelm Grube," p. 593.

⁸¹ Denis C. Twitchett, Herbert Franke, and John King Fairbank, eds., "Discovery of Tangut Documents and the Decipherment of the Language,"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6,

西方漢學研究的發展原本另成一支，主要原因是漢語與印歐語言大不相同，也因為中國位置最為遙遠。以歐洲為中心，中國和日本是東方的最終點，所以稱為遠東 (Far East)。但漢學研究進入學院，也明顯受到 philology 的影響。十九世紀以前歐洲有關中國的知識，主要透過傳教士傳播，其目的主要在傳教。從十九世紀開始，學院裡的漢學研究者，逐漸都由 philologists 出任。柏林大學和法蘭西學院的漢學講座，是很好的例子。第一位在柏林教授中文的 Wilhelm Schott (1802-1889)，就學習並教授波斯文、土耳其文、藏、滿、蒙、日語等等。⁸² 後來的柏林大學漢學講座 Hans Georg von Gabelentz (1840-1893)，更是典型的 comparative philologist，只是他在印歐語言、非印歐的 Finno-Hungarian 語言之外，也掌握中文、日文。⁸³ 陳寅恪與傅斯年敬重的德國學者 Friedrich W. K. Müller (1863-1930)，是柏林民族學博物館的館長、柏林大學的兼任教授，在中文之外，也同時通曉梵文、回紇（或稱回鶻，也就是維吾爾 Uighur）文、阿拉伯文、敘利亞文及日文、藏文、馬來文等。⁸⁴ 這個傾向不只是德國獨有，十九世紀中法蘭西學院 (College de France) 的漢學講座 Stanislas Julien（儒蓮，或傅斯年譯為玉蓮，1797?-1873）就如同德國的漢學家一樣，在學習中文之前，也先修習過希臘、梵文、波斯、希伯來、阿拉伯等印歐甚至非印歐語言。⁸⁵ 後來接任法蘭西學院漢學講座的 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中文名沙畹），雖沒有中亞語言的背景，不過他在中學時得到優異的希臘、拉丁文訓練，大學接受當時法國學院內最好的中文訓練，更進而到中國進修語言，成為歐洲第一位親赴中國學習中文的漢學家。⁸⁶ 沙畹的學生伯希和則在中文之外，更有梵文及多種的中亞語言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710-136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675-676.

⁸² Hartmut Walravens, "Schott, Wilhelm Christian," in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vol. 23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2007), pp. 9-10.

⁸³ G. Schlegel, "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T'oung Pao* 5.1 (1894): 75.

⁸⁴ Desmond Durkin-Meisterernst, "F.W.K. Müller's Work on Iranian Languages," in *Turfan Revisited: 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s and Cultures of the Silk Road* (Berlin: Dietrich Reimer, 2004), p. 70.

⁸⁵ David B.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30.

⁸⁶ Noël Péri, "Nécrologie: Edouard Chavannes,"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8 (1918): 73-75.

的知識，是有名的 philologist。⁸⁷

歐洲各國在東土耳其斯坦的探勘活動，也吸引法國的興趣。斯坦因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探勘，都委託法國學者沙畹進行解讀，可說是法國學界接觸此課題的開端。沙畹並不以梵文或其他中亞語言聞名，在歐洲卻以其中文的研究能力著稱。前述沙畹的前輩 Julien 曾翻譯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及其弟子慧立所撰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⁸⁸ 沙畹最有名的是《史記》的法文翻譯與註解，也曾翻譯義淨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並很早注意非出版的中國文獻，如碑刻等。⁸⁹ 以沙畹的中文能力、對西域佛教歷史地理的了解、以及對中國非出版文獻的知識，可說是斯坦因委託研究最好的人選。歐洲一連串地理文物探勘的發展，使沙畹在一九〇七年親自到中國進行文獻的探勘，也促使法國政府資助伯希和探勘東土耳其斯坦。

日本的西域研究開始甚早，和中國學者如羅振玉及王國維的交往也很早。一九〇二到一九一〇年日本的大谷光瑞就曾三度資助西域的探勘。⁹⁰ 日本學者如狩野直喜 (1868-1947)、藤田豐八 (1869-1929) 與內藤湖南 (1866-1934) 密切掌握西歐、俄國研究動態，成為中國敦煌研究的先驅羅振玉、王國維等人的西方知識來源。⁹¹ 狩野自東京大學漢學科畢業，留學中國，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時，和當時駐在北京的伯希和一同受困，因而結識。⁹² 一九〇八年伯希和在探勘敦煌之後、回到法國之前，在北京展示部分蒐集的文書，羅振玉和王國維受邀參觀，羅、王兩人並將部分照片寄到京都，狩野和藤田因而得知伯希和的發現。一九一

⁸⁷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pp. 59-80.

⁸⁸ Hiouen-Thsang (玄奘), *Mémoires sur les contrées occidentales*, trans. Stanislas Julien (Paris: L'Imprimerie impériale, 1857); Huili (慧立), *Histoire de la vie de Hiouen-Thsang et de ses voyages dans l'Inde, depuis l'an 629 jusqu'en 645*, trans. Stanislas Julien (Paris: Imprimerie impériale, 1853).

⁸⁹ 沙畹並在一九一〇年後出版中國佛藏中的傳說。B. Laufer, "Édouard Chavann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38 (1918): 202-205.

⁹⁰ Imre Galambos and Kitsudō Kōichi, "Japanese Exploration of Central Asia: The Ōtani Expeditions and Their British Connection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75 (2012): 113-134.

⁹¹ 羅振玉、王國維和日本學者間的密切關係，是受杜正勝教授二〇一三年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講座」演講的啟發。特此致謝。

⁹² 高田時雄，〈支那語學支那文學：狩野直喜〉，礪波護、藤井讓治編，《京大東洋學の百年》（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2），頁 9-10。

○年，日本派遣狩野和藤田等人到北京考察從甘肅送回北京的敦煌殘卷。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間狩野留法一年，和伯希和合作，研究敦煌文獻。⁹³ 由於狩野的開創之功，使學界視他為日本敦煌學之父。羅振玉、羅的次子福萇、王國維等看到的敦煌文獻，多賴狩野從巴黎帶回京都與他們分閱。⁹⁴

藤田豐八是狩野在東京大學漢學科的老師，和羅振玉結識更早（1898）。藤田和羅家的關係非常親近。⁹⁵ 王國維在《東洋史要》的序（1898）中稱藤田為老師，並提到藤田教導他以科學的方法研究東洋史。⁹⁶ 藤田在中國居住的時間很長，曾在北京的京師大學堂擔任教席，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間羅振玉、王國維避難京都之時，藤田也在京都。這段時期，可謂藤田對西域史及中西交通史的開端。藤田後來擔任東京大學東洋史講座，再轉任臺北帝國大學。

內藤湖南也對西域研究有濃厚的興趣。羅振玉的長子福成治女真文，一九二三年在文章中提及他之所以知 Grube 的成就及著作，乃自內藤處得來。⁹⁷ 內藤始終關心西域之學，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甚至親自赴英、法目睹斯坦因及伯希和運回之敦煌文書，並出版報告。⁹⁸

羅振玉是最先報導伯希和發現的中國學者，也是第一位留意到女真文研究的中國學者。一九〇九年羅在參觀伯希和所得之部分敦煌文獻之後，就於一九〇九年在《東方雜誌》發表一篇簡短的報導。⁹⁹ 同年羅還編輯出版伯氏所示的漢文敦煌文獻，出版《敦煌石室遺書》。同樣在一九〇九年，羅收到藤田豐八寄來的英國地理學會雜誌，內附有斯坦因演講敦煌發現的內容，又讀到日本史學雜誌介紹德國第二次吐魯番探勘的發現。這些假道日本的消息，羅振玉都載入他為王國維〈流沙訪古記〉所做的序（1909）中。¹⁰⁰ 羅振玉對敦煌或西域研究極端重視，雖

⁹³ 高田時雄，〈支那語學支那文學〉，頁 16-17。

⁹⁴ 羅福萇，〈倫敦博物館敦煌書目〉，《國學季刊》1.1 (1923)：160-161。

⁹⁵ 羅振玉的次子福萇八歲時可以親暱地坐在藤田膝上，甚至考問年長的藤田，見羅福萇，〈倫敦博物館敦煌書目〉，頁 160。

⁹⁶ 王國維，〈中國史略序〉，桑原隲藏著，樊炳清譯，《東洋史要》（上海：東文學社，1899），頁 1r-2r。

⁹⁷ 羅福成，〈宴臺金源國書碑考〉，《國學季刊》1.4 (1923)：688。

⁹⁸ 高田時雄，〈內藤湖南の敦煌學〉，《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別冊 3》（大阪：関西大学，2008），頁 20-21。

⁹⁹ 羅振玉，〈敦煌石室書目及發現之原始〉，《東方雜誌》6.10 (1909)：42。

¹⁰⁰ 此文收入《敦煌石室遺書》第四卷之附錄。袁英光、劉寅生編，《王國維年譜長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頁 61。

然自己對中亞的歷史語言知識不足，但安排長子福成學習女真文，更栽培次子福萇學習法文、德文、梵文、西夏文、英、俄等多種語文，可惜福萇早逝。¹⁰¹

王國維的敦煌學成就不在羅振玉之下，和日本學界的關係也不下於羅。陳寅恪的王國維挽詞描述「伯沙博士同揚榘，……東國儒英誰地主？藤田狩野內藤虎」。將王的成就與伯希和、沙畹、藤田、狩野、內藤相提並論。和羅一樣，王雖然直接認識伯希和及沙畹等人，並也與之保持聯繫，但對國際敦煌學的動態，還經常透過日本學界得知。譬如他接觸到伯希和就職法蘭西學院教授的演說“*Les influences iraniennes en Asie Centrale et en Extrême-Orient*” (1912)，也是透過京都大學梵文教授榘亮三郎 (1872-1946) 的翻譯。王國維當時已是國學名家，但對伯希和的學問推崇備至，很快就將日文的譯文再翻譯成中文，並將標題改為〈近日東方古言語學及史學上之發明與其結論〉。此中譯於一九二三年刊在胡適主編的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的第一卷第一期。¹⁰²

這篇演說是伯希和於一九一一年就職法蘭西學院講座時所做，距離完成第一次敦煌探勘後不久。其演講具體說明了敦煌研究與印歐 philology 的關係，以及伯氏本人轉向到印歐 philology 的變化。伯希和先在巴黎從沙畹及 Henri Cordier (1849-1925) 學習中文，從 Sylvian Lévi (1863-1935) 習梵文。¹⁰³ 本來他的興趣在於中國研究的書目學、東南亞的地理風土及佛教史。¹⁰⁴ 敦煌的發現改變了他的學術走向。王國維的譯文描述伯希和的語言發現：

有出人意者，則印度歐羅巴語系（印度歐羅巴語系，亦謂之阿利安語系，即梵語、古波斯語、希臘語、拉丁語、哥特語 [Gothic] 等之總名。皆

¹⁰¹ 羅福萇，〈倫敦博物館敦煌書目〉，頁 160-161。

¹⁰² Paul Pelliot, “Les influences iraniennes en Asie Centrale et en Extrême-Orient,” *Revue d'Histoire et de Littérature Religieuses*, N.S., 3 (1912): 97-119; 日文譯文為榘亮三郎譯，〈「イラン」語族の民衆が中央亞細亞並に極東の地に及ぼせる影響〉，《藝文》8 (1912): 1-38; 王國維譯文為〈近日東方古言語學及史學上之發明與其結論〉，《國學季刊》1.1 (1923): 146-159。多謝審查人提醒，作者才能注意到此文。此譯文原本一九一九年就擬刊在《東方雜誌》，最後等到一九二三年，才刊在《國學季刊》。見房鑫亮，〈王國維對中國近現代出版業的貢獻〉，《探索與爭鳴》2013.5: 82。王國維對伯希和的推崇，可見袁英光、劉寅生，《王國維年譜長編》，頁 286-287。

¹⁰³ J. J. L. Duyvendak, “Paul Pelliot (May 28th 1878—October 26th 1945),” in *Paul Pelliot (1878-1945): His Life and Works: A Bibliography*, ed. Hartmut Walravens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2001), p. xiii.

¹⁰⁴ Duyvendak, “Paul Pelliot,” pp. xiv-xxi.

子同一母語出。其語昔分十種，皆謂此外更無屬此系之言語。至新疆諸古文字出，乃知其不然）之比較語言學，既於前世紀之後半大進其步，世人殆視為已盡此語系之全體矣；然中亞細亞所發現之言語中，又得世所未知語言三種。¹⁰⁵

王國維的譯文並不完全忠實原作，部分地方有大幅的刪減，部分則增加自己的解釋。這段引文，則是王國維自己增加，用來解釋敦煌文書中新發現的語言對印歐語言學的意義。可見王國維翻譯之時對印歐比較語言學 (Indo-European comparative philology) 已經有所認識。王國維的說明雖然是原文所無，但並不曲解全文的大意。伯希和的演說確實用最多的篇幅說明新發現的三種語言對學術的重要性。譯文繼續說：

此〔三〕種語言有以印度及小亞細亞之文字書之者，故言語學家一見即能讀之。當其初研究也，頗有暗中摸索之感，今日則一切疑惑已雲消霧散，始知此三種語言皆與吾儕日用之言語屬於一語系，即屬印度歐羅巴語系之言語也。

依伯希和所述，這三個語言，第一個是粟特文 (Sogdian)。此文已知屬伊朗語族，已有柏林 Müller (上述) 和伊朗語文專家 Andreas 研究。伯氏從敦煌帶回一粟特文佛經短篇，此篇已知也有漢文及藏文之譯本，伯氏委託其巴黎同事 Robert Gauthiot (1876-1916) 解讀。第二種語文為吐火羅文 (Tocharian)。吐火羅國之名見於印度及希臘典籍 (王國維自行再加上中國典籍)。該語文又分為兩方言。兩者有德國學者 Sieg 和 Siegling 研究。此語言雖屬印歐語系，但既不屬印度語族，又不屬波斯語族，是印歐語系中全新的語族。伯氏帶回巴黎的吐火羅文件，則委由巴黎的梵文學者 (Sylvian Lévi, 1863-1935) 和 Antoine Meillet (1866-1936) 解讀。第三種語言則尚未能識別，伯氏暫稱為東伊蘭 (伊朗) 語。¹⁰⁶ 則此三種語文，有兩種屬於伊朗語族。另一種雖非伊朗語族，但仍屬印歐語系。光是發現這三種語言，就是對印歐語言 philology 的重要貢獻。

伯氏接下來介紹這三種語言的分佈與意義。吐火羅語在吐魯番及庫車一帶及塔里木河以北；東伊朗語在塔里木河以南。而粟特人因為經商移動，其語言為整

¹⁰⁵ Pelliot 著，王國維譯，〈近日東方古言語學及史學上之發明與其結論〉，頁 148-149。

¹⁰⁶ Pelliot 著，王國維譯，〈近日東方古言語學及史學上之發明與其結論〉，頁 149-150；Pelliot, "Influences iraniennes," pp. 103-104.

個西域（即東土耳其斯坦）之通用語。¹⁰⁷ 中國在晉朝以後，與印度才有直接的交通。在此之前，佛教傳入中國，只能經過西域，而佛經的漢譯者，如名僧安世高（約西元第二世紀），乃是西域安息國王子。當時所有的佛經中之人名、地名及專有名詞，實則都透過這些語言音譯。佛教之外，景教、祆教與摩尼教三大宗教，也都透過這些中亞民族及其語言傳到中國。敦煌文獻還保有這些宗教的部分典籍，也保有這些民族留下的美術。

此地區還有波斯文，對重建回教傳播的歷史也有重要意義。回教七世紀後進入中亞細亞，主要由滅國後的波斯人帶到西域。成吉思汗的帝國也留下波斯文的記載，甚至山東曲阜的回教碑文、元代的碑碣，都有波斯文。明代四夷語中的回回語，也非阿拉伯語，而是波斯文。重要的是，波斯文也屬伊朗語族。

由此可見，粟特文、吐火羅文、東伊朗文及波斯文分別記載了佛教、景教、祆教、摩尼教與回教等世界重要宗教在中亞細亞甚至中國的足跡。而伯希和帶回的敦煌文書，第一可以重建已失傳的歷史語言，二來可以重建這些民族與宗教史。

再來伯氏談的是敦煌在藝術上的意義。在當時的歐洲，敦煌（或吐魯番）文書的發現固然對學界主流有重大的意義，但對一般大眾而言，深奧難懂的歷史文字，遠遠比不上敦煌畫軸與雕塑所帶來的視覺震撼。所以敦煌的藝術，對歐洲的資助者與大眾，意義反而更為重要。

綜合來說，伯希和認為，研究東土耳其斯坦的意義，第一在印歐比較語文學 (Indo-European comparative philology)，其次在比較宗教史，第三則在藝術。後兩者還需依賴 philology 的知識解讀。可見對伯氏而言，所謂的敦煌學，主要還是歐洲 philology 在中亞語文、宗教與美術的應用，也就是 oriental philology。

敦煌的發現，可說是把歐洲十九世紀以來的 oriental philology 和漢學研究的兩個傳統連接起來，而伯希和則是連接兩者最重要的人物。一九一一年伯氏演講當時，還需透過幾位 oriental philologists 的幫助，解讀粟特、吐火羅等文字的文書。不久之後，伯氏不僅可以自己研究這些歷史文字的文獻，還可掌握藏文、蒙古文及他原有的中文、梵文。¹⁰⁸ 伯氏研究的成績包括文獻解讀、民族史、歷史地

¹⁰⁷ Pelliot 著，王國維譯，〈近日東方古言語學及史學上之發明與其結論〉，頁 150-151；

Pelliot, "Influences iraniennes," pp. 104-105.

¹⁰⁸ Duyvendak, "Paul Pelliot," pp. xxii-xxiii.

理、佛教史與美術史，但時人和後人最看重的，還是他 philology 的功夫。¹⁰⁹ 由於伯希和在漢學、印歐語言研究及佛教研究等方面都有開創性的貢獻，相對於德國的吐魯番學者多半將自己的貢獻定位於印歐 philology 範圍之內，伯氏積極將自己的研究和漢語文獻及中國研究關聯起來，使得二十世紀上半葉學界每每視他為國際漢學及敦煌研究的第一人。

《國學季刊》的首期還刊出鋼和泰 (Alexander Staël von Holstein, 1877-1937) 的〈音譯梵書與中國古音〉，由胡適用中文譯出。鋼和泰的文章，大概是梵文專家在中國出版的第一篇作品。胡適在該期的〈發刊宣言〉中介紹該文說：「用梵文原本來對照漢文譯音的文字，很可以幫忙我們解決古音學上的許多困難問題。」¹¹⁰ 確實鋼氏在文中比較漢譯佛經中的陀羅尼與梵文的原本（或藏文的譯本），確定個別漢字在翻譯時的發音，並進而推求中古字音與音韻的轉變。¹¹¹ 胡適繼續寫到：「日本語裡、安南語裡，都保存有中國古音可以供我們參考比較。西藏文自唐朝以來，音讀雖然變了，而文字的拼法不曾變，更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比較，也許可以幫助我們發現中國古音裡有許多奇怪的複輔音呢。」¹¹² 可見胡適對比較語言研究的興趣。

雖然胡適讚許用比較中古外文和中文以研究古音，關心比較語言的用處，但先前他對歐洲的 comparative philology，顯然所知有限。前此在一九二一年，胡適談國語文法的研究法，談到用比較的方法研究四種材料：（一）中國古文文法；（二）中國各地方言的文法；（三）西洋古今語言的文法，如英、德、法、希臘、拉丁文法等；（四）東方古今語言的文法，如滿、蒙文法、梵文文法與日本文法等。¹¹³ 提到文法比較的方法，可見胡對比較文法學並不是完全無知。但是將梵文和滿文、日文等非屬印歐語系的文字放在一起，卻把梵文和同語系的西洋古今的文法分開，可見他不完全瞭解 comparative philology 的核心大義。

伯希和與鋼和泰的譯文說明，在陳寅恪與傅斯年回到中國之前，西方以

¹⁰⁹ Jean-Pierre Drège, "Avant-propos," in *Paul Pelliot, de l'histoire à la légende*, ed. Jean-Pierre Drège and Georges-Jean Pinault (Pari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res, 2013), p. 8;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p. 58. 一位審查人指出 Drège 的文章，謹致謝忱。

¹¹⁰ 胡適，〈發刊宣言〉，《國學季刊》1.1 (1923)：1。

¹¹¹ 鋼和泰著，胡適譯，〈音譯梵書與中國古音〉，《國學季刊》1.1 (1923)：47-56。

¹¹² 胡適，〈發刊宣言〉，頁 15。

¹¹³ 胡適，〈國語文法的研究法 1〉，《新青年》9.3 (1921)：2；〈國語文法的研究法 2〉，《新青年》9.4 (1921)：1。

philology 為根本的東方研究，已經開始介紹到中國了，而且日本是一重要的管道。在王國維出版伯希和演說的譯文後不久，馮承鈞 (1885-1946) 也開始大量翻譯法國漢學家如沙畹的著作，特別注重古西域的課題。¹¹⁴ 如果說王國維主要透過日本學者接觸法國的敦煌或西域研究，則馮承鈞可說是代表中國學界將法國的研究成果直接翻譯成中文的開端。

中國所謂的「東方學」從何而來呢？中國用東方對比西方，至少從《東方雜誌》（一九〇四年創刊）就已存在。¹¹⁵《東方雜誌》創刊時設想的，是聯合「東方」的中、日黃種人，抵抗「西方」的歐洲白種人。王國維翻譯伯希和的演講，標題不依原文做「伊朗語族語言」，而做「東方語言」，王本人並未交代原因。顯然是「伊朗」作為地名或語族名在中國少為人知，但到了一九二〇年代，「東方」一詞在中國已親切易懂。若以陳寅恪所謂之「敦煌學」稱呼西域之學（下詳），雖無不可，但範圍似乎過於侷限，不能包括敦煌之外（如吐魯番）的文獻。相形之下「東方學」較有彈性。既可以涵括西域語文及民族，又包括王本人研究的漢語文獻等，範圍較為廣闊。

羅振玉似乎是首先使用「東方學」之人。一九二三年，羅振玉創建「東方學會」，邀請陳三立、辜鴻銘與王國維等文化守舊派文人擔任董事。其章程第一條曰：「本會以研究東方三千年來之文化，約以哲學、歷史、文藝、美術四類止為宗旨。」¹¹⁶ 三千年的數字，顯然以中國為中心，不過並未排除東亞其他國家，更也包括西域、蒙古、西藏與滿洲等地區。

¹¹⁴ 馮幼年就留學比利時、法國，一九一一年在法國取得法律學位，但他的興趣旁及西域及南海的語言，曾從伯希和學習古西域的語言與文獻。他回國之後因法律及外語之長，先後在地方與北洋政府任職，一九二〇年進入北大教書。〈馮承鈞〉，史仲文、胡曉林、武金銘、劉士文、王文治主編，《中華文化人物辭海·文化人物》（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8），頁 506。馮承鈞最早的著作，為〈中國古代神話之研究〉，《國聞週報》6.9 (1929)：1-2；〈唐代華化蕃胡考〉，《東方雜誌》27.17 (1930)：65-83。他的譯作包括 Édouard Chavannes 著，《中國之旅行家》（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Sylvain Lévi and Édouard Chavannes 著，《法住記及所記阿羅漢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27）；Gustaaf Schlegel 著，《中國史乘中未詳諸國考證》（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Édouard Chavannes 著，《摩尼教流行中國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Sylvain Lévi 著，《大孔雀經藥叉名錄與地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Jos Mullie 著，《東蒙古遼代舊城探考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

¹¹⁵ 見〈新出東方雜誌簡要章程〉，《東方雜誌》1.1 (1904)：i-ii；別士，〈社說：論中日分合之關繫〉，《東方雜誌》1.1：1-3。

¹¹⁶ 王若，〈新發現羅振玉《東方學會簡》手稿跋〉，《中華讀書報》2008.08.20。

「東方學會」中的「東方學」，受到日本兩方面的影響。首先，一九二三年八月鄭孝胥在日記中記到羅振玉送給他〈東方學會簡章〉，同時寫說：「必西京之狩野、內藤……告知羅叔蘊，故有此響應之舉。」¹¹⁷ 一九二三年日本規劃模仿美國庚子賠款獎學金，將中國對日的庚子賠款及山東權利賠償金作為對中國文化研究的補助，委請狩野直喜等人規劃，邀請日本學界和友日之中國文人共同參加，於一九二五年成立了「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¹¹⁸ 羅振玉成立「東方學會」時間在「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之前，但由鄭孝胥之日記可知，「東方學會」之成立在響應日人提議。「東方學」之名稱，大概也是狩野等人的提議。¹¹⁹

其次，羅振玉所謂的「東方學」，實是前此日本學界的東洋史。在日本，「東洋史」一詞，是日本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開始接觸西洋學術時才出現。如 Stefan Tanaka 指出，東洋概念是日本和西方接觸後才產生。¹²⁰ 就如中國《東方雜誌》提出的東方，日本的東洋也是要對比於西洋。不過東洋這個觀念，一開始不僅包括日本，中國等也在內。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日本的學者和思想家，不斷為東洋這個概念提供文化、宗教、歷史的內容，證明東洋（特別是日本）的精神地位與文化的高度。可惜 Tanaka 未曾注意到，對日本人而言，日本和中國雖然同處東洋，但日本在同一時期，就把日本史和「東洋史」分開。一八九四年日本討論現代的歷史教學時，那珂通世（1851-1908）倡議歷史應該分成三個部分，分別是本國史、東洋史與西洋史。該議獲得採納，從此日本本國史、東洋史與西洋史三分成為日本史學的固定架構。¹²¹ 所以在日本，東洋包括日本，但東洋史並不包括日本史。¹²² 所謂漢譯最早的日本史書《東洋史要》（1899），由桑

¹¹⁷ 《鄭孝胥日記》，引自王若，〈新發現羅振玉《東方學會簡》手稿跋〉。

¹¹⁸ 山根幸夫，《東方文化事業の歴史：昭和前期における日中文化交流》（東京：汲古書院，2005）；桑兵，〈民國學界的老輩〉，《歷史研究》2005.6：4-5。

¹¹⁹ 大概也因為「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的成立，「東方學」、「東方文化」這些用語才漸漸在日本普及。一九二七年日本成立「東方考古學會」。一九二九年「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還資助東京、京都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山根幸夫，《東方文化事業の歴史》，頁 124-125。

¹²⁰ 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31-114.

¹²¹ 江上波夫編，田中正美著，童嶺譯，〈東洋學的系譜・那珂通世篇〉，《古典文學知識》2010.6：108-109。

¹²² 不過 Tanaka 有專章解釋，雖然日本的東洋概念包含中國，但二十世紀初，日本的思想家與歷史學家，著重在中國和日本不同的發展過程，以說明日本在文化上與制度上的優越。Tanaka, *Japan's Orient*, pp. 115-152.

原隲藏 (1871-1931) 所著，王國維作序，其內容即是中國歷史，不包含日本。¹²³ 內藤湖南在京都大學擔任日本第一個東洋史講座教授 (1907)，所教授和研究的包括遼金元及西域的中國史，但日本史不在其中。¹²⁴

同時中國的「東方學」研究者，也不將日本史包括在內。一九三三年中國所編的《日本期刊三十八種中東方學期刊篇目》，其中的刊名有東洋學、東洋史、支那學、佛教史與滿洲研究等，實則以中國史為主（不包括日本）。¹²⁵ 可說中國學界所謂的「東方學」，和日本學界所謂的東洋學，近乎重疊。

雖然羅振玉發起的「東方學會」本身影響似乎有限，但羅以學會為出版機關，為「東方學」迅速打響名聲。如上所述，羅從一九〇九年起，已領先中國學界，出版了《敦煌石室遺書》等敦煌現世的文獻。「東方學會」成立後，在一九二四年就出版了《東方學會叢刊》39種、115卷，隨後還出版了一系列敦煌文書，如《敦煌石室碎金》(1925)，《鳴沙石室佚書十八種》(1928)，也出版中國歷史上與邊疆相關的書刊（如《四夷館考》〔1924〕、《黑韃事略》〔1926〕）。該學會也出版中國史研究，如羅振玉的甲骨文研究（《殷虛書契考釋》〔1927〕）。由於該學會的敦煌文書的出版領先中國學界，也因此建立起敦煌研究和「東方學」緊密的關聯。

不過，羅振玉「東方學會」的出版物，雖然包括中國自己的研究，但一般狀況下，中國人自己的國史研究，稱為國故研究或國學。胡適在《國學季刊》的〈發刊宣言〉的核心論點，則反對將國史研究稱為國故研究，主張用國學稱呼，並且以現代的方法加以研究，此乃現代「國學研究」的先聲。西方學界透過漢文材料對中國史的詮釋，中國學者並不看重。

中國學界看重西人的「東方學」，但不看重其中國史的研究，其中有三個重要關鍵：第一是前述中國西域大量出世的文獻所帶來的新課題及其急迫感；第二是西方人在此課題上的突出成績；第三則是中國學者對西人漢文能力的不信任。這三點，用傅斯年的話說：

¹²³ 桑原隲藏著，樊炳清譯，《東洋史要》（上海：東文學社，1899）。日文原著為中學教科書，書名為《東洋史教科書：中等教育》(1898)。

¹²⁴ Takao Fujita,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ield of 'Oriental History' in Japan: To Facilitate Consideration of East Asian Studies in Modern Japan," in *A Selection of Essays on Oriental Studies of ICIS* (Osaka: Institute for Cultural Interaction Studies, Kansai University, 2011), p. 20.

¹²⁵ 這些期刊的刊名有東洋學、東洋史，甚至支那史，但並無「東方學」。為何內藤、狩野不建議羅振玉使用「東洋學社」，而用「東方學社」，並沒有原始文獻提供訊息。

西洋人研究中國或牽連中國的事物，本來沒有很多的成績，因為他們讀中國書不能親切，認中國事實不能嚴辯，所以關於一切文字審求，文籍考訂，史事辯別，等等，在他們永遠一籌莫展，但他們如有些地方比我們範圍來得寬些。我們中國人多是不會解決史籍上的四裔問題的……凡中國人所忽略，如匈奴、鮮卑、突厥、回紇、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等問題，在歐洲人卻是格外的注意……又如最有趣的一些材料，如神祇崇拜、歌謠、民俗，各地各時雕刻文飾之差別，中國人把他們忽略了千百年，還是歐洲人開頭為有規模的注意……¹²⁶

可見傅斯年及其他中國學者看重的，是西人對中國西北邊疆所做的研究，也就是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所謂的「四裔」研究，¹²⁷ 亦即是西人應用 *oriental philology* 研究西域的成績。

綜合來看，中國學界的「東方學」有三層意義。第一層最為主要，稱呼以敦煌學為主的外國漢學研究，研究區域主要為西域，還包括西藏、蒙古與滿洲等；也就是傅斯年口中所謂的西人的中國「四裔」研究。第二層意義的「東方學」，是西方學者的西域研究，加上由中國學者利用敦煌文物所產生之著作，陳寅恪在〈燉煌劫餘錄序〉所謂的「敦煌學」，符合這一層的意義。羅振玉、王國維的敦煌文物研究、陳垣的《燉煌劫餘錄》，也屬於這一層。第三層的意義最廣，在西域研究之外，還包括西方學者的漢學研究，中國人本身的國史研究。當時中國學界編輯日本的「東方學」期刊中的篇名目錄，也編輯美國甚至俄國的「東方學」書目，這裡的「東方學」屬於這一層次的意義。¹²⁸ 羅振玉「東方學社」在敦煌研究以外的出版品，以及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所謂「建立東方學的正統於中國」的「東方學」說法，都可說是「東方學」第三層的意義，也是最廣義的解釋。但學界搜羅的「東方學」研究目錄，都刪去了和中國不相關的部分，傅斯年、羅振玉所指的「東方學」，其範圍也不及蔥嶺以西。

陳寅恪心中的「東方學」究竟何謂，並不易答。他在歐洲親自修習過 *oriental philology* 的諸多內容，在清華也曾開授「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他在清華的

¹²⁶ 傅斯年，〈旨趣〉，頁 250。

¹²⁷ 桑兵，《國學與漢學——近代中外學界交往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頁 4。

¹²⁸ 譬如劉選民編，〈現代蘇聯的東方學文獻〉，《史學消息》1.2 (1936)：5-12；修（筆名），〈《美國東方學會會報》第六卷第一期〉，《圖書季刊》2.3 (1940)：533-535。

授課內容，是否包括中國研究以外的課題，已無法得知。可知的是，陳儘管梵文精深，古印度知識豐富，但其研究興趣也不及於印度歷史和文化的本身，最多只在東傳中國的佛教。¹²⁹

但歐洲的 *oriental philology* 或 *oriental studies* 則截然不同。二十世紀初，歐洲的東方研究已包括了從近東（土耳其、以色列、敘利亞）、阿拉伯半島、波斯、南亞、中亞（包括蔥嶺東西，含古代西域）到遠東（中、日、韓），甚至整個非洲等廣大地區的研究。顏虛心一九四〇年介紹法國的東方學，說明該領域的廣大，而且其情形也適用德國等其他歐美國家。¹³⁰ 陳懷宇分析德國出版的 *Orientalische Bibliographie*（東方研究書目，1888-1928）涵蓋之範圍，也說明了這點。¹³¹ 該書目甚至還包括大洋洲的研究，等於說歐洲的東方研究集合歐洲、美洲以外的所有地區。但如果說西域以東的東亞研究才算東方學，則所有的歐洲學界都不能接受。

陳寅恪、傅斯年及胡適等人，對中國文化與學術有深沈的危機感。西方列強的壓迫固然是背景，但是深切了解自己的文化與學術已經遠遠落後歐美，不改變落後更大，是更重要的原因。胡適在〈發刊宣言〉中排斥以封閉的心態研究「國粹」，而提倡用開闊進步的視野，引進西方的方法研究中國的歷史：

西洋學者研究古學的方法早已影響日本的學術界，而我們還在冥行索塗的時期。我們此時正應該虛心採用他們的科學的方法，補救我們沒有條理系統的習慣。第二，材料上，歐美日本學術界有無數的成績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比較，可以給我們開無數新法門，可以給我們添無數借鑑的鏡。¹³²

王國維透過日本學界掌握並翻譯伯希和的論文，正呼應胡適所說，西洋領先、日本隨後、中國正待急起直追的順序。《國學季刊》首期刊出了國學大家王國維翻譯西方漢學第一人伯希和談中亞的歷史語言的文章，其歷史意義不能小覷。

陳寅恪所謂的敦煌學、或是當時中國學界的「東方學」，有幾個學術史上的重要意義。第一，敦煌石窟所藏同時包括西域語文和漢文文獻，把歐洲向東擴張的 *oriental philology* 和西方原本自成傳統的漢學研究連接起來。英、俄人因地緣

¹²⁹ 陳懷宇稱此為陳寅恪的「文化民族主義」。陳懷宇，《在西方發現陳寅恪》，頁 306-317。另見王震邦，《獨立與自由》，頁 80。但陳所謂的東方學是西方的意義，或中國特有的意義（如下文），未見演講內容，實難下定論。

¹³⁰ 顏虛心，〈法國近百年東方學研究歷程〉，《東方雜誌》37.19 (1940)：20-31。

¹³¹ 陳懷宇，《在西方發現陳寅恪》，頁 186-194。

¹³² 胡適，〈發刊宣言〉，頁 16。

政治的關係，是西域文獻探勘的先驅，德國在 *oriental philology* 的學術成就最高，法人伯希和則是連結 *oriental philology* 和漢學的關鍵人物，也是此研究的佼佼者。第二，西域研究或敦煌學，把歐洲、俄國、日本、和中國的學術社群連接起來。歐洲、俄國、日本人的研究者從 *oriental philology* 出發，歐洲是其中心。第一輩的中國敦煌學者從漢文出發，對於西方 *philology* 的知識則先依賴日本學者媒介，羅振玉和王國維是中國敦煌學的先驅，但了解伯希和的研究，還必須依賴日文譯本。第三，中國學界大張旗鼓提倡敦煌學或「東方學」之時，也正是學界以現代方法研究「國學」之際。甚至可說，敦煌研究是中國學術現代化的一部分。王譯的伯希和演講，刊登在胡適主編、作序的《國學季刊》第一期，就有這個象徵意義。

年輕的陳寅恪對於參與敦煌研究的潮流，心嚮往之。既然敦煌研究，是西方學者應用 *philology* 在西域材料，陳寅恪的做法，並不是到法國從伯希和學習漢學（沙畹已於一九一八年過世），而是選擇到歐洲 *philology* 的中心——柏林——留學。

三・從德國引進 *philology*：姚從吾、羅家倫、毛子水，與陳寅恪

中國學生第一手學習西方的 *philology*，並進而介紹到中國，時間在一九二〇年代。在此之前，留學德國的中國學生不多。其中最有名的是蔡元培（1868-1940）。他在一九〇七至一九一一年留學柏林及萊比錫（Leipzig），從有名的哲學家 Friedrich Paulsen（1846-1908）學習哲學，特別是倫理學。蔡也學習民族學、實驗心理學及美學。¹³³ 張君勱（1887-1969）兩度留學德國（1913-1915、1918-1921），先學國家學（*Staatswissenschaft*），後學哲學，在 Jena 大學從獲得一九〇八年諾貝爾文學獎的 Rudolf Eucken（1846-1926）學習哲學，著重在新觀念論（*Neo-idealism*）。兩人都對 *philology* 興趣不大，著作裡也幾乎沒有談及。談論 *philology* 的，以陳寅恪、傅斯年等人最多；姚從吾、毛子水與羅家倫等因為學習文史的關係，也接觸了這門學問。

¹³³ 關於蔡元培留學所學，可見蔡元培，〈民族學上的進化觀（1934）〉，《蔡元培選集》（臺北：文星書店，1968），頁 83。

姚、陳、傅等人留學時，柏林大學和中國、西域研究相關的學者包括 August Hermann Francke (1870-1930) 專長藏文文獻學，Erich Haenich (1880-1966) 授蒙古文、滿文、藏文、和其他中亞語文，Johannes Schubert (1896-1976) 授蒙古文與藏文，Erich Hauer (1878-1936) 教滿文，Otto Franke (1863-1943) 則為地位最高的漢學講座。¹³⁴ 從這些師資可知，該校的漢學取向主要也是兼習各種中亞、南亞及東亞語言文獻，反映了當時歐洲的漢學研究受 oriental philology 的影響。

姚後來成為遼金元史的研究者，正是在這樣的語言條件與研究視野下訓練出來的。姚從吾在北大畢業後由歷史系選送柏林進修。大概也就因歷史系授予的任務，姚初到柏林，就選修歷史學家 Kurt Breysig (1866-1940) 的課，讀歷史大綱、歷史哲學，並始終留意歐洲的歷史方法與學派。¹³⁵ 初到柏林期間，姚就讀到 Grimm 兄弟所編的童話，作為學習德文的讀物，因此接觸到 Grimm 的 literary 及 national philology。¹³⁶ 姚從吾在一九五〇年前的作品不多，其中可以分成兩大類。第一大類是介紹歐洲的學術，其中還可以分成兩種。一是介紹歐洲的史學思想與史家，如〈德國史學界所稱道的幾種歷史觀〉(1930) 及〈德國佛郎克教授對於中國歷史研究的貢獻〉(1936)；第二是介紹歐洲 oriental philology 中有關中國「四裔」的研究，如〈歐洲學者對於匈奴的研究〉(1930)。第二大類是姚自己的研究，全部和四裔研究，包括〈中國造紙術輸入歐洲考〉(1928)、「Ein kurzer Beitrag zur Quellenkritik der Reichsannalen der Kin- und Yuan Dynastie」(1933)、〈談阿保機時代的漢城〉(1935) 及〈成吉思汗時代的沙漫教〉。

姚在〈德國史學界所稱道的幾種歷史觀〉一文中，就以 Ernst Bernheim (1850-1942)《歷史學概論》(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一書中的理論，為歷史觀分類。¹³⁷ Bernheim 的書在一九〇五年首刊，姚則引用一九二六年的版本，姚在北大教書，一直到臺大教書，都還以 Bernheim 的書為他歷史學方法的參考書。姚所介紹的佛郎克教授就是上述的柏林大學漢學講座 Otto Franke，和法國的 Chavannes 一樣，Franke 也屬於親自到過中國學習中文的漢學家世代。Franke 寫過厚重的中國通史，以儒家思想作為貫穿中國式的核心，使西方人得以

¹³⁴ Huber and Niermann, "Tibetan Studies," pp. 104-105, 107; 張國剛，〈陳寅恪留德時期柏林的漢學與印度學〉。

¹³⁵ 姚從吾，〈史學系派遣留德學生姚士鰲致朱邊先先生書〉，《北京大學日刊》1465 (1924)：2-3。

¹³⁶ 姚從吾，〈史學系派遣留德學生姚士鰲致朱邊先先生書〉。

¹³⁷ 姚從吾，〈德國史學界所稱道的幾種歷史觀〉，《留德學志》1 (1930)：9-10。

完整地了解中國的歷史；他同情當代的中國，支持康、梁與胡適等的政治與文化改革。相對於德國（甚至整個歐洲）的思想界主流輕視中國歷史和文化，Franke 則為中國辯護。¹³⁸ 綜合這些因素，使得姚在西方學者中，對 Franke 有最高的評價。在〈歐洲學者對於匈奴的研究〉一文中，姚從吾介紹歐洲從十八至二十世紀的匈奴研究，最重要的有 Joseph de Guignes (1721-1800)、Friedrich Hirth (1845-1926)、J. J. M. de Groot (1845-1921)。姚對十八世紀的匈奴研究先驅 de Guignes 的評論，很有代表性：

記載方面的史料，翻譯既屬無幾；考古掘地，亦未進行。而上古史最重要的補助科學，如語言學，人類學，人種學等，均未發達；記載以外的史料，更是全付闕如。得幾內 (de Guignes) 雖然終身勤勞，對「匈奴通史」，仍難有滿意的成就。

對姚從吾而言，語言、文獻及考古對歷史研究至關重要；可見德國 philology 及 Altertumswissenschaft 的價值，在他心目中的重要。

姚本人對遼金元史的研究及造紙術西傳的研究，有兩個特色。第一，延續他介紹匈奴研究的主調，亦即以歐洲、甚至日本已有的 oriental philology 的成果為基本。譬如他在造紙術西傳的研究中，有很大的篇幅整理敦煌與西域發現的古紙，及造紙術在阿拉伯世界出現的記載。¹³⁹ 他對蒙古宗教的研究，也是從俄國和德國學者的研究出發，指出史書中蒙古人的宗教，就是沙漫教 (shamanism，今譯薩滿教)，是種以巫或沙漫為中心的信仰。¹⁴⁰ 值得注意的，西方對蒙古宗教之類的研究，有濃厚的民族學 (ethnology 或德文謂 Volkskunde) 的意味，不過在二十世紀初，民族學的研究有大的成分還依賴古文獻的研究。

第二，和歐、日學者不同的，是姚對中文材料嫻熟，所以能充分使用相關中國史書中的記載。他在造紙術的研究中，就全面整理中文文獻有關造紙最早的記載。¹⁴¹ 他對蒙古宗教的研究，最多的篇幅在引用漢譯蒙古秘史的記載做考據。在遼初所謂「漢城」的研究，姚修正日本學者箭內互 (1875-1926) 的說法，¹⁴² 引用的都是中國文獻。

¹³⁸ 姚從吾，〈德國佛郎克教授對於中國歷史研究的貢獻〉，《新中華》4.1 (1936)：116-125。

¹³⁹ 姚從吾，〈中國造紙術輸入歐洲考〉，《輔仁學志》1.1 (1928)：24-56。

¹⁴⁰ 姚從吾，〈成吉思汗時代的沙漫教〉，《治史雜誌》1.1 (1937)：18-19。

¹⁴¹ 姚從吾，〈中國造紙術輸入歐洲考〉，頁 9-24。

¹⁴² 姚從吾，〈談阿保機時代的漢城〉，《國學季刊》5.1 (1935)：62-63。

姚的德文論文討論金元研究的 *Quellenkritik* (source criticism)，¹⁴³ 更直接說明他在 philology 的訓練與研究方法上的取向。如本文第一節所述，*Quellenkritik* 同是 philology 與歷史學的基本課題。姚在文章一開頭，就引蘭克的文章 “Zur Kritik neuerer Geschichtsschreiber”。蘭克一文的重點就是史學的 source criticism。姚將同樣的方法應用在金朝與元朝的史料之上，主要原因是女真與蒙古二族原本沒有文字，其立朝文獻不僅稀少而且複雜。要有嚴謹的 source criticism 的功夫，才能確定傳說史料的真偽，加以正確解釋。

姚在一九三〇年代回到中國，教授史學方法論，始終強調 philology 在歷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姚受北大之邀，接替傅斯年開授「歷史方法論」課程，教學持續依循 Bernheim 的教科書。¹⁴⁴ 姚的《歷史方法論》一書雖然晚至一九七一年才出版，但反映的當是他從一九二〇年代以來所學所教的內容。書中姚說：

自十九世紀初期史學大家尼博兒 (Niebuhr)，樂克 (Ranke) 兩位大師的名著相繼問世，創立了一種「語言文學的批評方法」(*die philologisch-kritische Methode*)，開始從語言文學方面下手，追尋史料形成的來源，批評史料可信的程度，建立一種信疑疑的客觀標準。由是學者治史的態度，耳目一新；研究歷史所採用的方法，為之改觀。¹⁴⁵

可見對姚及 Bernheim 所代表的德國史學主流而言，現代、客觀史學的方法立基於 philology 之上，philology 和史學無法分開。

羅家倫在這群文史學生中，有幾個特點：首先，相對於陳、傅、姚、毛不喜哲學與理論，羅對歷史哲學及思想史興趣濃厚；第二，他的興趣不在上古、中古史，而在現代史，特別是十九世紀以來中西接觸的歷史；第三，他在德國停留的時間不長，德國之外，他還在美國、法國留學幾年。但和姚從吾一樣，他也重視歷史研究法，譬如他討論史料的種類與價值，認為參與戰爭的平民之日記，其記事價值不輸軍方之戰報；又論報紙與期刊、政府檔案、甚至考古發掘之重要。¹⁴⁶ 這些材料，都是中國傳統文史研究所缺，而西方之歷史學借重於 philology 之處。

¹⁴³ Shih-ao Yao, “Ein kurzer Beitrag zur Quellenkritik der Reichsannalen der Kin- und Yuan Dynastie,” *Asia Major* 9 (1933): 580-590.

¹⁴⁴ 杜維運，〈後記〉，姚從吾，《歷史方法論》（收入札奇斯欽、陳捷先編，《姚從吾先生全集》〔臺北：正中書局，1971〕，第1集），頁77。

¹⁴⁵ 姚從吾，《歷史方法論》，頁8-9。

¹⁴⁶ 羅家倫，〈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與方法〉，《羅家倫先生文存》（臺北：國史館，1976），第2冊，頁55-56。

羅又說：「若是中國要有科學化的和傳記，非趕快分別專題、從蒐集、審定、研究史料著手不可。」¹⁴⁷ 當然，史料蒐集與考訂的重要，在二十世紀初，已是西方史學的基本常識，不必直接從 philology 借用。但是從姚從吾上面的引文看，可知這些歷史學功夫和 philology 重疊的關係。

毛子水著作不多，回憶師友的文章幾次談到德國留學時結識的師友，但對本身在德期間所學卻少有著墨。唯一的例外在〈記陳寅恪先生〉，談到他從陳寅恪處，得來許多「西方語學」（毛子水自注為 philology）的知識，毛同時提到陳寅恪研讀 Kaluza 的古英語文法。¹⁴⁸ 這段回憶顯示毛、陳二人在留學期間都對 philology 下過功夫，陳甚至還在東方學問外，研習中古英文的 philology 著作。

陳寅恪很少談及德國求學期間的課業。但近來林偉發現哈佛大學檔案裡陳寅恪的成績單和他與哈佛教授 Charles Rockwell Lanman (1850-1941) 的通信，得知很多陳寅恪國外求學的內容。Lanman 是哈佛 Indic philology 的教授，他在耶魯大學從有名的梵文專家 William Dwight Whitney (1827-1894) 學 philology，獲得博士學位。美國學界當時深受德國影響，許多學者即使不在德國取得博士學位，也到德國進修數年，Lanman 也曾赴德國進修，之後在哈佛大學任教，並曾擔任過美國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的會長 (1889-1890)。Lanman 的系研究南亞，但系名為 Indic Philology，也反映了德國以 philology 代表語言、文學、文明研究的取向。陳寅恪於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在哈佛求學期間，密集選修 Lanman 的課，一九二一年到了柏林之後，還和他保持通信，報告他在柏林修課的情形，留下陳在哈佛及柏林修課的訊息。¹⁴⁹

陳在哈佛的學習重心可說就是梵文、古典及比較 philology。他選修 Indic Philology 的課包括 Sanskrit in Relation to English and Latin and Greek、Pāli（巴利文）、Philosophical Sanskrit 與 Semitic: Arabic，另外還選修兩門古希臘典籍的閱讀，一是 Plato and Aristotle，二是 Homer and Herodotus。¹⁵⁰ 從課名可以看得出來，哈佛的課程還是依循 comparative philology 的原則，將印歐語言如梵文、希臘、拉丁、英文放在一起比較，並強調梵文的地位；阿拉伯文的教學，也放在

¹⁴⁷ 羅家倫，〈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與方法〉，頁 22。

¹⁴⁸ 毛子水，〈記陳寅恪先生〉，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毛子水全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1992），第 3 冊，頁 48。

¹⁴⁹ 林偉，〈陳寅恪的哈佛經歷〉，頁 141-142。

¹⁵⁰ 林偉，〈陳寅恪的哈佛經歷〉，頁 142-143。

Semitic 語系的架構下。英文既是印歐語文的一支，陳後來在柏林研習古英文法，也就有其脈絡。古典 philology 研究文學（如 Homer，中譯荷馬）、史學（如 Herodotus，中譯希羅多德）、哲學（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典籍的考訂與研究方法，當然也包含在哈佛課程之內。陳寅恪對 philology 的興趣與認同，還從他到了柏林之後，寄給 Lanman 一冊新出版的 Wilamowitz-Moellendorff 所著的 *Geschichte der Philology* (1921)，可以看出。¹⁵¹

陳寅恪於一九二一年到達柏林。十年之前求學中輟，這是他第二次到柏林求學。這次他投入學習梵文的 philology。據陳自述，他在柏林大學第一、二年修過的課包括 Vedas（吠陀）、Mṛcchakatikā（The Little Clay Cart，林偉譯做小泥車）、Ashoka Edicts（林譯：阿育王法敕）、Sāmkhya-pravacana-bhāṣya（林譯：數論經疏）、Dīgha Nikāya（林譯：長部經典）、Commentary on the Dhammapada（林譯：法句經疏）。¹⁵² Vedas 是印度最古老的文獻，內容介於神話及史詩之間，故事透露了敘事者民族對自然的想像，以及其所屬民族（外來）與當地被征服的民族間的互動；Mṛcchakatikā 是佛教主題的劇本；Ashoka Edicts 是古代印度阿育王護持佛法所刻的石碑詔令；Sāmkhya-pravacana-bhāṣya 則是古印度無神論哲學著作的注疏；Dīgha Nikāya（英文意是 Collection of Long Discourses），是巴利文書寫的小乘佛教重要的典籍；Dhammapada 則是梵文偈頌 (verse) 體的佛經。可見陳在柏林的梵文與巴利 philology 所學，涉獵古印度不同的文字、文體、碑刻、宗教和種族等主題。陳所修的課大多由上述的 Lüders 開授。

另外根據陳寅恪留下來的筆記本，可知他當時修習了大量的中亞與南亞語文與文獻學，包括藏文、梵文、蒙古文、滿文、巴利文、突厥、回紇、吐火羅、古伊朗文、俄文等等，其中的內容多是各種語文抄寫的佛經經文、詞彙及碑文，也包括耆那教（印度的宗教 Jainism）和摩尼教，也有德國吐魯番探險團蒐集的文獻等。¹⁵³

確實，除了梵文及巴利文獻之外，陳寅恪在柏林接觸到 oriental philology 在古西域文獻的應用。他在給 Lanman 的信中談到，他修了 Lüders 開設的一門課，

¹⁵¹ 林偉，〈陳寅恪的哈佛經歷〉，頁 147。

¹⁵² 林偉，〈陳寅恪的哈佛經歷〉，頁 149-150。

¹⁵³ 季羨林，〈從學習筆記本看陳寅恪先生的治學範圍和途徑〉，錢文忠編，《陳寅恪印象》（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頁 24-38。

主題是西域發現的佛經殘本，非常有趣。¹⁵⁴ 如上所述，德國的中國吐魯番探勘發現不少古西域的文獻，而且在斯坦因及伯希和發現敦煌之前，已經成功解讀其中幾種重要的文字，並翻譯了不少文獻。其中最重要文字學家之一，是上述的 Friedrich W. K. Müller。陳寅恪留學柏林時，Müller 也在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五年開授了吐魯番的佛教文獻。¹⁵⁵ Lüders 雖然到柏林大學任教的時間 (1909) 晚於吐魯番發掘，但也投入吐魯番文獻的整理與解讀。陳寅恪不需到巴黎就可以接觸到一手的西域語言與文獻的訓練。

陳寅恪回國之後，在清華第一年開授的課程，完全反映他在德國所受 philology 的訓練。這些課程除了第一節所提到的「年曆學」及第二節提到的「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外，還包括「佛經翻譯文學」、「古代碑誌與外族有關係者之比較研究」、「摩尼教經典與回紇文譯文之研究」、「佛教經典各種文學譯文之比較研究」、「蒙古滿洲之書籍及碑誌與歷史有關係者之研究」。¹⁵⁶

陳在著作中很少提到他在德國留學的經驗，少數的例外之一，是他說：

昔年德意志人於龜茲之西得貝葉梵文佛教經典甚多，柏林大學路德施教授 Prof. Heinrich Lüders 檢之，見其中有大莊嚴論殘本。予嘗游普魯士，從教授治東方古文字學，故亦夙聞其事。至今歲始得盡讀其印行之本。教授學術有盛名於世，而此校本尤其最精之作，凡能讀者皆自知之，不待為之贊揚。

茲僅就梵文原本考證論主之名字，及此論之原稱，並與中文原譯核校。¹⁵⁷

此段文字提到了幾個重點。首先，陳寅恪在柏林大學求學時修習「東方古文字學」，而且包括西域的古文字。第二，他梵文師事 Lüders，而且讀遍其編校的西域文獻。¹⁵⁸ 第三，立基於其師 Lüders 梵文編訂的成果上，陳的工作更進一步核校佛經原文與漢譯。陳提到德國人在龜茲之西得古代文書，就是德國在一九〇〇年代吐魯番探勘的成果。前述的 Friedrich W. K. Müller 解讀和比較粟特、回紇文

¹⁵⁴ 林偉，〈陳寅恪的哈佛經歷〉，頁 149-150。

¹⁵⁵ 張國剛，〈陳寅恪留德時期柏林的漢學與印度學〉，頁 92。

¹⁵⁶ 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頁 37。

¹⁵⁷ 陳寅恪，〈童受喻鬘論梵文殘本跋〉，《國立第一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1.3 (1927)：11。

¹⁵⁸ 包括 Heinrich Lüders, *Bruchstücke buddhistischer Dramen* (Berlin: G. Reimer, 1911); *Über die literarischen Funde von Ostturkistan* (Berlin: Verlag der König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14); *Bruchstücke der Kalpanāmaṇḍikā des Kumāralāta: Mit Schrifttafeln und 12 Lichtdrucktafeln* (Leipzig: Deutsche Morgenländische Gesellschaft, 1926).

書及同源的漢文譯本，Lüders 則解讀貝葉梵文佛教經典，並與梵文原文比對。陳寅恪文中的「東方古文字學」，則無疑是 *oriental philology*。

上述第三點其實就標示出了陳寅恪回到中國後最初十年的工作方向。此段時期他主要用心於考釋碑碣、文獻。特別之處在於他考據漢文文獻，卻引用梵文、藏文、滿文、蒙古文、西夏文及其他中亞文字決疑斷難，展現與清代以降考據學有別的治學取徑。如陳寅恪在〈支愍度學說考〉便以梵文原文 *cittam acittam* 來解釋中譯佛經中「有心無心」之原意。¹⁵⁹ 又如〈大乘義章書後〉引中譯佛學名詞「悉檀」之梵文原文 *Siddhānta* 決疑。¹⁶⁰ 他研究《蒙古源流》的系列論文，同時觸及蒙古、西夏、吐蕃（西藏）的文獻與歷史課題。¹⁶¹ 他還考釋《幾何原本》的滿文譯本、比較耶穌會士的幾何教材《數理精蘊》、並考量西方幾何教材的通例。¹⁶² 在陳寅恪藏書裏（如《高僧傳》），也可看到他在書頁上以梵文、粟特文與巴利文註解中文的佛教或歷史詞彙。¹⁶³

陳寅恪在留學德國時期，曾經在信中提到：

佛經、大乘經典，印度極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即小乘律之類，與佛教史有關者多中國譯文頗難解，我偶取金鋼經對勘一過，其註解自晉唐起至俞曲園止，其間數十百家，誤解不知其數。我以為除印度西域外國人外，中國人則晉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當得正確之解，其餘多是望文生義，不足道也。¹⁶⁴

¹⁵⁹ 陳寅恪，〈支愍度學說考〉，《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3），上冊，頁1-18。

¹⁶⁰ 陳寅恪，〈大乘義章書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2 (1928)：121-123。其他案例可見陳寅恪，〈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1 (1930)：1-5；〈敦煌本維摩詰經文殊師利問疾品演義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1：6-10；〈幾何原本滿文譯本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3 (1931)：281-282；〈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夏梵藏漢合璧校釋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4 (1932)：404-405。

¹⁶¹ 陳寅恪，〈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靈州寧夏榆林三城譯名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1 (1930)：125-129；〈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蒙古源流研究之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3 (1931)：310-311；〈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蒙古源流研究之四）〉，《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3：310-311。

¹⁶² 陳寅恪，〈幾何原本滿文譯本跋〉。

¹⁶³ 陳的註解見陳寅恪，《讀書札記三集》（收入陳美延編，《陳寅恪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22-23, 28, 30-31, 33-36, 39-40, 43等。

¹⁶⁴ 陳寅恪，〈與妹書 (1923)〉，《書信集》（收入陳美延編，《陳寅恪集》），頁1-2。

可見中國佛教自唐朝以來千年之間的無數誤讀，只有掌握梵文 philology，別無他法可以糾正。而當時中國學者當中，掌握梵文者，除了陳自己之外，並無他人。可見陳的自負。

陳寅恪心目中理想的研究方法，就是梵、藏、蒙、漢及中亞等多語文字的 philology，或是他稱之為「比較校刊學」：「蓋現在佛經之研究為比較校刊學，以藏文校梵文，而藏文有誤，更進一步以蒙文校之，又核以中文或稍參以中亞細亞出土之零篇斷簡，成為完全方法。」¹⁶⁵ 在論支愍度比較《合維摩詰經》的三個譯本時，陳寅恪認為他「博綜稽古」、「殊方異音」、「分章斷句」、「參考校異」，可媲美於「今日歷史語言學者之佛典比較研究方法」。¹⁶⁶ 此處的歷史語言學，也是 philology。陳所謂的「比較校刊學」，可說是特別意義下的 comparative philology，也就是以中文佛經譯本對校梵文原本及不同中亞語言的譯本。

西方原意的 comparative philology，陳寅恪在為王靜如（1903-1990）的《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夏梵藏漢合璧校釋》作序時，有所提及：

西夏語為支那語同系語言之一。吾國人治其學者絕少。即有之，亦不過以往讀金石刻詞之例，推測其文字而已。尚未有用今日比較語言學之方法，於同系語言中，考辨其音韻同異，探討其源流變遷……¹⁶⁷

比較同語系的語文（漢文與西夏），並探討其相近與相異，以及歷史關係與演變，此處陳所謂的比較語言學即 comparative philology。

近來不少學者注意到陳寅恪談 comparative philology，主要是因為清華大學國文試題所引起的風波。一九三二年陳寅恪為該校國文系入學考試，提出對對子的題目，一時引起全國議論，時論多有批評為復古守舊。陳自我辯護：

考國文不能不考文法，而中國文法在緬藏語系比較研究未發展前，不能不就與中國語言特點最有關之對子以代替文法，蓋藉此可以知聲韻、平仄、語辭、單複詞藏 (vocabulary) 貧富，為國文程度測驗最簡之法。平仄譬諸英文 accent，動、名詞之區別，英文亦需通而終可考取。以英文必須知文法，而國文豈可以不知乎？若馬眉叔之謬論上在中國文法界有勢力，正須摧陷廓清，代以藏緬比較之學！¹⁶⁸

¹⁶⁵ 陳寅恪，〈致傅斯年（1929.1.24）〉，《書信集》，頁 23。

¹⁶⁶ 陳寅恪，〈支愍度學說考〉，頁 17。

¹⁶⁷ 陳寅恪，〈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夏梵藏漢合璧校釋序〉，頁 404。

¹⁶⁸ 陳寅恪，〈致傅斯年（1932.8.17）〉，《書信集》，頁 42。

意即陳的原意在考中文文法，但現代的中文文法研究仍無成就，唯一可得的馬建忠的《馬氏文通》在陳眼中，更是完全錯誤。既無合適的中國文法研究可考，陳退而求其次，以考對子代替。陳認為，考對子可以測試受試者對中文聲韻、平仄、語辭、字彙之理解，也就是他對中文文法的掌握。

國文試題風波已有王震邦等人討論。¹⁶⁹ 王的重點在於輿論的反應，包含當時與後來的學者如何反應，關心的可說是陳的立場是對是錯。但對本文來說，此事件的重點，在於陳寅恪堅持，不用 comparative philology 方法，就無法產生及格的中國文法研究。這點堅持，可見陳所受歐洲十九、二十世紀以來的 comparative philology 影響之深。陳先說西方也有錯誤的比較方法：

昔日歐人往往以希伯來語言為世界語言之始祖，而自附其語言於希伯來語之支流末裔。迨乎近世，比較語言之學興，舊日謬誤之觀念得以革除。¹⁷⁰

接著陳論歐人發現正確的比較方法：

因其能取同系語言，如梵語波斯語等、互相比較研究，於是系內各個語言之特性逐漸發見。印歐系語言學，遂有今日之發達。故欲詳知確認一種語言之特殊現相及其性質如何，非綜合分析，互相比較，以研究之，不能為功。¹⁷¹

同樣的道理也當適用在中文的文法研究上。但當時中文的文法研究，如馬建忠以中文比附拉丁文法（或陳貶之為「格義」），以陳寅恪的標準視之，則是「穿鑿附會」：

所與互相比較者，又必須屬於同系中大同小異之語言。蓋不如此，則不獨不能確定，且常錯認其特性之所在，而成以一驢非馬，穿鑿附會之混沌怪物。……故今日中國必先將國文文法之「格義」觀念，摧陷廓清，然後遵循藏緬等與漢語同系語言，比較研究之途徑進行，將來自可達到中國文法成立之日。¹⁷²

陳念茲在茲的，是漢語的文法，既不能錯誤比附，也不能孤立研究，而必須仿效印歐語系的 comparative philology，將漢語和同語系的藏緬語一起比較研究。

陳寅恪這個堅持，其實是歐洲 comparative philology 在十九世紀出現後的發

¹⁶⁹ 王震邦，《獨立與自由》，頁 141-192。

¹⁷⁰ 陳寅恪，〈與劉淑雅論國文試題書（1932）〉，《書信集》，頁 160。

¹⁷¹ 陳寅恪，〈與劉淑雅論國文試題書（1932）〉，《書信集》，頁 160。

¹⁷² 陳寅恪，〈與劉淑雅論國文試題書（1932）〉，《書信集》，頁 160-161。

展。在這以前，希臘文、拉丁文，甚至德、法、英等語文，也有其文法研究，並非是互相比較的產物。十九世紀出現的 comparative philology，先比較印歐語系的語言，上溯源頭及演變，並分析語系內各個語言的特色，建立整個印歐語系，同樣的方法也應用在非印歐語系的語言。陳深信，只有將漢藏語系（或陳稱藏緬語系）的語言仔細比較後，才能產生可用的中文文法學。這樣的信念反映的是他對歐洲 comparative philology 的理解。

在陳的心目中，comparative philology 對漢學的可能貢獻，甚至高於有清一整代考證的成績：

藏文與中文係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與希臘、拉丁及英俄德法等之同屬一系。以此之故，音韻訓詁上，大有發明。因藏文數千年以用梵音字母拼寫，其變遷源流，較中文為明顯。如以西洋語言科學之法，為中藏比較之學，則成效都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¹⁷³

深信歐洲 comparative philology 方法及價值的中國學者，並非多數。王震邦謂：「歷史語言學原屬民國新史學刻意提倡的顯學，是新文化運動以來新史學的主流。」¹⁷⁴ 若「歷史語言學」是調廣義的史料考證、語言蒐集，甚至包括中國傳統的考據，則王此說可以成立。但若王所謂的「歷史語言學」為歐洲十九世紀以來發展的 philology，謂其為「新文化運動以來新史學的主流」，並非實情。如前所述，胡適對 comparative philology 理解有限。顧頡剛等「新史學」的傑出學者，因未能出國修習，也未能理解西方的 philology。陳寅恪深陷國文試題風暴時，向同為留學德國的傅斯年說：「以公當知此意，其餘之人，皆弟所不屑與之言比較語言文法學者。」¹⁷⁵ 可見知音之難覓！

桑兵則謂陳寅恪的學術方法代表法國的「影響研究」，勝過美國的「平行研究」。¹⁷⁶ 何者才是比較研究的正確方法，或何者較為優越，並非本文關懷，故而此處不論。所謂「影響研究」，桑兵引師從法國學派的哈佛英文系教授白璧德 (Irving Babbitt, 1865-1933) 客座北京時教授之影響說（如盧梭對羅拔士比、盧梭對雪萊之影響；當即個人與個人間之影響），或者吳宓所謂：「取各國之文章，

¹⁷³ 陳寅恪，〈與妹書 (1923)〉，《書信集》，頁 1-2。

¹⁷⁴ 王震邦，〈獨立與自由〉，頁 143-144。

¹⁷⁵ 陳寅恪，〈致傅斯年 (1932.8.17)〉，《書信集》。

¹⁷⁶ 桑兵，〈近代中外比較研究史管窺〉，頁 195-196。

而研其每篇每章每字之來源，今古及並世作者互受之影響。」¹⁷⁷ 意即影響研究，只考慮直接來源的影響。何謂「平行研究」，桑兵並未明確說明，總之是泛泛比較中西，「不是以事實聯繫為依據」。¹⁷⁸ 不過陳寅恪所師法的歐洲 comparative philology，是否能單以「影響研究」涵括，其實不無疑問。¹⁷⁹ 因為陳寅恪心目中的典範印歐比較語文學，就是梵、希、拉丁、德、英等多個同語系語文平行比較，上求同源的語言始祖，平行的語言間一來探求彼此在語系內遠近親疏的親屬關係，二來則凸顯個別語言的特色。而陳所求的，並不只是單尋中文字彙或文法的直接來源，而是藏、緬、漢等多個語言的「平行」研究。當然，陳強調的是，並非所有的語言都可以泛泛做「平行研究」。譬如中文和拉丁文並不屬於同一語系，而馬建忠拿來做平行比較，則陳萬萬不能接受。

陳寅恪雖然不研究中文的文法及聲韻，不過和 philologists 一樣，他注意到歷史上語言使用的問題，而且對於不同語言的接觸與影響，特別敏感。譬如他有名的〈四聲三問〉，主張中國音韻中，平上去入「四聲」的觀念，乃是中國文士受到梵文讀經的影響，借用梵文中三種不同的重音標記，區分中國的平上去三聲。¹⁸⁰ 他也注意到中原世家南遷，世家、文士使用的北方語言與南方庶民所使用的吳語之間的因應關係。¹⁸¹

陳寅恪後來的研究中心轉移到魏晉隋唐史。在這些著作裡，很難找到陳直接談及 philology 的地方。Philology 在其研究中的角色，只能從陳關心的議題中推求。依陳自敘，他治魏晉隋唐史的重點，第一就在種族。¹⁸² 南朝歷史的大課題為南渡的漢人與當地吳人的競合，¹⁸³ 論北朝重點則在統治中原的胡人與具文化及經濟優勢的漢人之互相依賴。¹⁸⁴ 在李唐氏族研究中，陳對不同的胡人種族統治中

¹⁷⁷ 桑兵，〈近代中外比較研究史管窺〉，頁 195。

¹⁷⁸ 桑兵，〈近代中外比較研究史管窺〉，頁 195-196。

¹⁷⁹ 桑兵的意見綜合了幾位研究陳寅恪比較文學研究者的評論。本文的用意在探討陳寅恪對 comparative philology 的態度，不在批評這些意見。

¹⁸⁰ 陳寅恪，〈四聲三問〉，《清華學報》9.2 (1934)：275-288。至於入聲字，則另屬一類，故總共有四聲。

¹⁸¹ 陳寅恪，〈東晉南朝之吳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1 (1936)：1-4。

¹⁸²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重慶：商務印書館，1943），頁 1。

¹⁸³ 陳寅恪，〈述東晉王導之功業 (1956)〉，《陳寅恪先生全集》（臺北：里仁書局，1979），頁 1454-1458。

¹⁸⁴ 如陳寅恪，〈崔浩與寇謙之 (1950)〉，《陳寅恪先生全集》，頁 585。

國，甚至漢人（如李氏）胡化，都有關注。¹⁸⁵ 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陳寅恪釋唐代興衰，先從魏晉時期中國的胡化開始，再說明北突厥、東突厥、吐蕃、南詔、回鶻、薛延陀、高麗等國的「盛衰連環」，密切牽引中國的國勢。¹⁸⁶ 他甚至認為胡人文化，是中國文化新生的重要力量：

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興，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啓，擴大恢復，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故欲通解李唐一代三百年之全史，其氏族問題實為最重要之關鍵。¹⁸⁷

種族和語言息息相關。如上所述，陳寅恪在〈四聲三問〉注意到大量的西域僧侶駐錫建業傳教，並影響漢人文士聲韻之觀念。¹⁸⁸ 在〈從史實論切韻〉則分析在永嘉亂後，舊有北方士族語言（即「雅音」）在南朝和北朝因種族情勢而生的變化，用《顏氏家訓》音辭篇的話，就是「南染吳越、北雜夷虜」。¹⁸⁹

其次，談論魏晉隋唐史，陳寅恪深入分析統治與權力的基礎。他對政治集團間的權力競爭特別敏感。曹操貧賤出身，重詞章，而司馬懿則出身世家，重名教，兩個社會集團的角力，甚至可以解釋魏晉清談的盛行。¹⁹⁰ 唐朝政治史則注重幾個政治集團。唐初最重要的是李唐出身的關隴集團（起於鮮卑六鎮）與山東貴族集團，¹⁹¹ 另外有山東「豪傑」集團（實即武裝農民）、蕃將集團、武則天家族所代表山東寒門，以及玄宗朝後進士出身的新興寒門官吏集團等等。¹⁹² 陳也注意到宗教與統治的課題。他有名的論文〈武曌與佛教〉，指出武氏為強調女性統治的正當性，在篤信佛教的唐朝，頒行經文中記載女主稱帝的《大雲經》，以信仰

¹⁸⁵ 陳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1 (1931)：39-48；〈李唐氏族之推測後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4 (1932)：511-516；〈三論李唐氏族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2 (1935)：175-178。

¹⁸⁶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頁 96-98。

¹⁸⁷ 陳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測後記〉，頁 516。

¹⁸⁸ 陳寅恪，〈四聲三問〉，頁 276-280。

¹⁸⁹ 陳寅恪，〈從史實論切韻〉，《嶺南學報》9.2 (1949)：1-18。

¹⁹⁰ 陳寅恪，〈清談與清談誤國〉，《陳寅恪先生全集》，頁 1467-1470。同時可見陳寅恪，〈崔浩與寇謙之 (1950)〉，《陳寅恪先生全集》，頁 587-589；〈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鍾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後 (1956)〉，《陳寅恪先生全集》，頁 1300-1305。

¹⁹¹ 這是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的核心主題。

¹⁹² 陳寅恪，〈記唐代之李武韋楊婚姻集團 (1954)〉，《陳寅恪先生全集》，頁 639-664；〈論唐代之蕃將與府兵 (1957)〉，《陳寅恪先生全集》，頁 665-678；〈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陳寅恪先生全集》，頁 619-638。

鞏固武氏女性主政的正當性。¹⁹³

以多民族互動與政治集團競爭的視角，研究中國朝代統治的性質，甚至探討信仰與統治正當性的關係，並非傳統中國所有。相對的，希臘眾多異族異語城邦國家之間的聯合與爭戰，甚至希臘與域外異民族的互動等，都是西方古典 philology 耳熟能詳的主題，也是陳研習的荷馬及希羅多德研究所不能不強調。如第一節所見，羅馬帝國同樣有複雜的種族與政治集團。基督教與統治正當性的關係，也從羅馬帝國後期開始，成為大課題。不同種族、宗教、社會階級（含種姓）、政治勢力的複雜關係，更是印度從吠陀時代歷經佛教時代、以迄於今的重要主題，修習古梵文、佛教歷史的陳寅恪，自然熟知。這些非中國傳統的視角，正可能是陳受益於古典與梵文 philology 之處。而陳的魏晉南北朝隋唐史關注佛教東傳與西域民族的種族、文化、宗教與藝術，更是直接得力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歐洲東方研究向中亞擴張的成果。可見 philology 在陳寅恪唐代史的重要。

再者，Max Müller 從梵文 philology 發展出來的比較神話學，在陳寅恪身上也看得到明顯的印記。Müller 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研究跨文化的神話起源與傳播，在 philology 學界有眾多的追隨者。陳寅恪的老師 Lüders 年輕時更將 Müller 原以英文出版的比較神話學的研究翻譯成德文。¹⁹⁴ 陳在中國開始其學術生涯後，也將觸角伸到神話的傳播，特別是佛教神話進入中國文學的歷史。陳說：「印度人為最富於玄想之民族，世界之神話故事多起源於天竺，今日治民俗學者皆知之矣。自佛教流傳中土之後，印度神話亦隨之輸入。」¹⁹⁵ 又說：

當日中央亞細亞說經例引故事以闡經義，此風蓋導源於天竺，後漸及於東方。故今大藏中《法句譬喻經》等體製，實印度人解釋佛典之正宗，此土釋經著述如天臺諸祖之書則已支那化，古語印度釋經之著作有異也。夫說經多引故事，而故事一經演講，不得不隨其說者聽者本身之程度及環境而生變易，固有原為一故事，而歧為二者，亦有原為二故事，而混為一者。又再同一事之中，亦可以甲人代乙人，或在同一人身上，亦可易丙事為丁事。¹⁹⁶

¹⁹³ 陳寅恪，〈武曌與佛教〉，《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2 (1935)：137-147。

¹⁹⁴ F. Max Müller, *Beiträge zu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Mythologie: Aus dem englischen übersetzt von Heinrich Lüders* (Leipzig: W. Engelmann, 1898).

¹⁹⁵ 陳寅恪，〈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2 (1930)：157。

¹⁹⁶ 陳寅恪，〈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頁 157。

要研究這些課題，必須熟知梵文佛教文獻的原典，以及故事在各地的轉變。相關故事在敦煌及其他中亞細亞地區出世，正可以說明中亞細亞在佛教東傳過程中的重要地位。依陳寅恪分析，曹冲秤象、華佗的醫技，雖然是正史的記載，其實都有濃重的神話成分，而根源都在佛經故事裡。¹⁹⁷《西遊記》作為小說，神話性質更無可疑，而陳寅恪也指出其故事如大鬧天宮、石猴、豬八戒招親等情節在佛教神話中的來源與變化。¹⁹⁸陳同時也在清華大學開授「佛經翻譯文學」（上述）、「中國文學中佛教故事之研究」等課程。¹⁹⁹

一九四〇年代陳寅恪開始探考白居易與元稹詩作，學術生涯邁入余英時所謂「史學三變」的第三變，研究文學史，其特色汪榮祖謂之「以詩證史」、「詩史互證」。²⁰⁰陳的工作主要是文學的考證，引用歷史知識或作者的其他著作，以說明作者生平、文中典故、詩作涵義；另一方面也有引用詩文，以說明歷史的時、地、人、物等。陳的元白文學考據，固然使用的中文傳世文獻最多，但也延續敦煌研究中 *oriental philology* 的功夫與唐史的研究。譬如他引土耳其文 *Kara Tuna* 解釋白居易詩中所指的紇邏敦。²⁰¹他在考證中數次引用倫敦、巴黎與北京的敦煌佛經與變文。²⁰²關於敦煌文獻的重要性，陳說：

樂天新樂府詩多用〔三三七之體〕，必有其故……印刻初時頗疑其與當時民間流行歌謠之體製有關，然苦無確據，不敢妄說，後見敦煌發見之變文俗曲殊多三三七句之體，始得其解。……²⁰³

亦即敦煌變文俗曲證明陳對新樂府詩的重要假設，即白居易新樂府的三三七格律，乃採自民間歌謠。

若以 *oriental philology* 的研究旨趣檢視，陳寅恪的元白研究中還有兩個特點。第一，如同他的唐朝政治史研究，陳詩文研究中也對唐朝生活的中亞文化特別敏感。他在多處指出元白詩中提到的胡樂、胡舞、胡服、胡騎、胡妝、胡雜戲，乃至唐朝溫泉與土耳其浴的關聯。²⁰⁴陳更考證白居易的胡人血統。²⁰⁵第

¹⁹⁷ 陳寅恪，〈三國志曹冲華佗傳與佛教故事〉，《清華學報》6.1 (1930)：17-20。

¹⁹⁸ 陳寅恪，〈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

¹⁹⁹ 桑兵，〈近代中外比較研究史管窺〉，頁193。

²⁰⁰ 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第八章。

²⁰¹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6），頁241。

²⁰²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21, 93, 242。

²⁰³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113-114。

²⁰⁴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22, 25, 37, 115, 136, 145, 147, 150, 156, 196-199, 246-248。

二，關於民間歌謠在新樂府中的重要角色，陳調：「樂天之作新樂府，以詩經古詩為體製，而其骨幹則實為當時民間之歌曲。」²⁰⁶ 這些民間歌謠，在敦煌俗曲中有文字的證據，但還有更多的歌謠只是口頭傳誦，未得形諸文字。不管是口傳或書寫，留意民間的故事和詩歌（含音樂），正是歐洲 philology 從十九世紀以來的傳統。

典故、人物、制度與史事考證在中國考證傳統裏早有先聲。陳寅恪的元白研究在考證之外，還集合了體裁、風格、格律、種族文化的分析，以及對民間文學的敏感。不知中國的傳統裏有多少這樣的典範？可知的是，相關的課題，在 Kaluza 研究 Chaucer、Lüders 研究佛教神話、史詩、劇作，以及大量的荷馬史詩研究裏，都可找到範例。

其實陳寅恪晚年研究白居易、元稹，甚至《再生緣》等文學史課題，在他考釋敦煌出土的佛典，及研究中國文學中的佛經故事時已見開端。他幾次考訂敦煌出土佛經的文體與真偽，並判斷其在中國的流通。²⁰⁷ 其中他說：

案佛典製裁長行與偈頌相間，演說經義是自然倣效之，故為散文與詩歌互用之體。後世衍變既久，其散文體中偶雜以詩歌者，遂成今日章回體小說。其保存原式仍用散文詩歌合體者，則為今日之彈詞。此種由佛經演變之文學……似不如逕稱為演義或較適當也。……演義小說文體原始之形式，及其嬗變之流別，……為中國文學史絕佳資料。²⁰⁸

陳在談《西遊記》中的佛教故事時也說：

觀近年發現之敦煌卷子中如《維摩詰文殊問疾品演義》諸書，益知宋代說經與近代彈詞章回體小說等多出於一源，而佛教經典之題材與後來小說文學蓋有直接關係，此為昔日吾國之治文學史者所未嘗留意者也。²⁰⁹

在這兩段引文中，陳寅恪都注意兩點：一是佛經故事在中國宗教與通俗文學中的流傳，二是注意文學體裁或文類 (genre) 的轉變。對於佛教故事的轉變，他又說：「若能溯其本源，析其成分，則可以窺見時代之風氣，批評作者之技能，於

²⁰⁵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292-305。

²⁰⁶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154。

²⁰⁷ 陳寅恪，〈敦煌本維摩詰經文殊師利問疾品演義跋〉；〈敦煌本心王投陀經及法句經跋尾〉，《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1 (1939)：19。

²⁰⁸ 陳寅恪，〈敦煌本維摩詰經文殊師利問疾品演義跋〉，頁 6。

²⁰⁹ 陳寅恪，〈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頁 157。

治小說史者儻亦一助歟。」²¹⁰ 指出文學 philology 對中國文學史可做的貢獻。

陳寅恪晚年在《論再生緣》中寫道：

寅恪少喜讀小說……讀彈詞七字唱之體則略知其內容大意後，輒棄去不復觀覽，蓋厭惡其繁複冗長也。及長游學四方，從師受天竺希臘之文，讀其史詩名著，始知所言宗教哲理，固有遠勝吾國彈詞七字唱者，然其構章遣詞，繁複見長，實與彈詞七字唱無差異……又中歲以後，研治元白長慶體詩，窮其流變，廣涉唐五代俗講之文，於彈詞七字唱之體，益復有所心會。²¹¹

「元白長慶體詩」（亦即「新樂府」詩）以及《再生緣》，都屬於陳寅恪所謂的彈詞七字唱。上面的引文總結陳從年輕學習古典及梵文 philology，到後來研究中國文學之經過。²¹² 可見陳學習 philology 時所研讀的希臘及梵文史詩，如何改變他對中國文學的視野，以至於指引他後來的元白詩體及《論再生緣》的研究。

四・傅斯年、史語所及 philology

傅斯年到達柏林的時間（1923）較陳寅恪為晚。傅一開始計畫學習物理，但後來興趣轉變，修習或自修許多 philology 的功課。傅甚至留下梵文和藏文的筆記，並製作了一本「言語學書目備簡」，意即 philology 的書單。²¹³ 可見 philology 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他回中國之後的教學、研究以及主持歷史語言研究所，philology 都在他的核心關懷中。

從傅留德晚期的書信來看，他的志向，就是在中國建立起 *Alturumswissenschaft*。他當時最心儀的中國學者有二：昔日的老師胡適，和大學同學顧頡剛（1893-1980）。當時顧頡剛發表了一系列古史辨的文章，指出過去視為信史的上古時代，其實是不同朝代的人在傳說的基礎上不斷修改、增飾的結果。傅斯年對顧頡剛的視野大加讚賞。傅在給胡適的信中談及顧頡剛，說顧的《古史辨》已得到：

²¹⁰ 陳寅恪，〈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頁 157。

²¹¹ 陳寅恪，〈論再生緣〉（收入《陳寅恪先生全集》），頁 1037。

²¹² 錢文忠，〈略論陳寅恪先生之比較觀及其在文學研究中之運用〉，王永興編，《紀念陳寅恪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頁 475-505。

²¹³ 王汎森、杜正勝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臺北：傅斯年先生百齡紀念籌備會，1995），頁 52。

一切經傳史家的總鎖鑰。……由此可得無數具體的問題，一條一條解決後可收漢學之局，可為後來求材料的考古學立下一個入門的御路，可以成 *Altertumswissenschaft* 之結晶軸。²¹⁴

在傅看來，顧自行掌握了中國言語學及文句批評（也就是 philology 的中國對應版）。他的功夫如果再加上西方的考古學，就可建立中國的 *Altertumswissenschaft*。德國 *Altertumswissenschaft* 便是以 philology 為核心，配合考古學，擴展到上古神話、宗教、政治等所有文化面向的研究。傅斯年一面羨慕顧頡剛的成就，一面也透露出自己建立中國的 *Altertumswissenschaft* 之志向。

傅斯年談到神話學、考古及 philology 對希臘古代研究的貢獻：

至于希臘史，因現今希臘神話學、考古學、語言學之研究，昔年之記載亦不及今日遠甚，羅馬史更無論矣。由於史料之搜集、校訂、編輯工作，又引起許多新的學問……如埃及考古之結果，而使二千餘年人類歷史中久已遺失部分復行發現。亞洲之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沿岸所發現之紀念物，亦藉考古學之助而得知，西亞細亞之人類如何脫去草昧時代，自愛琴海發掘後，得知希臘文化非突然興起，埃希文化之接觸，愛琴海實為主橋樑。……由各地發掘考古之貢獻，今人對於世界知識實在古人以前。²¹⁵

和姚從吾一樣，傅斯年也提到現（近）代歷史學依賴審訂、編纂史料的 philology：

所以近代史學亦可說是史料編輯之學，此種史學，……其編纂不僅在於記述，而且有特別鑑定之工夫，自此種風氣養成之後，各國皆有編纂史料之努力，重要之作品亦屬不少，如德國之 *Monumenta Germanae Historica*。²¹⁶

傅斯年強調西方現代學術在 chronology 上的成績，並以之對比司馬遷（145-87 BCE）的史學成就。²¹⁷ 談董作賓《殷曆譜》的貢獻，傅也從西方年代學說起：

歐洲治古史學者，率以年代學為其骨幹，此猶建屋之先布棟樑，而後土石磚瓦有所著也。自羅馬帝政以前，列國分立，其年代尤以希臘諸邦為最

²¹⁴ 傅斯年，〈傅斯年致胡適（1926年8月17、18日）〉，王汎森等，《傅斯年遺札》，頁43-52。

²¹⁵ 傅斯年，〈中西史學觀點之變遷（未刊稿）〉，歐陽哲生，《傅斯年全集》第3卷，頁155-156。

²¹⁶ 傅斯年，〈中西史學觀點之變遷（未刊稿）〉，歐陽哲生，《傅斯年全集》第3卷，頁155。

²¹⁷ 傅斯年，〈論太史公書之卓越〉，《傅斯年全集》第2冊，頁79。

紛，今日之曉然可知者，斯數百年學人遠求實證，冥搜義解之效也。²¹⁸

回到中國之後，傅斯年最早的教學和思考可說都從 philology 出發。比如他一再強調語言的重要：「思想就是語言」，「思想以語言為體，而不只是外用」、「哲學是語言的副產物」、「文學是根據語言、不是根據思想」、「思想不能離語言，故思想必為語言所支配」。²¹⁹ 這種語言是思想之本，文學依賴語言的信念，反映從 Humboldt 和 Max Müller 等人以來 philology 學界的共識。傅又說：

今試讀漢語翻譯之佛典，自求會悟，有些語句簡直莫明其妙，然而一旦做些梵文的功夫，可以化艱深為平易，化牽強為自然，豈不是那樣的思想很受那樣的語言支配嗎？……哲學應是邏輯的思想，邏輯的思想應該是不局促于某一種語言的，應是和算學一樣的容易翻譯，或者說，不待翻譯。然而適得其反，完全不能翻譯，則這些哲學受他們所由產生之語言之支配，又有甚麼疑惑呢？²²⁰

傅斯年在很多地方提到「語學」或「語言學」。他在〈史學方法導論〉說「其實史學語學是全不能分者」，²²¹ 在《性命古訓辯證》中說：「『以語言學的觀點解釋一箇思想史的問題』之一法，在法德多見之。」²²² 在上述這些地方，傅提到了「語言學」、「語學」。何以傅所說的是 philology，而非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 linguistics？答案很明顯而確鑿：傅的〈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裡就直稱 philology 為「語學」：

寫文學史應當無異於寫一音樂史或繪畫史者……若十足的漢學家，把事實排比一下就算了事，也不是對付文學的手段，因為文學畢竟是藝術……希望諸君能發乎考證，止乎欣感，以語學（大陸上謂之 philology）始，以「波濤動盪 (Sturm und Drang)」終。²²³

²¹⁸ 傅斯年，〈《殷曆譜》序〉，歐陽哲生，《傅斯年全集》第3卷，頁341。

²¹⁹ 傅斯年，〈戰國子家敘論〉，《傅斯年全集》第2冊，頁87；〈旨趣〉，頁246；〈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傅斯年全集》第1冊，頁10, 18；《性命古訓辯證》（收入《傅斯年全集》第2冊），頁246。

²²⁰ 傅斯年，〈戰國子家敘論〉，《傅斯年全集》第2冊，頁86。

²²¹ 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傅斯年全集》第2冊，頁23。

²²² 傅斯年，〈性命古訓辯證〉，頁169-170。

²²³ 傅斯年，〈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傅斯年全集》第1冊，頁12。Sturm und Drang 是十八世紀日爾曼地區的文學運動，突破傳統格式和道德的規範，強調情感的表達，被視為是浪漫主義的先聲。

傅並非是唯一一位這樣做的人：如上所述，毛子水在他的〈記陳寅恪先生〉，也直指 philology 為西方「語學」。而傅斯年為「歷史語言研究所」取的英文名稱，便是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則是他將 philology 翻為語言學的例子。

傅斯年最早的教學和思考的重點在《詩經》。這個選擇明顯跟他的老師胡適有關。傅在回國以前，就指出胡的《中國哲學史》有「不少可以損益之處」，他自己則「將來……未必不也寫一篇篇的中國古代思想集敘」。²²⁴ 因為傅認同胡適作《中國古代哲學史》「截斷眾流」，捨棄上古神話傳說，以《詩經》作為中國上古思想史真正的起源，所以傅的中國文學史選擇先從《詩經》開始。傅在中山大學教授的「中國古代文學史」從《詩經》講起，花在該書的比例也最大。他甚至單獨開授「詩經」一課。²²⁵

不同於清儒開始把六經視為史料，或胡適把六經視為哲學，傅斯年把《詩經》及其他儒家經典（如《論語》），作為文學材料分析，可說是 literary philology 的取徑。

討論古代文學，傅強調口傳文學的重要性，明顯受到歐洲 philology 的影響。他說到古印度吠陀（傅翻為「維代詩歌」）和古希臘的荷馬史詩，兩者都先以口頭傳唱流傳，但不愧是「成熟而有動盪力的文學」。或者說口傳文學是「歐洲文學的一個至大寶藏」。²²⁶ 對傅斯年而言，形諸文字甚至未必有益於文學：「文字發明以後，反而給大力量的文學一種打擊，使得他離去人們對於文學最自然的要求，而給文學若干的桎梏，使他作畸形發展。」²²⁷

傅斯年也重視口傳文學的史料價值：

古昔無文字之民族，每有巫祝一特殊階級，以口說傳史料，竟能經數百年，未甚失其原樣子。（舊約書之大部份由於口傳，後世乃以之著史。）……此等口傳的史料，每每將年代，世系，地域，弄得亂七八糟，然亦有很精要的史事為之保留，轉為文書史料所不逮。漢籍中之蒙古源流，即其顯例也。²²⁸

²²⁴ 傅斯年，〈傅斯年致胡適（1926年8月17、18日）〉，王汎森等，《傅斯年遺札》，頁44-45。

²²⁵ 〈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和〈詩經講義稿〉原來都是未出版的授課講義，但代表傅斯年授課的內容及上課期間的想法。

²²⁶ 傅斯年，〈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傅斯年全集》第1冊，頁20。

²²⁷ 傅斯年，〈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傅斯年全集》第1冊，頁44。

²²⁸ 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傅斯年全集》第2冊，頁60。其餘可見傅斯年，〈中國古

接著傅羨慕歐洲 philology 整理口傳文學的工作：

古代及中世之歐洲民族所有之口傳史料，因文化之振興及基督教之擴張而亡遺，獨其成為神話作為詩歌者，以其文學價值而得倖存，然已非純粹之口傳史事矣。近代工業文明尤其是掃蕩此等口傳文學與史事者。幸百年之前，德俄諸國已有學者從事搜集，故東歐西亞之此等文學與史料，尚藉此著於文字者不少。²²⁹

傅此處所指的德、俄學者，就是本文第一節所介紹的德國 Grimm 兄弟，及俄國的 Afanasyev 和 Buslaev 等人。

傅斯年也探討語言的多個層次——方言、階級語（不同階級使用的不同語言）、標準語（官話）、文言（文雅、藝術的語言，傅自注 *Kunstsprache*）、古文（已與口說語言脫鉤的書寫詩文）。傅將中國的古文比擬為歐洲天主教裡仍在使用的拉丁文。²³⁰ 另外傅的梵文老師 Lüders 就曾討論 *Kunstsprache* 或 *Kunstdichtung* (art language, art poetry)。²³¹

另外，傅主張秦朝以後，以秦文轉譯六經，造成系統性的古字錯認。²³² 這種錯認，在梵文研究裏有著名的例子。十一世紀時梵文經歷了根本性的書寫系統的變更，造成後世文獻許多轉譯錯誤。²³³

口語轉化到文字的歷史演進觀，以及語文的社會性格等主題，西方 philology 多有探討。所以傅斯年認為言語學（即 philology）是研究《詩經》的基本功夫。²³⁴

傅斯年在返國後最初幾年——也是他著述成績最豐的時期——發表了一系列上古史論文，仔細觀察，幾乎無一不應用古典 philology 和 Altertumwissenschaft 的視野與方法。他考察古代 authorship 的模糊，以及戰國古籍由 dialogue 進為

代文學史講義》，《傅斯年全集》第 1 冊，頁 28, 43；〈詩經講義稿〉，《傅斯年全集》第 1 冊，頁 205。

²²⁹ 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傅斯年全集》第 2 冊，頁 60。

²³⁰ 傅斯年，〈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傅斯年全集》第 1 冊，頁 29-40。

²³¹ 見 Hans Heinrich Schaeder, "Heinrich Lüders. 25 juni 1869—7 Mai 1943," *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Sprachforschung auf dem Gebiete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 68.3/4 (1944): 224.

²³² 傅斯年，〈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傅斯年全集》第 1 冊，頁 62。

²³³ Michael Witzel 著，張遠譯，〈十九、二十世紀的西方文獻學——以印度學為重心的回顧〉，《古今論衡》26 (2014): 131。

²³⁴ 傅斯年，〈詩經講義稿〉，《傅斯年全集》第 1 冊，頁 199。

monologue 的轉變，引柏拉圖的對話錄和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384-322 BCE) 的著述做說明。²³⁵ 談古代社會與世系，傳引西方多民族共存的社會，並舉神話與現實的混淆來說明。²³⁶ 論五等爵，則引西方中古到十九世紀的封建制度之爵位做參考。²³⁷ 論中國社會與政治體系，傳則引西方古史由部落到帝國的過程說明。²³⁸ 絲、禹之故事，傳以聖經中之創世傳說 (Genesis) 對比之。²³⁹

傅斯年在其得意的《性命古訓辯證》，更是以 philology 為出發點，來探討歷史的課題。他說到西方的例子：「『以語言學的觀點解釋一箇思想史的問題』之一法，在法德多見之。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研治柏拉圖亞里斯多德著書者，其出發點與其結論每屬於語學。」²⁴⁰ 傳自己處理性與命兩字在思想史上的轉變，「用語學的觀點視性命諸字之原，用歷史的觀點疏性論歷來之變」。²⁴¹ 不同於中國傳統的做法，傅斯年用「語學」分析性命兩字的起源，不僅使用傳統文獻，更全面搜羅可得金銘文幾十則，加以統計、分析。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當時雖已有金銘文、甲骨文的搜集，主要是輯古的性質，最多是釋讀。但像歐洲的 philology 一樣，全面搜集碑刻金文做字詞解讀，傅斯年可能是最早之人。傳又引進西方文法的觀念，以動、名、形容詞分析「性」、「命」二字在古籍出現時的詞性。²⁴² 就如 philology 常見的做法，傅斯年排列歷代的注疏，並加分析。傳參加第一次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的時候，說明自己的成就，特別提到自己的《性命古訓辯證》，自豪地說：「以語言學之立點，解決哲學史之問題，是為本卷之特點，在中國尚為首創。」²⁴³ 而在西方，如傅斯年本人所言，則自十九世紀時期就已開始。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說研治柏拉圖、亞里斯多德者，其出發點與其結論每屬於 philology，沒有問題，因為 philology 本來就在研究字詞文獻的解釋。但若說其出發點與其結論每屬於 linguistics，就無法理解了。

²³⁵ 傅斯年，〈戰國文籍中之篇式書體——一個短記〉，《傅斯年全集》第3冊，頁3-8。

²³⁶ 傅斯年，〈姜原〉，《傅斯年全集》第3冊，頁23。

²³⁷ 傅斯年，〈論所謂五等爵〉，《傅斯年全集》第3冊，頁63-69。

²³⁸ 傅斯年，〈夷夏東西說〉，《傅斯年全集》第3冊，頁86。

²³⁹ 傅斯年，〈夷夏東西說〉，《傅斯年全集》第3冊，頁110。

²⁴⁰ 傅斯年，〈性命古訓辯證〉，頁169-170。

²⁴¹ 傅斯年，〈性命古訓辯證〉，頁169。

²⁴² 傅斯年，〈性命古訓辯證〉，頁148, 154, 206, 223, 233-234, 237-238, 260, 262-263, 273, 314, 331, 337。

²⁴³ 李泉，〈傅斯年學術思想評傳〉，頁160。

宗教是西方學術研究的大課題，比較宗教和神話的重要，自 F. Max Müller 以來，更是彰顯。傅斯年以宗教意識來理解中國最早的「天命」或「天道」觀念，²⁴⁴ 甚至以西方自然論和 pantheism（傳譯為全神論）來理解孔子的宗教觀。²⁴⁵ 上古的宗教，傳藉西方比較演進的宗教觀念來解釋：

早年之圖騰標示、自然物與自然力，以及祖先，乃是初民崇拜之對象，從此演進，經若干步程，方有群神之主宰，方有抽象之皇天，方有普照之上帝。由崇神進而為上帝，由不相干之群神進為皇天之系統，必經過甚多政治的、社會的、思想的變化，方可到達。此種發展之步程可於印度、美所不達米亞、埃及、希臘、以色列各地古宗教史徵之。就中國論，古來一切稱帝之神王皆是宗神 (tribal gods)，每一部落有其特殊之宗神、因部落之混合成為宗神之混合，後來復以大一統思想之發達，成為普遍的混合。²⁴⁶

可見傅斯年中國上古宗教的視野，乃是吸收了希臘、中東、印度等古代文明已有研究的視野，不將宗教視為恆定不變，而以演進的過程理解。

傅斯年將中國夏商周的上古時期，視為多部族、多語言、多宗教的社會，這是在中國上古史最重要的洞見。就如王汎森所指出，傳上古史學說的核心假設，是中華文明的多元起源。²⁴⁷ 傳說：

左傳中所謂才子不才子，與書堯典皋陶謨所舉之君臣，本來是些互相鬥爭的部族和不同時代的酋長或宗神……這真像希臘的全神堂 (pantheon)，使之同列在一個綜合的信仰，把它們硬造成一個大系。只是夷夏列國列族的地望世系尚不盡失，所以我們在今日尚可……分析出部族的多元狀態來。²⁴⁸

大一統以後的中國將三代視為同種族、同信仰且直線繼受的朝代。但從了解上古希臘、中東、南亞的傅斯年看來，三代時的邦國，其實是互相爭鬥的異信仰、異起源的種族或部族。夏、商、周各是三個起源地、信仰不同的部族，只是先後取得政治上領導的地位。

中國文明多中心的起源，從傅留德時期 (1924) 就開始發展。²⁴⁹ 顧頡剛的

²⁴⁴ 傅斯年，《性命古訓辯證》，頁 297, 329, 332, 367。

²⁴⁵ 傅斯年，《性命古訓辯證》，頁 332。

²⁴⁶ 傅斯年，《性命古訓辯證》，頁 266。括弧內英文為傅斯年自加。

²⁴⁷ Wang, *Fu Ssu-Nien*, pp. 98-125.

²⁴⁸ 傅斯年，〈夷夏東西說〉，《傅斯年全集》第 3 冊，頁 147。

²⁴⁹ Wang, *Fu Ssu-Nien*, pp. 99-101.

《古史辨》已開始質疑上古中國單一民族起源，也質疑上古統一疆域這些傳統觀念。傅斯年更進一步在〈夷夏東西說〉申說，也反覆用在〈大東小東說〉、〈姜原〉、〈周東封與殷遺民〉，分析上古中國的多宗族、宗教的起源。

上古社會多部族、多語言、多宗教這個核心的觀念，在中國是創新的觀念，但西方的 *Altertumswissenschaft*，自 Wolf 以來，就不曾忽略希臘、羅馬古代社會複雜的民族及其各自的文學、神話。²⁵⁰ 除了希臘之外，傅斯年提及印度的吠陀時期，美索不達米亞、埃及、以色列等，也有重要而豐富的例子。可知傅開創性的想法，若有其源頭，其來源不在中國，而在歐洲十九世紀以來的古代研究及 philology。

傅斯年講述 philology 最有名的地方，就是為史語所創立所寫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的〈旨趣〉一文在多個層面呼應胡適在《國學季刊》的〈發刊宣言〉。譬如兩文都是學術刊物的創刊宣言，而且兩個刊物的志向都是利用西方的學術處理中國的學問；兩者都標誌新學術的開始。

傅的文章一開頭，就提到歐洲的歷史學和「語言學」。談歐洲歷史學的部分很短：「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學所達到的範域，自地質學以至目下新聞紙，而史學外的達爾文論正是歷史方法之大成。」²⁵¹ 此處可見，傅心目中的歷史和姚從吾相同，還是以蒐集考訂史料為主、以 philology 為本的歷史學。

傅接著用三、四倍的篇幅談他所認為的「語言學」。他先講梵文的發現對兩種古典語學（classical philology，兩種古典語文即希臘、拉丁）的影響。接著他提到「印度日爾曼系（Indo-Germanic）的語言學已經成了近代學問最光榮的成就之一個」。²⁵² 這裏的 Indo-Germanic philology 就是 Indo-European philology，只是德國的學術界喜歡用 Indo-Germanic，來強調日爾曼民族的地位。再來傅談印歐語言外的「語言學」發展，包括賽米系（Semitic，包含猶太文及阿拉伯文，今常譯為閃族語系）、芬匈（芬蘭、匈牙利）、印度支那系（Indo-Chinese，包含藏語、緬語及漢語等），以及黑人語言等；²⁵³ 再接著他提到實驗語言學的出現，

²⁵⁰ Völker（部族或民族）是 Wolf 談 *Altertumswissenschaft* 時的核心概念。該詞遍見他的 *Darstellung der Altertumswissenschaft nach Begriff, Umfang, Zweck und Wert* (Weinheim: VCH, 1807)。譬如他談到 Völker-Geschichte (History of peoples)，見頁 52-53。

²⁵¹ 傅斯年，〈旨趣〉，頁 246。

²⁵² 傅斯年，〈旨趣〉，頁 246。

²⁵³ 傅斯年，〈旨趣〉，頁 246。傅斯年在柏林期間，修習過 Diedrich Westermann (1875-1956)

「審音之功」有大幅進步，使得個別語言的方言研究進步，並使學者知道「語言流變的因緣」。²⁵⁴

以傅的眼光看來，「比較言語學」已經達到自然科學的地位。十九世紀的「比較言語學」只和「動物植物分類學」或「比較解剖學」相當，因其方法在分類與比較；但「比較言語學」最新的發展，已經是生物發生學 (genealogy)、環境學 (ecology)、生理學 (physiology)。²⁵⁵ 傅進而提到比較「系族語學」，如印度日爾曼族語學，或各種「專語學」，如日爾曼語、芬蘭語，甚至伊斯蘭語等。這裡傅說到「語言學」與民族國家的關係：「一個民族的語言即是這一個民族精神上的富有」。²⁵⁶

和陳寅恪一樣，傅斯年希望應用西方的「比較言語學」到漢語及同語系的語文：「又如西藏、緬甸、暹羅等語，實在和漢語出於一語族，將來以比較言語學的方法來建設中國古代言語學，取資於這些語言中的印證處至多，沒有這些工具不能成這些學問。」²⁵⁷

傅明顯心儀歷史學和 philology，但何故呢？傅、陳等人在國外留學固然多所涉獵，但其目的都在應用西方所學於本國。傅特別選擇歷史和「語言學」，因為他認為中國在此二學科發展很早，最有成績，可惜和西方現代學術相比，已經落後。史學方面，司馬遷的年代最早，就能以「傳信存疑以別史料」又能「排比列國的紀年」。宋朝的史學如歐陽修 (1007-1072) 的《集古錄》「下手研究直接的材料，是近代史學的真功夫」；而司馬光 (1009-1082)、劉恕 (1032-1078)、范祖禹 (1041-1098) 等人「利用無限的史料，考定舊紀」，其精審讓人驚異。明末清初的浙東學派有好的開端，但「因外族政權忌諱真史學」之故，史學的火種在有一清一朝，已經熄滅。²⁵⁸

在傅看來，中國語言學最早的名著是《說文解字》。其缺點在不知「說何文

的 Allgemeine Phonetik (general phonetics)。Westermann 的專長就是非洲語言。

²⁵⁴ 傅斯年，〈旨趣〉，頁 246。

²⁵⁵ 傅斯年沒有解釋為何 philology 和這三個自然科學相同。如上所述，Schleicher 認為 comparative philology 所做的語言親屬關係的判別，和達爾文生物學相當，故而可視為科學。Philology 和 genealogy 有關，應該是因為 comparative philology 探討語言的起源與演變；和 ecology 有關，因為該學問探討語言間的互相競爭與交流；和 physiology 有關，因探討語音發生的生理機制。

²⁵⁶ 傅斯年，〈旨趣〉，頁 246-247。

²⁵⁷ 傅斯年，〈旨趣〉，頁 251-252。

²⁵⁸ 傅斯年，〈旨趣〉，頁 248。

解何字」，²⁵⁹ 沒有語言演變與地方差異的觀念。傅最看重的中國「語言」學者，是顧炎武 (1613-1682) 及閻若璩 (1636-1704)。前者以「因時因地的音變觀念為語學」；後者「以實在地理訂古法記載，以一切比核辯證偽孔」。²⁶⁰ 顧炎武及閻若璩代表中國學問的最高峰。乾嘉時期依循顧、閻的遺訓而有的好成績，但隨後沒落，即使傅當代的學術冠軍章太炎 (1869-1932)，已經不如清代的孫詒讓 (1848-1908)、吳大澂 (1835-1902)、阮元 (1764-1849)。正當中國學術沒落時，西方歷經了十九世紀的發展，學術已經遙遙領先中國了。²⁶¹

這裏傅斯年對「語言學」的理解，並不侷限在音韻，也涵蓋了歷史地理與文籍編訂等等，所以〈旨趣〉裏所提的「語言學」，並非專注於語音、語法的 linguistics，而是包含語言研究和文獻考訂的 philology。

中國的史學、「語言學」為何輸給西方的學問？傅斯年解釋，西方的學問能用一切的材料，特別是私人日記、考古發掘、洋行的貿易冊等材料。這些是中國傳統學問所忽視，而是西方「科學的研究」之根本。中西差別在於材料的利用。所以傅斯年說「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的研究材料便進步，不能便退步」。²⁶²

再者，另一個讓傅斯年艷羨不已的，是西方學問對古代中亞文字的認識。如第二節所述，傅斯年對西方學者的漢學知識，並不信任。但是西方學者對中國「四裔」的研究，卻讓傅折服。傅提到例子有沙萬（即上述的沙畹，Chavannes）的《譯外國傳》、玉連（即上述的 Julien 玉蓮）的《大唐西域記》、高幾耶（上述的 Cordier）的《注馬可波羅傳》，以及米勒（即上述 Friedrich W. K. Müller）之回紇文書。²⁶³ 藉由 philology，歐洲學者建立起了涵蓋歷史上匈奴、鮮卑、突

²⁵⁹ 傅斯年，〈旨趣〉，頁 248。

²⁶⁰ 傅斯年，〈旨趣〉，頁 248。

²⁶¹ 傅斯年，〈旨趣〉，頁 248。

²⁶² 傅斯年，〈旨趣〉，頁 250。

²⁶³ 傅斯年，〈旨趣〉，頁 250。傅斯年提到的書名，分別是 I-Tsing（義淨），*Mémoire composé à l'époque de la grande dynastie T'ang sur les religieux éminents, qui allèrent chercher la loi dans les pays d'Occident par I-Tsing*, trans. Édouard Chavannes (Paris: E. Leroux, 1894); Hiouen-Thsang, *Mémoires sur les contrées occidentales*（見註 88）；Henri Cordier, *Ser Marco Polo: Notes and Addenda to Sir Henry Yule's Edition, Containing the Results of Recent Research and Discovery* (London: J. Murray, 1920). Friedrich W. K. Müller 自一九〇八年開始發表其回紇文書編譯及解讀，到其一九三〇年過世後還有出版，最早的是 *Uigurica: 1. Die Anbetung der Magier, ein christliches Bruchstück. 2. Die Reste des buddhistischen "Goldglanz-Sūtra". Ein vorläufiger Bericht* (Berlin: Königli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08).

厥、回紇、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等語言的知識，並進而討論各族群的神祇崇拜、歌謠、民俗、雕刻等。²⁶⁴ 傅在這裡所提的，就是 philology 知識在中國古西域研究的應用。如本文第二節中所分析，傅所認為的「四裔」研究，可說是中國學者所認為「東方學」的第一層意義。

更進一步，中國學問固然也討論聲韻，但「審不了音」。在傅斯年眼中，即使如乾嘉名家錢大昕 (1728-1804) 論古音韻，謂「輕唇音上古來無之」，但也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²⁶⁵ 傅在別處也屢屢提到中國傳統音韻學「不能審音」，或「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²⁶⁶ 原因在於西方已有相對發達的聲韻學 (phonology) 及語音學 (phonetics)，對各個母音、子音的音值有精確的掌握，甚至連每個音的發聲部位與方法都有所了解。²⁶⁷

傅斯年創建史語所，希望引進西方的歷史和 philology 應用在中國文史研究之上。〈旨趣〉一文中，宣示了史語所將要進行的方向：歷史範圍包括（一）文籍考訂、（二）史料徵集、（三）考古、（四）人類及民物、（五）比較藝術；語言範圍包括：（一）漢語、（二）西南語、（三）中央亞細亞語、（四）語言學。²⁶⁸ 歷史範圍會包括考古、民物（民謠、民間傳說）蒐集以及藝術，受的主要不是蘭克學派的歷史學影響，實在是 Altertumswissenschaft 及 philology 的影響。而「語言」研究包括已經失傳的中亞文獻語言，也是 philology 直接影響的明證。確實，傅斯年在〈旨趣〉的最後有三點宣示：一要摒棄傳統以道德議論為主的歷

²⁶⁴ 傅斯年，〈旨趣〉，頁 250。

²⁶⁵ 傅斯年，〈旨趣〉，頁 251。

²⁶⁶ 前者見傅斯年，〈詩經講義稿〉，《傅斯年全集》第 1 冊，頁 198；後者見傅斯年，〈傅斯年致顧頡剛 (1926.9)〉，王汎森等，《傅斯年遺札》，頁 61-62。

²⁶⁷ 在〈詩經講義稿〉中，傅斯年說：「談古音的人每不能審音，又少充分的認識方言之差別，聚周代漢初之韻以為一事，其結果分類之外，不能指實。而訓詁學亦以受音韻學發達之限制，未能建立出一個有本有源的系統來。」當時真能審音，有田野方言知識，又能分辨中國音韻演變的，只有瑞典學者高本漢 (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傅斯年心中的現代漢語研究的典範，無疑就是他。高氏在中國採集了數量可觀的方言，藉由比較分析確定其親屬關係，並參考《廣韻》重建重要韻母在中國中古時期的發音。高本漢的方法融合了歐洲的方言學研究、比較語言學及中國的聲韻學，精確程度與視野大大超越中國傳統學問，可說是以現代方法研究中國語言的第一人。不只傅斯年，胡適在《國學季刊》的〈發刊宣言〉也推崇高本漢。高氏的漢語研究，更啟迪了趙元任的語言學研究。趙開始進行其田野研究時，最重要的諮詢對象，就是高本漢。Chang, "Philology or Linguistics," pp. 323-325.

²⁶⁸ 傅斯年，〈旨趣〉，頁 253。

史（「把些傳統的或自造的『仁義禮智』和其他主觀，同歷史學和語言學混在一氣的人，絕對不是我們的同志」）；二要把歷史學和「語言學」視為自然科學（「要把歷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乃是我們的同志」）；最後則是「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²⁶⁹

傅斯年所設下的目標，可說是用史語所的機構力量，建立涵括中國語言、文獻、傳說、文物、民族調查的 *national philology*，而且包含的不只漢語語言與文獻，還包括中國西北和西南的民族。有趣的是，他用「東方學」支撐他心目中的 *national philology*。最重要的原因，顯然是他要中國學界（或史語所）學習西方的「東方學」，成績還要超過西方（所以才能成為正統）。而且他指的不只是敦煌或西域研究，而是整個中國文史社會研究，且包括中國人自己的研究。

話說回來，傅這裡的「東方學」指的只是中國（含西域）研究，實非歐洲 *oriental philology* 的全部。其實傅斯年留學德國，並不是不知道東方學在歐洲的意義。譬如他曾寫道：「近代東方學發達之後，希臘人文承受於東方及埃及之事件愈現愈多，其非無因而光大，在現在已全無可疑。」²⁷⁰ 此處指希臘文化受土耳其、美索不達米亞、埃及的影響，關係的並不只有中國研究，毫無疑問是指西方意義下的 *oriental philology*。不過在〈旨趣〉中，因為傅所談的是史語所當時的工作，指涉範圍不過蔥嶺。

第三，傅斯年的志願，是以史語所為基地，取代巴黎「東方學」的正統位置。其實在二十世紀初，歐洲 *philology* 的各個領域，德國基本上還處於領先的地位。所以該國學者在吐魯番探勘後，可以迅速解讀粟特文和吐火羅文，並編訂該地發現的梵文、回紇文及其他中亞南亞語言的文獻。但是由於德國印歐 *philology*（含梵文、伊朗系語文等）與 *comparative philology* 的悠久傳統，其學界的地位比漢學研究崇高。參與吐魯番文獻解讀的德國學者在意的是在 *Indo-European philology* 的成就與聲望，不在爭取在漢學研究的地位。而二十世紀初德國最傑出的漢學學者 Otto Franke，自豪的是用漢文的材料解釋中國通史。但如第二節所述，傅斯年（及陳寅恪）等多數中國學者對西方學者的漢語掌握能力並不信任，所以並不看重 Franke。故而史語所剛成立時聘請國外通信研究員，在德國學者中，不邀請當時柏林大學的漢學講座 Franke，而邀請人在柏林民族博物館任職的

²⁶⁹ 傅斯年，〈旨趣〉，頁 258。

²⁷⁰ 傅斯年，〈戰國子家敘論〉，《傅斯年全集》第 2 冊，頁 103。

Friedrich W. K. Müller。²⁷¹ 可見傅、陳兩人尊敬的還是西人掌握非漢文文獻的能力。傅斯年特別提到研究「四裔」的西方學者，有三位是法國巴黎的學者，唯一一位德國學者就是 Müller。沙畹及伯希和在中文能力之外，還精研西域史地。伯希和另外掌握梵文、伊朗系語文及其他多種中亞語文，其主編的《通報》成為國際漢學研究最重要的期刊。在伯氏的天份與努力經營之下，即使法國在 oriental philology 之中的其他領域的成績還比不上德國，在漢學研究卻已有最突出的成績。伯希和的成就更受王國維、陳寅恪、傅斯年等中國學者一致推崇，史語所聘請國外通信研究員，第一個就邀請伯希和。

結論：Philology 與民國時期的中國文史研究

民國時期留學歐美的中國學者，目的都在回國後學以致用，將所學應用在本有的學術研究上。如 Edward Wang 指出，當時的文史學者，不管保守或激進，其共同的基調是所謂的 *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或謂「以史尋國」。²⁷² 胡適、陳寅恪、傅斯年等人研究中國學術的動機，都有強烈的民族情感。陳寅恪為陳垣所編的《燉煌劫餘錄》作序，悵然說到中國學者之不入流：

自發見以來，二十餘年間，東起日本，西迄法英，諸國學人，各就其治學範圍，先後咸有所貢獻。吾國學者，其撰述得列於世界燉煌學著作之林者，僅三數人而已。²⁷³

「劫餘」中的劫，可說有兩層意義，第一是敦煌文物的劫掠，第二則是民族的劫難。喪失的文物無法取回，但落後的學術不可不馬上追趕。可見敦煌研究或「東方學」對傅及同時代學人所引起的悲憤、急切。

西域及敦煌的文獻發現，是歐洲 oriental philology 向東擴張的最新發展，也是陳寅恪、傅斯年等人學習歐洲 philology 的關鍵。本文回顧了 philology 歷經十九世紀的幾個重要發展，也回顧了西域文物的發現與十九世紀地緣政治及歐洲、

²⁷¹ 陳反對史語所聘請 Franke 擔任通信研究員的原因是：「據其研究中國史成績言，則疑將以此影響外界誤會吾輩學術趨向及標準。」陳寅恪，〈陳寅恪致傅斯年（1936.11.13）〉，《書信集》，頁 53。

²⁷² 這是匿名審查人的翻譯。Q. Edward Wang, *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 The May Fourth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

²⁷³ 陳寅恪，〈燉煌劫餘錄序〉，頁 231。

俄國、日本 *oriental philology* 的關係，同時檢視敦煌研究在中國的起源，「東方學」在中國的多重涵義，也說明敦煌研究與現代國學研究的意義。

陳寅恪和傅斯年的學術，如同歐洲 *philology*，不僅研究歷史，而且也研究文學。有清一朝的考證，大抵用在整理、考證儒家經典。陳寅恪和傅斯年則從西方學習到文學 *philology*。他們的學術，除了傳統的典故、人名與制度的考釋外，還關心多種不同的文體（詩、小說、劇本、彈詞七字唱體）、風格、格律，也考察語言的層次（方言、官話、文言、古文等；統治者、被統治者、及外族人的語言）、文體轉變（佛教說經、中國彈詞、章回體小說）、部族神話（夷夏東西之分）、中亞民族文化的東傳、典籍與權力（武則天合理化女君主的統治）、宗教文學的轉借（華佗與西遊記的故事）；並且利用文學的材料重建社會、宗教、民族的史事。傅斯年在廣州中山大學（1928-1929）所開授的中國古代文學史、詩經等課，已見文學 *philology* 的開端。陳寅恪的《元白詩箋證稿》及《論再生緣》，則為文學 *philology* 在中國發展的高峰。

陳寅恪和傅斯年的上古史及中古史都強調多民族的互動與征戰，陳還論及政治集團間的競爭。這些觀點，常被視為是兩人在中國史學與文學史上的創見。傅斯年引用了希臘與美索不達米亞研究的發現理解中國上古的宗教發展。陳關懷的重心在胡漢互動、征服者與原住族群的關係，以及漢人朝代與外族國勢的連動，雖然未明指其西方學術的源頭，但這些觀點在陳學習過的西洋古典 *philology* 及梵文 *philology* 都可找到範例。

陳和傅也都提到 *comparative philology*。傅在〈旨趣〉一文中，說到印歐比較言語學是近代學問最光榮的成就之一。陳對清華國文試題的說明中，堅持合適的中文文法，必須在比較同語系的藏、緬、漢等語文之後，才能產生。陳更認為應用比較歷史語言學從事中國語文的研究，其成就可更勝於乾嘉考證的光輝。

Philology 在陳寅恪與傅斯年的手上，有不一樣的表現。陳有優異的梵文、藏文、蒙古文或中亞語文知識，得以具體進行梵藏漢佛教文獻與蒙、藏碑帖的比較校刊學。他早期的研究可說是直接用 *oriental philology* 中相關語文的知識與方法，從事中國相關歷史文獻的分析。傅斯年在這些語文上的能力只是入門，而且他研究的是中國上古史，中亞和南亞的語文派不上用場。*Philology* 對他來講是觀念的啟發，以及研究方向的提示。譬如他引用古典和比較 *philology* 的視野檢視中國上古文學、神話與歷史；而他建立史語所的終極目標，在建立中國的 *national philology*。傅本人對西域或遼金元史的興趣極微，甚至認為處理唐史，容易與歐

洲學者「拖泥帶水」，故而建議陳寅恪改做宋史，因為宋史是「純粹中國學問」，比較快有成績。²⁷⁴ 陳卻始終未放棄六朝隋唐的研究，可見兩人的不同。

傅斯年和陳寅恪兩人對接受西方文化制度的態度也不完全相同。傅在學生時代主張全盤西化，要求打倒孔家店。陳卻始終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深厚的感情，王國維自溺而死，陳解讀為失去的傳統文化理想而殉身，字裡行間流露深刻的同情。傅支持白話文革命，甚至主張中文羅馬化，陳卻到老喜歡寫作舊詩。

陳、傅對史語所的貢獻方式也不同。陳主要以教學、寫作活動影響學界，而其教書寫作的基地在清華。不過陳也一直身兼史語所歷史組主任，他的論文及專著，大部分在史語所出版。他對魏晉以至隋唐的研究，即使個別的見解未必廣獲學界接受，但其觀點可說改寫了中國中古文史研究，啟發史語所後進學者（如嚴耕望）的視野。傅斯年的著作也大多在史語所出版，但他主持史語所的事功，其重要不下於其歷史著作。傅不僅以個人的力量，而以機構的力量，完成他在〈旨趣〉所宣示擴張研究材料與方法的大方向。他宣示的三個方向，許多都做到了。傅斯年委請陳寅恪擔任歷史組的主任，中亞歷史語文的研究由陳代表。歷史文獻方面，搶救清朝內閣大庫，又大規模蒐集石碑拓片，並由劉復帶領蒐集民間口傳文學、歌謠及俗文學；任命李濟擔任考古學門的主任，用現代的方法發掘、測量、記錄殷墟，發掘結果轟動國際學界；殷墟發掘出來的大批甲骨，成為董作賓做《殷曆譜》之根本，重建了商代的 *chronology*；語言部分，趙元任擔任主任，用現代的方法調查現代漢語方言及苗、傣、藏語。凌純聲、芮逸夫也開始民族調查。這些可說都是中國有組織的學術調查的開端。²⁷⁵ 無可否認，傅斯年兼重歷史與 *philology* 的學術視野，是達成這些史語所成果最直接的動力。

但陳、傅兩人的差異不妨礙彼此懷抱同樣的理念，應用西方 *philology* 的方法、視野、主題，治中國文史。傅斯年在史語所〈旨趣〉中呼籲也要把歐洲的歷史學和 *philology* 移植到中國，將史語所建立成東方學的中心。陳在一九三一年的〈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也說：「今世治學以世界為範圍，重在知彼，絕非閉戶造車之比。」²⁷⁶ 確實，在文化情感上保守的陳寅恪，學習西洋學術之深之廣，甚至不下於任何全盤西化的人士。上述陳寅恪致傅斯年信中所說，除傅之

²⁷⁴ 〈傅斯年致陳寅恪 (1929.9.9)〉，引自桑兵，〈陳寅恪的西學〉，頁 58。

²⁷⁵ 趙元任的吳語調查，早在他任職清華國學院就已開始。但其調查報告在史語所出版。

²⁷⁶ 引自桑兵，〈陳寅恪的西學〉，頁 62。

外，「其餘之人，皆弟所不屑與之言比較語言文法學者」，同樣可見陳、傅兩人在 philology 學術上的相知相惜。

王汎森在其專著中所舉傅斯年的一樁軼事，可以轉用來說明西方 philology 的訓練，如何影響中國學者的視野。史語所的殷墟發掘，一開始派遣只受過中國文史訓練的董作賓 (1895-1963) 前往安陽。董受限於中國學術的傳統，在遺址極力搜尋有文字的遺物，一開始遍尋不著，大失所望。但曾在德國求學的傅斯年提醒董作賓，「地下知識重於文字」，也就是地下發現的器物與墓穴比單純的文字更重要。²⁷⁷ 傅、董兩人對地下考古知識的差別態度，正對應西方的 *Altertumswissenschaft* (以 philology 為基本) 與中國傳統考證兩者的差別。由於傅斯年的堅持與支援，殷墟的發掘，以直接的物質證據證明商朝並非傳說而為信史。²⁷⁸

如上所述，傅斯年提及，即使中國近代學術的高峰，也就是乾嘉考據，和西方 philology 的方法、視野和成就相比，都相形失色；陳寅恪也說，若運用西方 comparative philology 的方法研究漢語，其成果要比乾嘉的成就更上一層。這是深知中國學術的底蘊，又深入學習西方學術的傅斯年、陳寅恪等人，所發出的由衷讚嘆。其實從一八八〇年代開始，因為對工業化及物質主義的興起，引起德國文化界主流的反彈。Philology 因講究證據，常自視是人文學科中的科學，但在文化界的主流看來，卻是 positivism (實證主義) 和膚淺的 empiricism (經驗論) 的代表。文化界的主流批評等而下之的 philology，因為專業化 (professionalized)、專門化 (specialized) 之後，執著在零碎、枯燥的細節上，而忽略智識與精神生活的內容。²⁷⁹ 到了二十世紀初，學生甚至還編寫諷刺劇嘲笑 philology。²⁸⁰ 但對傅斯年與陳寅恪等最優秀的中國學生而言，即使有這些批評，西方 philology 的成就，畢竟還要比中國傳統的學術高出太多。

傅斯年等人大力提倡 philology，在中國幾乎完全沒有反對的聲音。這和傅及

²⁷⁷ 傅斯年，〈傅斯年致董作賓 (1928.11.3)〉，王汎森等，《傅斯年遺札》，頁 157-158。王汎森已指出這點。Wang, *Fu Su-Nien*, pp. 83-84.

²⁷⁸ 史語所考古學的成就，可參見石璋如，〈李濟先生與中國考古學〉，杜正勝、王汎森，《新學術之路》上冊，頁 135-161。

²⁷⁹ Fritz K. Ringer, *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 The German Academic Community, 1890-193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300-301. 周樑楷也注意到這個德國文化界的轉折。周樑楷，〈傅斯年和陳寅恪的歷史觀點〉。

²⁸⁰ Grafton, "Prolegomena to Friedrich August Wolf," pp. 101-102.

胡適等共同提倡的白話文學及漢字羅馬化所遇到排山倒海的反對，完全不同。原因之一，是 philology 和中國的考證學同樣強調文獻考訂、章句解讀，其取向十分接近。民初中國學術界的主流，延續有清一朝，還是以考據為重，知名的文史學者，如章太炎、羅振玉、王國維，其工作基本上還是考證。對中國學者而言，西方 philology 的方法熟悉而親切。第二，甲午戰敗以來，開啓了中國對外學習新知的熱潮。日本打敗中國，中國非但沒有怨恨日本，還從日本學到西化的重要。清廷中剩餘的保守力量支持義和團，引來八國聯軍，終使排外的政治力量全面潰敗。自此中國政治界與知識界主流，一反過去對西化的疑懼，對西方的知識與制度，轉而為積極開放。王國維接觸西學、並從事不少譯介的工作，就是從此時開始，之後更跟隨羅振玉，東渡日本。更年輕的一輩，胡適、趙元任等以庚款獎學金留美，陳、傅、姚、羅、毛等中國政府公費留學生，更是此積極西化時期的產物。如傅斯年所強調，西方的 philology 善用新的方法產生新材料，雖然和中國不同，不但不必排斥，反而可以改進中國已有的學問，值得歡迎。

另一方面，即使傅斯年、陳寅恪如此重視 philology，史語所也做出重要的成績，但嚴格說來，傅、陳等人在歐洲所學的 philology，並沒有在史語所或中國生根繁衍。史語所歷史研究的風格，依循傅斯年的規劃，以證據為重，不談理論，似乎正是 philology 的學風，何以說 philology 在史語所沒有生根呢？

原因是中國的考證學和西方的 philology 固然在材料、方法上有很大的雷同，但細究之下，仍有重要的差異。第一，西方的 classical philology，前提就是多語言的學習（希臘、拉丁文加上德、法、英等幾個主要的學術語文）。Oriental 及 comparative philology 運用到的語言更多，希臘、拉丁文之外，梵文更是所有語言之外的出發點，另外再加上印歐或其他語系的諸多語言。固然傅斯年、陳寅恪、姚從吾等人的志向不在學習 classical philology，但是他們親受德國 philology 的陶養，都深知多語言的能力和比較的視野之重要。陳寅恪因此在哈佛期間，修習希臘文、梵文。到了德國（甚至回到北京）之後，持續修習梵文。解讀粟特、吐火羅、回紇文等，是德國學者自豪的研究成果，陳也投入心力研讀。傅斯年除了英、德文之外，也學習梵文、藏文等。姚從吾學習蒙古文、滿文、藏文等。多語言的知識是西方 philology 的根本，陳、傅、姚等人都了解並親自實踐。

此外，西方現代 philology 的理想，自 Wolf 以來，都不在片段零碎的考據名物、詮釋章句。他們強調 philology 的目的是研究歷史生活的全部，也在著作中身體力行。詞章、制度、人名、地名的個別考證是 philology 的基礎無疑，但只是建

立宏觀、整體圖像的第一步，而不是目的本身。²⁸¹ 傅斯年在最重要的幾篇論文裡，探討中國上古多民族、多宗教的起源，都能呼應這個大的視野。陳寅恪回國早期以運用蒙古、藏文、滿文知識所寫的文章，余英時指出偏向點的貢獻，而不是線和面的貢獻。²⁸² 但如上所述，陳對華佗、西遊記中神話故事的研究，連接到他在國外所學的 philology 裏比較神話學研究，也連結到他晚年的文學考釋。他的佛教研究，如支愍度學說考釋，貫穿了他對南北朝宗教、語言、種族的研究；武曌研究，則展示了他對六朝隋唐政治集團分析的視角。宏觀地討論非漢民族及其文化在中國域內域外的影響，則無疑是余英時所謂線、面的研究，其背後歐洲 philology 的背景也不宜忽略。

相對而言，傳統的中國考據，使用的只是單一語言——中文。而且不管在清代或後來，雖然不乏深入的詞章、文字、典籍、名物考證，但少有系統融會、格局宏大、觀照全面的歷史著作。繼傅斯年與陳寅恪之後進入史語所的研究人員、甚至整個中國的學界，少有人繼承老師輩多語言的能力與宏觀的視野。在清華或北大親炙傅、陳、姚、毛的學生，不乏優秀的人才，但思想條件、物質條件、時代氛圍及政治情勢的變化造成了人才的斷層。在思想條件上，中國知識界了解西方 philology 的底蘊及價值的人很少。這點可以從古典、梵文、甚至是德文 philology 的重要著作從未有過中譯可見。如上所述，即使支持以西方方法研究國學最力的胡適，因為本身留學美國，而且所學是哲學的關係，對西方的 comparative philology 理解都還有隔閡。正因為真正了解 philology 的人少，所以陳寅恪曾在信中道，舉國之中，只有傅、陳兩人有資格談論比較語言文法。在物質條件方面，希臘、拉丁文、梵文這些傳統 philology 最重要的語言，中國學生即使有心，在國內也不易得到機會學習；²⁸³ 西域研究所需的蒙古、滿文、藏文、西夏、女真、粟特、回紇、吐火羅等歷史語言，國內少有人全面傳授。如桑兵指出，陳寅恪在清華與北大的學生回憶，都覺得陳寅恪開授的課程牽涉的語文（如梵文、巴利文、藏文、滿文）太多、太艱深，學生力有未逮，而「佛經翻譯文學」等課甚至因為學生梵文、巴利文能力不足，領略有限，而不再重開。²⁸⁴ 有志

²⁸¹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 26.

²⁸² 余英時，〈試述陳寅恪的史學三變〉，頁 324。

²⁸³ 鋼和泰於一九一六至一九二八年在北教授梵文，是少數梵文學習的機會。陳寅恪似乎沒有開授梵文的紀錄。

²⁸⁴ 桑兵，〈陳寅恪的西學〉，頁 59。

於 philology 的學生，畢竟要赴外國學習。而無此機緣的學生，只能繼承傳統的考證，所使用的語言也僅止於中文。

傅斯年、陳寅恪等人也意識到中國物質條件的不足，所以史語所創立不久，就選派史語所的年輕學者王靜如 (1903-1990) 及于道泉 (1901-1992) 為海外研究員，赴歐進修。王自一九二九年從清華國學研究所畢業，隨即進入史語所，出國前就出版了幾篇重要的西夏文書研究。他於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六年到英國、德國、特別是法國學習中亞歷史語文及印歐語文學。但王回國後並沒有回到史語所，而到北平研究院及中法大學工作。²⁸⁵ 于道泉畢業於齊魯大學，曾擔任鋼和泰的隨堂翻譯，並習得梵文與藏文，且從故宮的喇嘛學習藏文與蒙古文，於史語所成立之初入所擔任助理研究員，一九三四年赴法、德進修，後來還在英國教授漢語，在二次戰後才回國。²⁸⁶ 傅斯年曾在一九四一年委託向達 (1900-1966) 考察敦煌。向在中國圖書館界工作多年後，於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八年獲派到歐洲學習西夏文及其他中亞語文。但向達的主要機構並不在史語所。²⁸⁷ 傅斯年也在一九四六年邀請韓儒林 (1903-1983) 擔任史語所的兼任研究員。韓一九三〇年畢業於北大，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六年先後在比利時、巴黎、柏林學習中亞語文。回國後在突厥文及元史有可觀的研究成績。²⁸⁸ 中國學界最後的嘗試在二次戰後。一九四八年傅斯年和胡適（時任北大校長）、陳寅恪、湯用彤等人在北大成立東方語言學系，集合于道泉、一九四六年回國的季羨林 (1911-2009) 及其他數位中亞、南亞語言、甚至阿拉伯文的學者，俾便制度性地培養人才。²⁸⁹ 故而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在陳寅恪、姚從吾之外，也有幾位留學德、法學習古西域語文的人才如馮承鈞、王靜如、向達、于道泉、韓儒林、季羨林等人；此外也有在日本習得中

²⁸⁵ 馮蒸，〈大匠示人以規矩——從王靜如先生教我音韻學看王先生的治學方法〉，杜正勝、王汎森，《新學術之路》下冊，頁 565-566。

²⁸⁶ 耿予方，〈藏學泰斗于道泉教授〉，《民族教育研究》1994.2：103-104；王邦維，〈于道泉先生小記〉，杜正勝、王汎森，《新學術之路》下冊，頁 562。于道泉的重要性賴匿名審查人提醒，謹致謝意。王、于兩人出國進修之後沒有回到史語所，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因為兩人的政治立場左傾，和親近國民政府的史語所不相容。兩人的左傾活動或立場，可見岳曉峰，〈沉痛悼念王靜如教授〉，《民族研究》1991.1：2；耿予方，〈藏學泰斗于道泉教授〉，頁 104。

²⁸⁷ 伏俊璉、冷江山，〈向達先生的敦煌文學研究——紀念向達先生誕辰 110 周年〉，《敦煌學輯刊》2011.2：175-176。

²⁸⁸ 邱樹森，〈從村童到學術大師：韓儒林評傳〉，《史學月刊》2002.2：11。

²⁸⁹ 王邦維，〈于道泉先生小記〉，頁 563。

亞語文的羅福成。²⁹⁰ 但只有韓儒林接受史語所的合聘，其餘回國後都未在史語所任職。

即使在陳寅恪之後有這些留學歐洲研究 *oriental philology* 的學者，他們多半被視為少數語文之專家，其專長為邊疆之學或異族統治王朝的專家，雖然令人敬重，但對中國文史研究的主流影響有限。羅振玉、王國維出版與研究敦煌文物，原因是西域出土的文獻大有可能改寫中國核心的歷史、文學。他們在接觸敦煌文物之前，已是中國文史研究的大家，他們在中國文史研究的地位，回過頭來為敦煌學的重要性背書。陳寅恪從中、南、東亞語文的比較校刊學出發，兼有蒙古、吐蕃的研究，但是他同時關注唐詩及通俗文學、佛教神話在中土的傳播、六朝隋唐的胡漢關係，甚至佛經翻譯對漢語音韻的影響，這些都是關係到中國政治、社會、文學、語言的重大課題。陳之所以認為不參與敦煌學即不入流，傅斯年之對 *philology* 與「東方學」寄予厚望，都是因為 *philology* 重視的材料和方法，可為中國史帶來全新視野與課題，進而改造中國文史研究的核心。一旦這些學問被視為邊疆之學時，就被排除在中國文史研究主流之外。中共在一九五二年將北大的東方語言學系，歸入中央民族學院時，等於「東方語文」研究，成為少數民族之學，也正式宣告敦煌學與「東方學」的邊緣化。從此以 *oriental philology* 改進中國史研究的嘗試正式告終。

此外，「東方學」從二〇年代眾人驚艷的學科，變成後來專門、冷門的學問，除了學習語文的困難之外，還有世代的氛圍可以考慮。前述甲午戰爭之後，是中國積極開放的時期。外國人發現敦煌及黑水城等文物，運往國外，對向來重視文獻，並新近注意到甲骨文、金文等非傳統文獻的中國學界而言，其危急緊迫，不言可喻。但日本於一九三一年製造九一八事變，翌年扶植成立滿洲國之後，研究古西域的急迫感被失去滿洲的危機所取代。京都學者矢野仁一（1872-1970）於一九三一年發表〈滿蒙藏非支那本土論〉，傅斯年雖然專長在上古史，卻急忙撰寫《中華民族革命史》，甚至和姚從吾研究滿洲文書，要證明滿洲自古是中國的一部分。²⁹¹ 抗戰期間，費孝通、顧頡剛等人研究西南少數民族，傅斯年甚至指責費、顧的研究強化這些民族作為非漢民族的事實基礎，削弱中國統一的

²⁹⁰ 陳垣（1880-1971）也研究中外宗教交通的歷史，但他並未到外國接受教育，所使用的語言也以中文為主，和這裡討論過的人不同。

²⁹¹ Wang, *Fu Su-Nien*, pp. 149-151; Wang, *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 pp. 173-175；歐陽哲生，《傅斯年一生志業研究》（臺北：秀威資訊，2014），頁 113-114。

合理性，給予日本侵略中國的空間。²⁹² 傅斯年雖未強調漢族的唯我獨尊，但是在日本侵華後，傅斯年強調「中華民族」同語文、同文化，卻不容含糊。²⁹³ 敦煌出土的諸多非漢文的文物，說明古西域曾是許多非漢民族立國所在，有豐富而多元的語言、宗教、藝術，以之證明中國自古以來是同文同種、綿延不斷的統一國家，並非易事。特別是依賴 *oriental philology* 的語文知識研究的遼金元歷史，必須面對異族統治中原的事實，強調其價值，也不適合當時的民心氣氛。²⁹⁴ 滿洲出走，日本西侵，西域之學的急迫性與重要性不僅降低，甚至不合時宜。

在這同時，*philology* 在西方的地位也由盛轉衰。*Philology* 在十九世紀是輝煌的學問，德國更是 *philology* 的中心，但一次大戰中德國戰敗，國家幾近破產，德國大學令人羨慕的資源不再，學術開始衰落，*philology* 也不例外。納粹的崛起和二次大戰的摧殘，更讓德國勉強維持的學術實力不保。其實陳、傅、姚、毛等學人在德國期間，正是德國學術由盛轉衰的開端，但他們當時未必明瞭，季羨林親身歷經二次大戰時德國的殘破，則有深刻的體會。²⁹⁵ 再則，*philology* 原本的研究內容，如語言研究及文學分析，在二十世紀紛紛成為獨立的學科（語言學與文學研究）；再加上注重實際田野研究、不重視單純文獻解讀的英美人類學崛起，搶奪 *philology* 在非歐洲文明研究（含神話學）原本獨佔的地位。*Philology* 失去語言、文學與文化幾個重要的傳統領域，到了二十世紀下半葉，原有的勢力範圍已經分崩離析。

同時，伯希和所代表的 *oriental philology* 和漢學的結合，也隨著伯希和身故而終止。伯希和晚年就對王靜如坦言，擔憂自己的學術後繼無人。²⁹⁶ 隨著伯氏於一九四五年過世，後來的發展也確實如此。雖然敦煌研究持續吸引國際人才投入，但是再也無人能夠掌握多種中亞語言及漢語，綜合研究整個中亞或西域的宗教、民族、繪畫。而且這不只是伯希和本人的學術後繼無人而已；十九世紀以來，以梵文學習作為出發點的 *oriental philology* 和 *comparative philology*，同樣無

²⁹² Wang, *Fu Ssu-Nien*, pp. 173-174.

²⁹³ 傅斯年，〈中華民族是整個的〉，《傅斯年全集》第4冊，頁25。

²⁹⁴ 同理，國民黨政府失去中國，來到臺灣研究遼金元史的姚從吾，還必須特別強調中國史綿延的論點，似乎在淡化異族統治中國的意義。見姚從吾，〈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大陸雜誌》15.6 (1957)。

²⁹⁵ 季羨林，《留德十年》（北京：東方出版社，1992），特別是第十五章。

²⁹⁶ 王靜如，〈二十世紀之法國漢學及其對於中國學術之影響〉，《國立華北編譯館館刊》2.8 (1943)：18。

以為繼。二次戰後，梵文研究和波斯文、西藏文、阿拉伯文等個別語文的研究殊途，其他語文研究者不必再從梵文學起，往昔研究中亞的學者動輒掌握印歐語系內外十數個語言的情況已經不再。

Philology 衰微的同時，現代的語言學卻在史語所茁壯。就德國學術主流而言，philology 不但不排斥語言研究 (Sprachwissenschaft)，反而包含語言研究。傅斯年就接受了這樣的觀點，所以他建立史語所時，研究的範圍就明確包括語言研究，並且邀請趙元任擔任語言組的主任。但趙接受的訓練與學科認同，跟在德學習接受 philology 的傅斯年截然不同。趙在美國取得哲學博士，主修數理哲學。拿到博士學位後數年才決定以語言研究為生涯，自行尋訪知名的美、英、法的語言學者學習語言分析與方言研究。²⁹⁷ 他從來不曾修習過 philology，也不像西方傳統的 comparative philology 的學者一樣，有梵文作為比較歷史語言文法的基礎，他的學術生涯中不曾處理過文獻考訂、章句詮釋等 philology 課題。趙元任帶領的語言組依循英、美、法語言學 (linguistics) 的認同。對他們來講，linguistics 研究的是活的語言，philology 研究的是死的文獻。語言學的研究對象是語言，關懷的是語言現象與法則，philology 的對象是文獻，關懷的是古文明與歷史，所以 linguistics 和 philology 的方法和終極關懷都不同，應該分成兩個不同的學科。²⁹⁸ 趙元任帶領的語言組記錄方言、分析語音，從事的是 linguistics，即使處理到中國傳統的聲韻，但文句考釋、文獻則向來不是該組的核心課題。

到了二次大戰後，linguistics 更是欣欣向榮，而其中心在美國。今天一般美國的大學生，很清楚知道研究語言的學科是 linguistics，但少有學生知道何謂 philology。²⁹⁹ 美國 philology 最後的堡壘可說是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但也在二〇一四年改名為 Society for Classical Studies。臺灣學術界主要跟隨美國發展，中國改革開放後，學界也受美國學風影響最大。中文世界的知識人聽到語言研究，自然而然想到 linguistics。大多數人對史語所英文名稱中的

²⁹⁷ Chang, "Philology or Linguistics," pp. 319-322.

²⁹⁸ Chang, "Philology or Linguistics," pp. 323-324.

²⁹⁹ Philology 在德國及其他國家，命運則略有不同。Philology 在十九世紀近乎全面壟斷人文學界（哲學除外）的地位雖然已經不再，但在德國及德國影響力仍存在的國家，所謂區域研究或文明研究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philology 還有不可小覷的份量。有些大學還有 Philologische Fakultät (philology 學院)，如 Heidelberg, Freiburg, Leipzig (德國)，Vienna (奧地利)，及西班牙馬德里的 Complutense 大學等。從西歐到東歐，許多研究所，名字裡還有 philology，如 Klassische Philologie, Deutsche Philologie, Niederländische Philologie, Romanische Philologie, Polnische Philologie, Tibetanische Philologie.

philology 了解有限。由於 philology 一直未有合適的中文翻譯，傅斯年著作中談「語學」、「語言學」、「言語學」，不知詳情的讀者，直覺就當作是 linguistics，以致於絕大多數的一般大眾，將史語所理解為是歷史與語言學 (linguistics) 的研究所。而且史語所語言組同仁歷來的研究確實就是美國的 linguistics，而非大戰前的 philology。陳寅恪或後來的研究者，曾以「歷史語言學」、「比較歷史語言學」翻譯 philology，不能算錯。但今天的讀者往往以為陳所談的是 linguistics 中著重歷史面向的研究，也就是 historical linguistics。如果這樣解讀，倒讓人誤以為 philology 是 linguistics 的一部分，又是另一種錯誤解讀。

傅斯年曾自勉說：「須把歐洲的歷史作我們的歷史，歐洲的遺傳作我們的遺傳，歐洲的心術作我們的心術。這個叫做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就是說歐洲人有文明，我們負來作為我的。」³⁰⁰ 學習並應用西方學術，在傅斯年與陳寅恪的學術生命中，都有重要地位，所以本文才從世界學術史的角度，了解 philology 及敦煌學對陳寅恪與傅斯年所學的意義。當然，本文的立論不在否定中國學術傳統對陳、傅兩人的影響，不在否定兩人學術上的創見，也不在否定西方歷史學對陳、傅等人的重要性。中國學術傳統在陳、傅兩人學術上的體現，探討的人已多。譬如季羨林說，陳寅恪的治學方法，「一言以蔽之，曰考據之學」，然後分析中國考據學對陳學的意義。³⁰¹ 但即使季羨林都指出，陳的學術超越了中國的考據學，而關鍵之一，是陳掌握並活用了德國考據學（實即 philology）。其次，中國的語文材料與歷史脈絡，並非單純套用西方 philology 便可以做出滿意的解釋；陳、傅兩人在中國中古史與上古史的成就，在於他們能在中國的材料中，提出洞見。再者，傅斯年、陳寅恪當然有很大的成分是歷史研究。就如本文第一、二節所述，十九世紀以來，德國的歷史學及 philology 本來就緊密結合，難分彼此。不過學界就蘭克史學對陳寅恪的影響討論已多，本文的重點就只專注在 philology。如本文指出，philology 對陳、傅的意義，光從兩人公開談論的部分，就大有可觀，更遑論潛移默化、尚未明言的部分。今天中文世界的研究者和一般讀者，對 philology 在世界學術史中的意義所知不多，對 philology 與中國學術界及史語所的淵源也不熟悉，因此本論文的必要性才特別彰顯。

（本文於民國一〇三年七月二十一日收稿；一〇四年六月十八日通過刊登）

³⁰⁰ 「傅斯年手稿」（散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傅斯年檔案，編號 I-433。

³⁰¹ 季羨林，〈序〉，頁 5-7。

後記

此文依兩位匿名審查人寶貴意見大幅修改，得以改進，謹此致謝。修改工作主要在德國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進行，作者感謝該所提供卓越的研究環境，並感謝 Alexander von Humboldt Foundation 提供訪問德國的獎助。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新出東方雜誌簡要章程〉，《東方雜誌》1.1 (1904)：i-ii。
- 王國維，〈中國史略序〉，桑原隲藏著，樊炳清譯，《東洋史要》，上海：東文
學社，1899，頁 1r-2r。
- 別士，〈社說：論中日分合之關繫〉，《東方雜誌》1.1 (1904)：1-3。
- 桑原隲藏著，樊炳清譯，《東洋史要》。
- 羅振玉，〈敦煌石室書目及發現之原始〉，《東方雜誌》6.10 (1909)：42-46。
- Chavannes, Édouard 著，馮承鈞譯，《中國之旅行家》，上海：商務印書館，
1926。
- Chavannes, Édouard 著，馮承鈞譯，《摩尼教流行中國考》，上海：商務印書
館，1931。
- Lévi, Sylvain 著，馮承鈞譯，《大孔雀經藥叉名錄輿地考》，上海：商務印書
館，1931。
- Lévi, Sylvain, and Édouard Chavannes 著，馮承鈞譯，《法住記及所記阿羅漢
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27。
- Mullie, Jos 著，馮承鈞譯，《東蒙古遼代舊城探考記》，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1。
- Pelliot, Paul 著，王國維譯，〈近日東方古言語學及史學上之發明與其結論〉，
《國學季刊》1.1 (1923)：146-159。
- Pelliot, Paul 著，榊亮三郎譯，〈「イラン」語族の民衆が中央亜細亞並に極東の
地に及ぼせる影響〉，《藝文》8 (1912)：1-38。
- Schlegel, Gustaaf 著，馮承鈞譯，《中國史乘中未詳諸國考證》，上海：商務印書
館，1928。
- Bopp, Franz. *Analytical Comparison of the Sanskrit, Greek, Latin and Teutonic
Languages, Shewing the Original Identity of Their Grammatical Structur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74.
- . *Über das Conjugationssystem der Sanskritsprache in Vergleichung mit Jenem
der griechischen, lateinischen, persischen und germanischen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In der andreaischen Buchhandlung, 1816.
- . *Vergleichende Grammatik des Sanskrit, Zend, Griechischen, Lateinischen,
Litthauischen, Gothischen und Deutschen*. Berlin: F. Dümmler, 1833.
- Bourne, Edward Gaylord. "Ranke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Seminary Method in
Teaching History." In *Essays in Historical Criticism*. New York: C.
Scribner's Sons, 1901, pp. 265-274.

- Brugmann, Karl, and Berthold Delbrück. *Grundriss der vergleichenden Grammatik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 Strassburg: Trübner, 1886.
- Chavannes, Édouard. "Nécrologie: Le Professeur Wilhelm Grube." *T'oung Pao* 9.4 (1890): 593-595.
- Grimm, Jacob. *Deutsche Grammatik*. Göttingen: Dieterichsche Buchhandlung, 1840.
- . *Deutsche Mythologie*. 4 vols. Göttingen: Dieterich, 1835.
- .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 2 vols. Leipzig: Weidemann, 1848.
- Grimm, Jacob, and Wilhelm Grimm. *Deutsche Sagen*. 2 vols. Berlin: In der Nicolaischen Buchhandlung, 1816.
- . *Deutsches Wörterbuch*. Leipzig: Hirzel, 1854.
- . *Kinder- und Haus-Märchen*. Berlin: Realschulbuchhandlung, 1812.
- Hiouen-Thsang (玄奘). *Mémoires sur les contrées occidentales*. Translated by Stanislas Julien. Paris: L'Imprimerie impériale, 1857.
- Huili (慧立). *Histoire de la vie de Hiouen-Thsang et de ses voyages dans l'Inde, depuis l'an 629 jusqu'en 645*. Translated by Stanislas Julien. Paris: Imprimerie impériale, 1853.
- I-Tsing (義淨). *Mémoire composé à l'époque de la grande dynastie T'ang sur les religieux éminents, qui allèrent chercher la loi dans les pays d'Occident par I-Tsing*. Translated by Édouard Chavannes. Paris: E. Leroux, 1894.
- Kaluza, Max. *A Short History of English Versification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A Handbook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London: G. Allen, 1911.
- . *Chaucer und der Rosenroman eine litterargeschichtliche Studie*. Berlin: E. Felber, 1893.
- . *Der altenglische Vers. Eine metrische Untersuchung*. Berlin: E. Felber, 1894.
- . *Historische Grammatik der englischen Sprache*. 2 vols. Berlin: E. Felber, 1900.
- . *Über das Verhältnis des mitttelenglischen allitterirenden Gedichtes "William of Palerne" zu seiner französischen Vorlage*. Heilbronn: Henninger, 1881.
- Müller, F. Max. *Beiträge zu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Mythologie: Aus dem englischen übersetzt von Heinrich Lüders*. Leipzig: W. Engelmann, 1898.
- . "Comparative Mythology." In *Oxford Essays*. London: John W. Parker and Son, 1856, vol. 22, pp. 1-87.
- . *Contributions to the Science of Mythology*.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97.

張谷銘

- Müller, Friedrich W. K. *Uigurica: 1. Die Anbetung der Magier, ein christliches Bruchstück. 2. Die Reste des buddhistischen "Goldglanz-Sūtra". Ein vorläufiger Bericht.* Berlin: Königli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08.
- Niebuhr, Carl. *Die Chronologie der Geschichte Israels, Aegyptens, Babyloniens und Assyriens von 2000-700 v. Chr.* Leipzig: Eduard Pfeiffer, 1896.
- Pott, August Friedrich. *Etymologische Forschungen auf dem Gebiete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 mit besonderem Bezug auf die Lautumwandlung im Sanskrit, Griechischen, Lateinischen, Littauischen und Gothischen.* Lemgo: Meyersche Hof-buchhandlung, 1833.
- Schlegel, G. "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T'oung Pao* 5.1 (1894): 75-78.
- Schleicher, August. *Compendium der vergleichenden Grammatik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 Weimar: Böhlau, 1861.
- . *Darwinism Tested by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London: J.C. Hotten, 1869.
- Sweet, Henry, ed. *The Oldest English Texts, Edited with Introductions and a Glossary by Henry Sweet.* London: Trübner, 1885.
- Wolf, Friedrich August. *Darstellung der Altertumswissenschaft nach Begriff, Umfang, Zweck und Wert.* Weinheim: VCH, 1807.

二・近人論著

毛子水

- 1992 〈記陳寅恪先生〉，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毛子水全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第3冊，頁48。

王汎森、杜正勝編

- 1995 《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臺北：傅斯年先生百齡紀念籌備會。

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

- 2011 《傅斯年遺札》，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王邦維

- 1998 〈于道泉先生小記〉，杜正勝、王汎森編，《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下冊，頁559-564。

王若

- 2008 〈新發現羅振玉《東方學會簡》手稿跋〉，《中華讀書報》2008.08.20。

王震邦

- 2011 《獨立與自由：陳寅恪論學》，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王靜如

- 1943 〈二十世紀之法國漢學及其對於中國學術之影響〉，《國立華北編譯館館刊》2.8：1-19。

史仲文、胡曉林、武金銘、劉士文、王文治主編

- 1998 《中華文化人物辭海·文化人物》，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石璋如

- 1998 〈李濟先生與中國考古學〉，杜正勝、王汎森，《新學術之路》上冊，頁135-161。

江上波夫編，田中正美著，童嶺譯

- 2010 〈東洋學的系譜·那珂通世篇〉，《古典文學知識》2010.6：108-116。

伏俊璉、冷江山

- 2011 〈向達先生的敦煌文學研究——紀念向達先生誕辰 110 周年〉，《敦煌學輯刊》2011.2：175-180。

向達

- 1930 〈斯坦因黑水獲古紀略〉，《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4.3：7-71。

杜正勝

- 1998 〈無中生有的志業——傅斯年與史語所的創立〉，杜正勝、王汎森，《新學術之路》上冊，頁1-41。

杜維運

- 1971 〈後記〉，姚從吾，《歷史方法論》，收入札奇斯欽、陳捷先編，《姚從吾先生全集》，臺北：正中書局，第1集。

李泉

- 2000 《傅斯年學術思想評傳》，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余英時

- 2011 〈試述陳寅恪的史學三變〉，氏著，《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二版）》，臺北：東大圖書公司，頁315-338。

汪榮祖

- 1984 《史家陳寅恪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沈衛榮

- 2010 〈我們能從語文學些什麼？〉，氏著，《尋找香格里拉》，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頁14-28。

吳學昭

- 1992 《吳宓與陳寅恪》，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張谷銘

林偉

- 2012 〈陳寅恪的哈佛經歷與研習印度語文學的緣起〉，《世界哲學》2012.1：137-152。

季羨林

- 1992 《留德十年》，北京：東方出版社。
1994 〈序〉，王永興編，《紀念陳寅恪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論文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頁 7-10。
1997 〈從學習筆記本看陳寅恪先生的治學範圍和途徑〉，錢文忠編，《陳寅恪印象》，上海：學林出版社，頁 24-38。

周樑楷

- 1996 〈傅斯年和陳寅恪的歷史觀點——從西方學術背景所作的討論(1880-1930)〉，《臺大歷史學報》20：101-127。

岳曉峰

- 1991 〈沉痛悼念王靜如教授〉，《民族研究》1991.1：1-2。

邱樹森

- 2002 〈從村童到學術大師：韓儒林評傳〉，《史學月刊》2002.2：10-15。

房鑫亮

- 2013 〈王國維對中國近現代出版業的貢獻〉，《探索與爭鳴》2013.5：80-84。

姚從吾

- 1924 〈史學系派遣留德學生姚士鰲致朱邊先先生書〉，《北京大學日刊》1465：2-3。
1928 〈中國造紙術輸入歐洲考〉，《輔仁學志》1.1：8-92。
1930 〈德國史學界所稱道的幾種歷史觀〉，《留德學志》1：9-20。
1935 〈談阿保機時代的漢城〉，《國學季刊》5.1：53-78。
1936 〈德國佛郎克教授對於中國歷史研究的貢獻〉，《新中華》4.1：116-125。
1937 〈成吉思汗時代的沙漫教〉，《治史雜誌》1.1：18-27。
1957 〈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大陸雜誌》15.6：212-224。
1971 《歷史方法論》，收入札奇斯欽、陳捷先，《姚從吾先生全集》第1集。

胡適

- 1921a 〈國語文法的研究法 1〉，《新青年》9.3：1-11。

- 1921b 〈國語文法的研究法 2〉，《新青年》9.4：1-16。
- 1923 〈發刊宣言〉，《國學季刊》1.1：1-16。
- 修（筆名）
- 1940 〈《美國東方學會會報》第六卷第一期〉，《圖書季刊》2.3：533-535。
- 耿予方
- 1994 〈藏學泰斗于道泉教授〉，《民族教育研究》1994.2：103-106。
- 桑兵
- 1999 《國學與漢學——近代中外學界交往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2003 〈近代中外比較研究史管窺——陳寅恪〈與劉淑雅論國文試題書〉解析〉，《中國社會科學》2003.1：190-203。
- 2005 〈民國學界的老輩〉，《歷史研究》2005.6：3-24。
- 2011 〈陳寅恪的西學〉，《文史哲》2011.6：52-67。
- 袁英光、劉寅生編
- 1996 《王國維年譜長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袁荻湧
- 1990 〈陳寅恪與比較文學〉，《文史雜誌》1990.1：14-16。
- 陳弱水
- 1998 〈一九四九年前的陳寅恪：學術淵源與治學大要〉，杜正勝、王汎森，《新學術之路》上冊，頁 103-118。
- 2000 〈現代中國史學史上的陳寅恪——歷史解釋及相關問題〉，《學術史與方法學的省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頁 27-65。
- 陳寅恪
- 1927 〈童受喻鬢論梵文殘本跋〉，《國立第一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1.3：11-13。
- 1930a 〈大乘義章書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2：121-123。
- 1930b 〈燉煌劫餘錄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2：231-232。
- 1930c 〈三國志曹沖華佗傳與佛教故事〉，《清華學報》6.1：17-20。
- 1930d 〈吐番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1：1-5。
- 1930e 〈敦煌本維摩詰經文殊師利問疾品演義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1：6-10。

張谷銘

- 1930f 〈靈州寧夏榆林三城譯名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1：125-129。
- 1930g 〈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2：157-160。
- 1931a 〈幾何原本滿文譯本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3：281-282。
- 1931b 〈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蒙古源流研究之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3：302-309。
- 1931c 〈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蒙古源流研究之四）〉，《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3：310-311。
- 1932a 〈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夏梵藏漢合璧校釋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4：404-405。
- 1932b 〈李唐氏族之推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1：39-48。
- 1932c 〈李唐氏族之推測後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4：511-516。
- 1933 〈支愍度學說考〉，《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上冊，頁1-18。
- 1934 〈四聲三問〉，《清華學報》9.2：275-288。
- 1935a 〈武曌與佛教〉，《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2：137-147。
- 1935b 〈三論李唐氏族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2：175-178。
- 1936 〈東晉南朝之吳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1：1-4。
- 1939 〈敦煌本心王投陀經及法句經跋尾〉，《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1：19。
- 1943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重慶：商務印書館。
- 1949 〈從史實論切韻〉，《嶺南學報》9.2：1-18。
- 1956 《元白詩箋證稿》，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1979 《陳寅恪先生全集》，臺北：里仁書局。

陳寅恪著，陳美延編

- 2001 《陳寅恪集》，北京：三聯書店。

陳懷宇

- 2012 〈陳寅恪留學哈佛史事鉤沉及其相關問題〉，《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5：42-57。

- 2013 《在西方發現陳寅恪：中國近代人文學的東方學與西學背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 張國剛
- 2012 〈陳寅恪留德時期柏林的漢學與印度學——關於陳寅恪先生治學道路的若干背景知識〉，《國際漢學》23：86-94。
- 馮承鈞
- 1929 〈中國古代神話之研究〉，《國聞週報》6.9：1-2。
- 1930 〈唐代華化蕃胡考〉，《東方雜誌》27.17：65-83。
- 馮蒸
- 1998 〈大匠示人以規矩——從王靜如先生教我音韻學看王先生的治學方法〉，杜正勝、王汎森，《新學術之路》下冊，頁 565-583。
- 黃清連
- 2007 〈不古不今之學與陳寅恪的中古史研究〉，黃清連編，《結網三編：紀念遼耀東先生七五冥誕論文集》，臺北：稻香出版社，頁 151-221。
- 傅斯年
- 1980 《傅斯年全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未刊 「傅斯年手稿」（散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傅斯年檔案，編號 I-433。
- 傅斯年著，歐陽哲生編
- 2003 《傅斯年全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 歐陽哲生
- 2003 〈序言〉，歐陽哲生編，《傅斯年全集》第1卷，頁 1-71。
- 2014 《傅斯年一生志業研究》，臺北：秀威資訊。
- 蔡元培
- 1968 〈民族學上的進化觀（1934）〉，《蔡元培選集》，臺北：文星書店，頁 83-88。
- 劉健明
- 1989 〈論陳寅恪先生的比較方法〉，《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頁 225-244。
- 劉選民編
- 1936 〈現代蘇聯的東方學文獻〉，《史學消息》1.2：5-12。
- 錢文忠
- 1989 〈略論陳寅恪先生之比較觀及其在文學研究中之運用〉，王永興編，《紀念陳寅恪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475-505。

張谷銘

錢文忠、王海燕

- 2002 〈陳寅恪與季羨林——一項學術史的比較研究〉，《文史哲》2002.1：33-38。

鋼和泰著，胡適譯

- 1923 〈音譯梵書與中國古音〉，《國學季刊》1.1：47-56。

顏虛心

- 1940 〈法國近百年東方學研究歷程〉，《東方雜誌》37.19：20-31。

羅志田

- 2008 〈陳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學」〉，《近代史研究》2008.6：24-44。

羅家倫

- 1976 〈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與方法〉，《羅家倫先生文存》，臺北：國史館，第2冊，頁51-76。

羅福成

- 1923 〈宴臺金源國書碑考〉，《國學季刊》1.4：687-691。

羅福萇

- 1923 〈倫敦博物館敦煌書目〉，《國學季刊》1.1：160-187。

Witzel, Michael 著，張遠譯

- 2014 〈十九、二十世紀的西方文獻學——以印度學為重心的回顧〉，《古今論衡》26：115-150。

山根幸夫

- 2005 《東方文化事業の歴史：昭和前期における日中文化交流》，東京：汲古書院。

高田時雄

- 2002 〈支那語學支那文學：狩野直喜〉，礪波護、藤井讓治編，《京大東洋學の百年》，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頁3-36。
- 2008 〈内藤湖南の敦煌學〉，《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別冊3》，大阪：関西大学，頁19-36。

Berlin-Brandenburg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ed.

- 2007 *Turfan Studies*. Berlin: Drukerei zu Altenburg.

Chang, Ku-ming (Kevin)

- 2015 “Philology or Linguistics: Transcontinental Responses.” In *World Philology*, edited by Sheldon Pollock, Benjamin A. Elman, and Ku-ming (Kevin) Cha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311-331.

Cordier, Henri

- 1920 *Ser Marco Polo: Notes and Addenda to Sir Henry Yule's Edition, Containing the Results of Recent Research and Discovery*. London: J. Murray.

Dabbs, Jack Autrey

- 1963 *History of the Discovery and Exploration of Chinese Turkestan*. The Hague: Mouton.

Drège, Jean-Pierre

- 2013 “Avant-propos.” In *Paul Pelliot, de l'histoire à la légende*, edited by Jean-Pierre Drège and Georges-Jean Pinault. Pari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res, pp. 7-13.

Durkin-Meisterernst, Desmond

- 2004 “F.W.K. Müller's Work on Iranian Languages.” In *Turfan Revisited: 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s and Cultures of the Silk Road*. Berlin: Dietrich Reimer, pp. 68-71.

Duyvendak, J. J. L.

- 2001 “Paul Pelliot (May 28th 1878—October 26th 1945).” In *Paul Pelliot (1878-1945): His Life and Works: A Bibliography*, edited by Hartmut Walravens.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pp. xiii-xxiv.

Fujita, Takao

- 2011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ield of ‘Oriental History’ in Japan: To Facilitate Consideration of East Asian Studies in Modern Japan.” In *A Selection of Essays on Oriental Studies of ICIS*. Osaka: Institute for Cultural Interaction Studies, Kansai University, pp. 19-28.

Fürbeth, Frank, Pierre Krügel, Ernst Erich Metzner, and Olaf Müller, eds.

- 1999 *Zur Geschichte und Problematik der Nationalphilologien in Europa: 150 Jahre Erste Germanistenversammlung in Frankfurt am Main (1846-1996)*. Tübingen: Max Niemeyer.

Galambos, Imre, and Kitsudō Kōichi

- 2012 “Japanese Exploration of Central Asia: The Ōtani Expeditions and Their British Connection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75: 113-134.

張谷銘

Gooch, G. P.

- 1962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oston: Beacon Press.

Grafton, Anthony

- 1981 "Prolegomena to Friedrich August Wolf."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44: 101-129.

Günthenke, Constanze

- 2015 "'Enthusiasm Dwells Only in Specialization': Classical Philology and Disclplnar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 In *World Philology*, pp. 264-284.

Honey, David B.

- 2001 *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Hopkirk, Peter

- 1980 *Foreign Devils on the Silk Road: The Search for the Lost Treasures of Central Asia*. Amherst, M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 1992 *The Great Game: The Struggl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New York: Kodansha International.

Huber, Toni, and Tina Niermann

- 2007 "Tibetan Studies at the Berlin University: An Institutional History." In *Tibetanstudien: Festschrift für Dieter Schuh zum 65. Geburtstag*, edited by Petra Maurer and Peter Schwieger. Bonn: Bier'sche Verlaganstalt, pp. 95-122.

Jong, J. W. de

- 1976 *A Brief History of Buddhist Stud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Varanasi: Bharat-Bharati.

Laufer, B.

- 1918 "Édouard Chavann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38: 202-205.

Lüders, Heinrich

- 1911 *Bruchstücke buddhistischer Dramen*. Berlin: G. Reimer.
- 1914 *Über die literarischen Funde von Ostturkistan*. Berlin: Verlag der König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 1926 *Bruchstücke der Kalpanāmaṇḍitikā des Kumāralāta: Mit Schrifttafeln und 12 Lichtdrucktafeln*. Leipzig: Deutsche Morgenländische Gesellschaft.

Marchand, Suzanne L.

2003 *Down from Olympus: Archaeology and Philhellenism in Germany, 1750-197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German Orientalism in the Age of Empire: Religion, Race, and Scholarshi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ichaelis-Jena, Ruth

1971 "Oral Tradition and the Brothers Grimm." *Folklore* 82: 265-275.

Momma, Haruko

2012 *From Philology to English Studies: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ost, Glenn W.

2014 "Quellenforschung." In *The Making of the Humanities*. Vol. 3, *The Modern Humanities*, edited by Rens Bod, Jaap Maat, and Thijs Weststeijn.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pp. 207-217.

Pelliot, Paul

1912 "Les influences iraniennes en Asie Centrale et en Extrême-Orient." *Revue d'Histoire et de Littérature Religieuses*, N.S., 3: 97-119.

Péri, Noël

1918 "Nécrologie: Edouard Chavannes."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8: 73-75.

Rabault-F Feuerhahn, Pascale

2013 *Archives of Origins: Sanskrit, Philology, Anthropology in 19th Century Germany*. Wiesbaden: Harrassowitz.

Rey, Alain

1990 "Lexicographie française depuis Littré." In *Wörterbücher. Internationales Handbuch zur Lexikographie*, edited by Franz Josef Hausman, Oscar Reichmann, Herbert Ernst Wiegand, and Ladislav Zgusta. Berlin: de Gruyter, vol. 2, pp. 1818-1843.

Richards, Robert J.

2002 "The Linguistic Creation of Man: Charles Darwin, August Schleicher, Ernst Haeckel, and the Missing Link in Nineteenth-Century Evolutionary Theory." In *Experimenting in Tongues: Studies in Science and Language*, edited by Matthias Doerr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1-48.

Ringer, Fritz K.

- 1969 *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 The German Academic Community, 1890-193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iordan, James

- 2003 "Russian Fairy Tales and Their Collectors." In *A Companion to the Fairy Tale*, edited by Hilda Ellis Davidson and Anna Chaudhri. Cambridge: D. S. Brewer, pp. 217-225.

Rüegg, Walter

- 2004 "Theology and the Arts." In *Universities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1800-1945)*, edited by Walter Rüeg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393-458.

Said, Edward

- 1979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Samosyuk, Kira Fyodorovna

- 1993 "The Discovery of Khara-Khoto." In *Lost Empire of the Silk Road: Buddhist Art from Khara Khoto*, edited by Mikhail B. Piotrovskiĭ. Milano: Electa.

Schaeder, Hans Heinrich

- 1944 "Heinrich Lüders. 25 juni 1869 — 7 Mai 1943." *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Sprachforschung auf dem Gebiete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 68.3/4: 223-226.

Schneider, Axel

- 1996 "Between Dao and History: Two Chinese Historians in Search of a Modern Identity for China." *History and Theory* 35.4: 54-73.
- 1997 *Wahrheit und Geschichte: zwei chinesische Historiker auf der Suche nach einer modernen Identität für China*.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Smith, C. J.

- 2006 *The Roman Clan: The Gens from Ancient Ideology to Modern Anthrop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ache-Rosen, Valentine

- 1990 *German Indologists: Biographies of Scholars in Indian Studies Writing in German*. 2nd ed. New Dehli: Max Mueller Bhavan.

Tanaka, Stefan

- 1993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orma, Franziska

- 2014 *Turkestan-Expeditionen: Zur Kulturgeschichte deutscher Forschungsreisen nach Mittelasien (1890-1930)*.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Turner, James

- 2014 *Philology: The Forgotten Origins of the Modern Humani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urner, R. Steven

- 1971 "The Growth of Professorial Research in Prussia, 1818 to 1848: Causes and Context."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Sciences* 3: 137-182.

Twitchett, Denis C., Herbert Franke, and John King Fairbank, eds.

- 1994 "Discovery of Tangut Documents and the Decipherment of the Language."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6,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710-136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675-676.

Walravens, Hartmut

- 2005 "Franz Anton Schiefner." In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vol. 22, edited by Otto Stolberg-Wernigerode.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pp. 736-738.
- 2007 "Schott, Wilhelm Christian." In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vol. 23.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pp. 497-498.

Wang, Fan-sen (王汎森)

- 2000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ng, Q. Edward

- 2001 *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 The May Fourth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Wilamowitz-Moellendorff, Ulrich von

- 1982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London: Duckworth.

Wokoeck, Ursula

- 2009 *German Orientalism: The Stud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Islam from 1800 to 1945*. London: Routledge.

Yao, Shih-ao

- 1933 "Ein kurzer Beitrag zur Quellenkritik der Reichsannalen der Kin- und Yuan Dynastie." *Asia Major* 9: 580-590.

Philology and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t Academia Sinica: Chen Yinke, Fu Ssu-nien, and “Dongfang Xue” in Republican China

Ku-ming (Kevin) Cha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When Fu Ssu-nien founded a new 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 in Academia Sinica in 1928, he named it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In his inaugural statement, Fu proposed to make China the center of “Dongfang Xue” (a peculiar reading of Oriental Studies). Philology and “Dongfang Xue” obviously we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Fu and his contemporaries.

Philology as a discipline enjoyed great prosperity in Europe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Fu, Chen Yinke, and some of the most-talented Chinese students studied it in Germany, the center of philological research at that time, and endeavored to apply it onto their own teaching and research upon their return to China. Historians who work on the scholarship of Fu and Chen, however, have so far only touched slightly on significance of philology and Dongfang Xue for Fu and Chen. To fill this gap,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developments of philology in Europe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that had impact for Chinese scholars, examines the implications and trajectory of Dunhuang Studies and Dongfang Xue, and analyzes Fu’s and Chen’s applications of their philological training and perspective to their work on ancient and medieval Chinese history that is often considered path-breaking. In the conclusion, this article explains why the interest in European philology did not continue in China or at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nd why Fu’s institute has come to be understood as an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Linguistic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Keywords: philology, Dongfang Xue (Oriental Studies),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Chen Yinke, Fu Ssu-nien